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在教室說故事的同志運動：

同志諮詢熱線的校園同志教育實作分析

Coming Out and Telling Stories in Classrooms:

The Analysis of LGBT Education Movement Led by
Taiwan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蔡宏富

Hung-Fu Tsai

指導教授：范雲 博士

Advisor: Yun Fan, Ph.D.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July, 2011

謝辭

感謝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教育小組的每位義工與受訪者，沒有你們就沒有這份研究誕生，尤其是經常一起合作的戰友小莫、妖妖、金金、winter 和 Ling。特別感謝阿球，好幾次特殊的演講機會總是會想到我，尤其是到花蓮與金門演講的經驗相當難忘。另外，每個接受訪談的老師們，你們真的太棒了！特別感謝雪菱老師，能和妳交心實在是蠻特別的經驗。

感謝范雲老師，在大學時代每次上妳的課，光聽到妳的聲音就特別感到有衝勁，默默在台下崇拜老師的我沒想到碩士論文有幸找妳指導。每次討論，妳總是聽著我支離破碎的田野心得，最後卻都能給我繼續探索的勇氣與信心。不管是在思考問題或是分析資料上，妳都能在我走到死胡同時另闢蹊徑。

感謝我的三位口委。長期關注校園性別教育的蘇芊玲老師，從妳溫和口吻給予的建議與提醒使我更能公平地看待性平法，而不至讓研究偏頗。總是讓我戰戰兢兢的畢恆達老師，你對研究嚴謹且高標準的態度，讓我看到自己研究不足之處，不過兩次考試結束你總還是會滿臉笑容地給我肯定。很像大姊姊的劉華真老師，妳對問題意識的要求與清晰的分析理路，讓我看見自己分析上的盲點，最後妳認真給我建議的表情實在很迷人。

感謝 R97 的大家，在碩一瘋狂打橋牌的牌友們，李屹、意唐、思齊與育含，以及飯友兼讀書戰友的家榮、如涵、若凡、怡娟、邑軒、民傑、駿盛，因為有你們，讓我的研究生生活不那麼孤單。也感謝 R96 的學姐們，筱筑、楊潔、伊凡、如珺，和你們修課與話家常的時光很快樂。特別感謝賴曉黎老師，在社會學的學習道路上，除了教會我許多知識外，更從你身上學到對自己所愛的人事物的堅持。

感謝我最要好的「女朋友」連家郁，謝謝八年來妳對我每一次的義不容辭，曾經一起為失戀而哭、一起罵臭男人、一起淋雨、一起為對方追逐夢想加油打氣、那些好多在一起的時光都點滴在心頭，認識妳是我最好的事。謝謝雅婷姊，實在很不習慣已經成為助理教授的妳，大二在永康街小茶館的第一次聊天好像才是昨天的事，謝謝妳對我總是有莫名的信心，讓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謝謝柏任，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載了這麼一程，我會帶著與你美好的回憶一起偕老。

最後，感謝我的家人，特別是我的媽媽王孟蓁，辛苦地一個人帶大我們三個兒子，在妳身上，我看到了作為台灣女人的堅強、韌性與勇敢，謝謝妳一路上包容著我的任性，我愛妳。

摘要

隨著 2004 年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教育在校園裡如火如荼地展開，當中的同志教育也開始萌芽。但同志議題並非藉由法律的力量就能順利地進入校園，中間的過程還需經過不同行動者與策略才能完成。本研究以「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教育小組為研究對象，透過實際的校園同志運動經驗，探討和理解法律與實作之間的差距與困境。首先，本研究發現同志教育在整個性別教育當中，仍處於邊緣的位置，此邊緣化的現象並非理所當然，而是實作上就受到課程安排的結構限制。在現實校園中，許多教育者也只把性別教育當成兩性平等，此種以「兩性」平權為核心思維的性別教育觀念無形地邊緣化同志議題。再來，本研究和社會運動中說故事的研究對話，當真實的同志運動者在教室出櫃現身說故事時，我發現在相對不自由的場域，同志運動者說故事會有不同的策略包裝故事，而非真實地訴說自己的生命經驗。在回應與「性」相關的問題時，運動者也有意識地使用轉化議題的技巧，避而不談敏感的情慾。最後，我觀察到運動者在一場接一場的演講中，開始和自己的生命經驗異化，說故事變成是一個抽離的工作。本研究也參考美國酷兒運動的兩種認同路線爭論，試圖分析同志教育在強調差異與強調相似之間的辯證關係，並反思「尊重多元」的精神應立基在差異而非相似。整體而言，儘管同志教育在校園中仍有爭議，但在傳遞「尊重多元」觀念上，同志現身於教室中說故事，仍為一項有力量的對話工具。

關鍵字：同志運動、同志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說故事、尊重

Abstract

When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ct was prescribed in 2004, the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was starting in schools, including LGBT education. However, it was not successful to practice LGBT education in Taiwan's schools. It still needs different actors and other strategies to involve this movement. I observed Taiwan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TTHA) as my object of study. Through the experiences of TTHA's LGBT movement in schools, I aimed to discuss the gap between the law and practice. First, I find LGBT education was still in a marginal place of the whole gender education. In practice, the school's curriculum arrangement makes LGBT education in a limited structure, and many educators have just considered gender education as an education of sex equality. Secondly, in light of storytelling concepts in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I find gay activist would not tell their true life stories. By using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change their own life stories, the activists can tell a good and positive story which avoiding bad plots. In response to students' sexual questions, the activists consciously used transformational assimilation to talk sex without talking desire. Lastly, telling stories in classrooms unceasingly, the activists were alienated with their own life stories. Storytelling becomes an alienated job in the end. Compared with the disputes between two strategies of identity in America queer movement, I analyze the dialectic 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ce and assimilation on LGBT education, and support that "respects diverse gender" should be based on difference. In conclusion, gay storytelling in classroom, though limited and facing challenges, is still a powerful tool in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heterosexu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ywords: LGBT movement, LGBT education,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storytelling, respect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6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田野描述.....	15
第四節 章節安排.....	26
第二章 同志入班演講的結構限制	27
第一節 同志教育在性別教育的座標位置.....	28
第二節 打造入班演講的過程.....	41
第三節 教師邀請熱線的動機.....	50
第四節 小結：演講的無形限制.....	57
第三章 現身在教室內的論述戰略	61
第一節 說故事作為主策略.....	62
第二節 回應性議題的四種類型.....	75
第三節 異性戀想像的性別流動說.....	88
第四節 小結：「正確的」性別觀念的兩難.....	96
第四章 運動者的情緒與主體性	102
第一節 同志何苦為難同志？.....	103
第二節 「專業」同志形象的兩難.....	108
第三節 演講的不安全感與無力感.....	119
第四節 小結：「尊重」與同志主體性的取捨.....	123
第五章 結論	129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29
第二節 和理論的對話.....	131
第三節 研究建議.....	134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可能研究議題.....	138
參考文獻	140
附錄	144

表目錄

表 1 教育部性別平等師資人才專業領域關鍵字搜尋統計表.....	4
表 2 學校教師受訪或演講錄音資料一覽表	18
表 3 教育小組義工受訪資料一覽表	18
表 4 性別光譜	23
表 5 演講場次表（2010 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28 日）	25
表 6 高中課表.....	31
表 7 屏東市博學國小九十八學年度週三活動計畫預定表.....	35
表 8 台北市自強國小教師研習公文	37
表 9 義工回應性議題的四種類型.....	76
表 10 ANDREW SAYER 的「尊重」與「可敬」分析框架.....	127
表 11 GAMSON 認同邊界分析框架與本研究的比較	132
表 12 GAMSON、SAYER 與本研究的綜合分析.....	134

圖目錄

圖 2 教師研習海報標題.....	40
圖 1 教師研習海報標題.....	40
圖 4 教師研習海報標題.....	40
圖 3 教師研習海報標題.....	40
圖 5 教師打造入班演講流程圖.....	42
圖 6 校園同志社團成立的兩大支持面向.....	137

第一章 緒論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這句原來指涉推翻專制王權，以獲得民主自由的話，放在目前台灣的「同志」處境讀來仍然分外有感覺。在當前同志運動的語境中，「同志」不僅指涉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族群，還有包括雙性戀、跨性別和 BDSM 族群；更廣泛解釋的話，同志可以說是一個相對於異性戀體制，充滿著流動性的字詞。解嚴至今，台灣除了民主的意識不斷深化之外，在性別平等的意識上也藉由各種修法運動的成功慢慢滲入到工作場所、學校與政治當中。不僅男女平權的觀念開始被重視，同志的權利也開始納入，許多同志的聲音慢慢被主流社會聽見。

我的研究主題聚焦在當前中小學校園裡所推行的性別教育中的「同志教育」。隨著男女平等的觀念深耕和性別主流化的政策實行，同志平權的意識也跟著興起，但教育這一塊仍然保守的場域，同志教育該如何被實行呢？校園中，同志學生的處境是否有隨著《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通過後被具體的改善？在這本論文完工之際，教育部規定民國一百年實施同志教育的方針才引起宗教團體的激烈反對，各種爭議、扭曲與論辯聲中，我認為先具體瞭解台灣目前實作中的校園同志教育是最為迫切與必要的。

以下將立基於我在同志熱線擔任教育小組義工對校園性別教育的觀察，描述目前性別教育師資專業領域的各種樣貌並參考台灣既有的同志研究論文，進而提出研究問題；在第二節則專注在台灣同志現身研究現況的文獻回顧。第三節說明田野目前的概況與我將採用的研究方法。第四節敘述為本研究各章節的內容安排與章節間的相互關係。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

和警衛打聲過招呼後，輔導老師 Jane 一會兒出來帶我們去輔導室休息，準備第四節十一點的課開始。匆促地分配誰是主講者，誰是分享生命故事者後，上課鈴聲也同時響起。在往教室的路上，我問老師待會內容是否有不該講的部分，老師說她很開放，不過她說會跟學生先介紹這節是性別教育，我半開

玩笑地說：「可是我們講得都是同志，應該是同志教育才是。」老師一聽我這麼說，突然尷尬地對我笑著說：「恩…同志教育…還是性別教育好了，感覺可能比較…中性…也能包含其它的議題嘛！」我似乎感受到老師背後有另外一股壓力。這間高中是一間純男校，當我開始演講試著和台下同學建立關係詢問他們對同志有什麼第一想法時，帶著鄙視與戲謔語氣的聲音此起彼落，「撿肥皂」、「肛肛好」、「轟趴」、「愛滋」、「菊花臺」、「死人妖」…。我和其他義工頓時在講臺上，面面相覷了一會兒，默默地心想：「這節課或許要下點猛藥才行。」(2011/05/05 某高中演講田野筆記)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教育法）公佈實施後，把同志教育納入性別課程中。相隔六年，在 2010 年二月底，台北市教育局發函台北市議會附帶意見中，指示台北市政府應研議「如何防止高中、職（含）以下學校社團，假藉該社團名義，誘導吸收學生，從事同志交誼等活動，以保障學生自然適性之發展空間」。公文事件似乎和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初衷相違背，尤其又是從教育局所發的公文，難道性別教育提到的同志教育並沒有如期實施？到底目前台灣校園的同志教育進行得如何呢？是否有達到《性別平等教育法》所期望的目標？還是同志教育仍處於邊緣的位置？這些問題讓我對校園同志教育的現況開始感到好奇。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¹（以下簡稱熱線）教育小組因性平教育法，得以進入校園和學生、老師及家長面對面的討論同志議題，但進入學校的過程似乎並不因為有性平教育法的保護而能順利的實行。2009 年 5 月我開始接觸教育小組，從原本只是帶著好奇心旁聽，一直到積極地和小組的朋友們四處演講。一開始所引用的田野筆記是演講過程中常會遇到的情況，而這只是眾多故事當中的其中一角，不同義工於不同學校演講也都充滿了不同的故事與挑戰。雖然熱線教育小組得以進入校園演講性別議題，然而隨著學校的不同，「進入校園」有著不同的難易度，有些是公開地跑公文邀請教育小組；有些是由老師自掏腰包；有些則是老師秘密的邀請，最多的情況是掛著「多元性別教育」的名義邀請我們前來演講。每次演講我們總會詢問老師：「為什麼想要邀請教育小組來講性別教育？」得知每個老師在其他不同的網絡中接觸到同志諮詢熱線，才萌起動機邀請教育小組入班宣導，

¹全名「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英文名稱為「Taiwan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而動機背後往往有著教師們認知解放²的過程。

2009年5月我投入教育小組的工作，一開始在新北市和平國中聆聽資深義工的演講，到半年後自己能在現場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再一晃眼，我已經開始學著一個人到一個陌生的學校，獨自面對著台下許許多多不認識的學生、老師及家長。進入到班級教室裡，直接面對國、高中學生講述同志議題時，接觸到的是同學血淋淋的恐同意識，入班演講的經驗讓我深信，同志教育不能只是在白紙上作業，因為從來就不是去教育有問題的學生，而是教育本身就出了問題，如同批判教育學者 Paulo Freire³(1993)說：「只有當說出真實的字詞，才是一種實踐。」所以和現場異性戀論述對話才是最直接在教室中展現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關係的實作，也讓其他無法說出的性身份族群能找到一個教學隙縫，進而徹底地公開討論。

另外，我也好奇目前性別教育的師資是如何。於是，我利用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資訊網⁴的師資人才庫，搜尋已登錄系統的教師，透過專業領域的關鍵字搜尋，結果得出專業領域中含有「同志」關鍵字的人數為17人，這17人又有12人同時含有「性別」關鍵字，其和性別同時出現的比率（ $12/17*100\%$ ）為70.6%。但當這17位教師放到總登錄人數（ $17/256*100\%$ ），卻只占6.6%。從上面的數字來看，雖然專業領域中，含有同志關鍵字的師資人數占總人數的比率較低（6.6%），但卻和「性別」關鍵字的重複程度卻較高（70.6%）。我另外用「兩性」「婦女」「女性」「性傾害」「性騷擾」「家庭」「婚姻」「治療」為關鍵字分別搜尋，結果如表1所示。可以發現，「兩性」、「婦女」、「性侵害」、「家庭」與「婚姻」等專業領域的教師較多，占總登錄人數的比率較高。另外，「性騷擾」、「性侵害」與「家庭」等專業領域同時含有「性別」的比率各占77.8%、36.4%與47.2%。最後有趣的是，在專業領域中，有「治療」⁵關鍵字的人數為31人，占總登錄人數的比率為12.1%。

² 在社會運動中認知解放意指，人們敢從事抗議，是因為開始對情境採取不正義的定義，並且認為自己可以加以改變，能產生這種「有能力的感覺」(sense of efficacy)及所謂的認知解放(何明修, 2005, pp. 127,179)。此處所用的認知解放對象則是教育體制內的教師，能開始意識到校園性別不正義的情境，並期望自己能對此加以改變。

³ Paulo Freire 為巴西籍的教育工作者，受到馬克思主義及法農後殖民主義作品的影響，對傳統的教育學提出批判教育學理論，指出教育中也存有西方所謂的先進國家對第三世界製造的壓迫關係，並認為理解及改變被壓迫者的教育學才能使被壓迫者及壓迫者同時獲得解放。

⁴ 網址：<http://www.gender.edu.tw/>。上網時間，2010年11月8日。

⁵ 以「治療」為關鍵字查詢結果，出現婚姻與家族治療、團體動力與小團體輔導、遊戲治療、心理諮商與治療、心理治療、性功能障礙治療、性醫學與性治療、家族治療、認知行為心理治療。

表 1 教育部性別平等師資人才專業領域關鍵字搜尋統計表

領域關鍵字	人數 (人)	和「性別」重複 人數(人)	和「性別」重複 比率(%)	占總登錄人數比 率(%)
總登錄	256	-	-	100.0
性別	99	99	100.0	38.7
同志	17	12	70.6	6.6
兩性	16	3	18.8	6.3
婦女	42	12	28.6	16.4
女性	39	12	30.8	15.2
性侵害	33	12	36.4	12.9
性騷擾	9	7	77.8	3.5
家庭	53	25	47.2	20.7
婚姻	32	8	25.0	12.5
治療	31	5	16.1	1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其中並忽略各個關鍵字互相重疊的教師數目，例如專業領域同時有兩性與婦女。

從上述的描述統計可看出，性別平等教育師資的人數多寡與性別平等教育各式各樣的議題，刻劃出性別平等教育的性別樣貌。雖然資料庫中，充斥著各種和性別相關的議題，但從師資人才的專業領域不難看出性別教育教的仍是某些特定議題，甚至連專業領域中沒有「性別」關鍵字的師資人數都還有 157 人⁶，卻仍繼續登錄在「性別」平等教育的師資人才庫當中。分析性別教育師資人才和同志教育又有什麼關係呢？藉由粗略的描述性統計，我希望指出目前哪些專業領域在詮釋性別教育，以及同志教育在性別教育體系中的位置。

台灣既有關於同志教育的文獻中，針對「同志」的研究資料並不少，但針對「同志教育」的研究卻並不多。以「同志」為關鍵字搜尋「全國博碩士論文索引網」所得到的論文有 176 篇，最早論文標題有「同志」二字是在 1995 年⁷。我爬

⁶此 157 人雖然在專業領域上沒有「性別」二字，但有些可能有「兩性」「婦女」「女性」「性侵害」「性騷擾」「家庭」「婚姻」「治療」等關鍵字單獨或相互出現，而有些專業領域則都沒有我下的關鍵字，後者的數目還不少。

⁷這裡感謝畢恆達老師的提醒，以同志為主題的碩論最早並不是 1995 年，他指出研究主題也許跟同志相關，但論文標題沒有同志二字。但因為在搜尋上的困難，所以我仍以「同志」為關鍵字

梳這 176 筆論文名稱，首先，主要探討的同志議題有情慾、文化、愛滋、媒體論述分析、同志運動策略與現身（coming out）策略的討論，愈晚近的論文研究議題更延伸到同志能動性（agency）的一面，例如同性情感關係的發展、同性伴侶的生活經驗或女同志成家的歷程。其次，探討教師與學生為研究對象的同志研究則有 18 篇，焦點多放在同志學生的認同歷程與同志教師的校園處境，或是教師對於性別刻板與同性戀態度的量化研究，少有對同志教育的反思研究。

我認為對於教育現場的反省就是對社會的反省，這也是教育和運動之間重要的關係，而非兩者完全無關。我們可以看到，當反對同志教育的《台灣真愛聯盟》⁸使用各種同志運動中性解放的語言與照片，來支持現今國中小不應該有同志教育時，教育和運動的關係就連結在一起，只不過他們藉由重新詮釋同志運動的激進標語來干涉與反對同志教育的實行，例如：性教育不等於性解放。所以教育場域並非完全沒有運動的成份在裡面，而運動也可能是藉著教育的方式達成。我認為熱線在校園內進行同志教育或是同志議題的演講，可說是同志在公領域尋求認同的一種基進策略，也是一種同志運動。台灣的同志研究極少探討同志如何在公領域當中發展承認（recognition）政治的策略，有鑑於此，我以教育小組的義工為研究對象，從義工們的行動實作出發，探討同志在公領域尋求承認⁹的過程與困境。

在這個脈絡下，我所要回答的問題是：第一，教育小組如何進入校園呢？教育小組是否能憑藉《性別平等教育法》這道窗口，就得以毫無顧忌的進入校園演講？第二，進入到校園與教室後，面對不同的教師和學生，又如何組織演講內容？在教室中，這群運動義工採取的策略與回應問題的現場實作又是什麼？第三，在這樣的實作下，這些在第一線現身的運動者們又會產生什麼樣複雜的情緒？義工如何在不斷面對一次次演講的彈性疲乏抑或是排山倒海的無力感中，獲得繼續參與的動力？最後，義工們的努力是否真的在公領域中獲得承認的滿足感？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從教育現場的實作過程當中，觀察性別教育是否能讓同志教育在校園當中有聲地發聲。所以「同志熱線教育小組如何在校園進行同志教

搜尋。

⁸ 《台灣真愛聯盟》是由一群反對 100 學年同志教育在國中小實行的家長團體所組成，並於 2011 年 4 月開始藉由網路的連署〈反對性解放教育連署書〉，網站標語為性教育 ≠ 性解放。

⁹ 這裡我採用 Nancy Fraser (2001) 的承認 (recognition) 政治立場，我認為同志運動的目標並非是要得到異性戀的認同 (identity)，而是承認 (recognize) 同志在公領域有政治機會與條件的平等，現身在承認政治中不再是參與公領域的阻礙與污名。

育？」是本研究的主軸，我將探討同志教育進入校園時的各種互動關係，藉以剖析同志教育在性別教育現場中的各種桎梏。從上述三個問題可分成下列三個主要研究目的來探討：

第一，《性別平等教育法》雖然要求在形式上落實平等，但當教育小組藉由《性別平等教育法》得以進入學校宣導同志教育時，另一方面也不自覺地受到《性別平等教育法》本身帶來的限制，本研究透過描述教師與熱線裡應外合的過程，觀察教育小組進入校園的機會結構及限制。

第二，分析義工們在教育現場的實作及其背後所考慮的條件，來觀察同志議題在一個公領域的場域中，尤其是在保守的教室中所必須考量的限制因素。以及義工的演講實作在這些限制因素中又如何扭曲了真實的故事或想法，以免栽進異性戀邏輯的圈套當中。

第三，探討演講過程將帶給義工的各種複雜情緒，這些情緒使得義工間的互動產生隱微的緊張關係。甚至在追求演講效果的目的下，同志義工們不可避免地，在演講中被異化，更能清楚看見同志在公領域運動上的困境。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我主要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專注在國內外的同志教育研究。首先回顧美國同志議題在校園中的處境，與台灣目前已有的校園同志研究；再回到台灣在2010年2月發生的教育部公文事件，指出性平法的漏洞所在。第二部分主要專注在社會運動與教育這兩個領域的對話，由於教育小組同時有社會運動與教育的雙重性格，所以社會運動當中的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議題勢必會影響到校園中的教育行動。首先回顧台灣同志現身的研究，支持現身是同志運動必要的策略，尤其校園當中的同志現身更是如此。再來參考國外學者對於差異政治的討論，以反省校園目前當道的「多元」文化教育，從社會運動中的差異政治議題看到多元文化教育的盲點。

（一）國內外同志教育研究

1996年2月在美國猶他州鹽湖城學校系體系(Salt Lake City's school system)

爲了不讓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青年社團在學校從事聚會，禁止公立高中學校所有課後社團活動。採保守立場的猶他老鷹論壇（Utah Eagle Forum）主席 Gayle Ruzicka 說：「同性戀不能生育，所以只能透過招募吸收。現在學校同志社團將不能在猶他州的高中校園裡繼續招募。」（Brook，1996：A1）州參議員 Craig Taylor 表示：「青少年正開始有性的發展，我相信他們有可能受同性戀影響而走向同性戀的道路上。」（Brook，1996：A1）另一方 GLSTN 網絡（Gay Lesbian Straight Teachers Network¹⁰）教師代表 Clayton K. Vettters 提出反駁：「對同性戀學生最好的方式是開放。」（Brook，1996：B8）並認爲同志議題到處都有。在猶他州東部高中就讀，本身爲女同性戀的 Kelli Peterson 否定保守的作法，並指控保守團體以成立性俱樂部（sex club）爲理由，污名化同志社團，她認爲「社團並不只是技術層面上的交友平台，更是一種認同」。（Brook，1996：B8）

美國猶他州發生的校園同志議題，只是其中一個事例，另外在紐約曾發生校園有關同性戀相關教育主題的「彩虹課程」遭腰斬，甚至開除學校校長¹¹；阿拉巴馬州的奧本大學（Auburn University）也因學生代表決定取消校園同志社團的經費而鬧到州立最高法院¹²；在一份各大學校園調查報告裡，也經由統計方式計算出同性戀議題比起在校園的種族議題或是其他性別議題更讓人不能忍受¹³。

Gloria Filax（2003, 2006）在加拿大亞伯達省的校園，研究同志青少年的校園經驗，她探討同志青少年學生在校園與社會中，如何回應異性戀規範與恐同論述，或是如何抗拒異性戀論述，以便在異性戀的日常生活縫隙中製作同志認同。從青少年同志的敘事可以看到，青少年同志自認爲是偏差的他者以及令人難以理解的他者，許多異性戀規範的話語背後顯露的是「同性戀這個可怕的東西」。在校園中，透過性別論述的網絡影響邊緣化的同志學生，再製造出同志的不可見性（invisibility），以致他們不是消失在人際關係中，不然就是受到忽略。

在台灣的論文也有針對校園同志學生的研究。張喬婷（1999）以台灣大學女同志學生爲訪問對象，研究女同志學生在校園空間中所受到的恐同監控，發現她們必須面對校園中的異性戀想像而做出各種抵抗行動，例如以升學來停止情慾的

¹⁰ 1990年成立的 GLSTN 於 1997 年改名爲[Gay Lesbian Straight Education Network]。參考來源：<http://www.glsen.org/cgi-bin/iowa/all/about/history/index.html>。上網日期：2010/11/15。

¹¹ Teaching about gay life is pressed by chancellor. (1992, November 17). The New York Times, B3

¹² Alabama denies aid to gay student groups. (1992, May 16). The New York Times, L9.

¹³ Shepard, C. F. (1990). Report on the quality of campus life for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students. Los Angeles: Student Affairs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Offi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想像、隱性埋名的同性情慾書寫，同時也發現，高中校園主控學生頭腦與身體的「情境式女同性戀」論述，企圖矯正菁英女性的同性情慾，另外校園當中行政體系在同志資源上的不足，像是恐同的輔導體系與封殺情慾的出口也成為父權管理的監控策略。王怡元（2004）研究 1990 年代中期，女同志族群在學校和非同志族群間的互動關係，他指出：「校園中的異性戀霸權仍然橫行無阻，女同志在校園中難以逃避異性戀霸權的監控，對於被發現的女同志學生試圖加以改造、矯正，同志學生無不噤若寒蟬，甚至失去承認自己同志認同的勇氣。」最後研究結果認為友善接納是有條件的，而校園間的同志學生和其他師生的緊張關係有可能是基於愛與關懷。吳幸珍（2003）的研究主要彰顯國中女同性戀學生的主體經驗，藉由三位女學生的校園經驗說出「性別教育外一章」的故事，細膩的爬梳在國中時期有同志認同的女學生，如何在校園異性戀體制中發展情感關係與自我認同與現身策略的考量，另外，文中他指出學校正式課程除了「反同性戀」與「去同性戀」的特徵之外，潛在課程也會壓抑到同志學生，例如學校對女生服裝儀容的規定讓不喜歡穿裙子的 T 相當困擾。上面三篇的研究對象湊巧的皆為女同性戀學生，分別研究國中、高中與大學時期，研究內容多是藉由女同性戀學生的校園經驗來反思校園體制的「同志盲」與對同志學生的壓迫，許多篇幅多著墨在女同性戀學生面對外部結構與人際關係的心理認同過程。

類似於 Gloria Filax 的研究，George W. Smith(1998)的研究承繼立場論¹⁴（standpoint theory）的認識論，以同志學生作為報導人，收集在校園中的經驗敘事，檢視教育體制中的異性戀體制與恐同的壓迫。透過報導人的故事，他認為「死娘炮」的意識形態（the ideology of “fag”）是組成異性戀體制和恐同的關鍵點，透過語言上的實作，例如嘲弄、取笑、謾罵、塗鴉的方式，讓有關死娘炮的各種迫害在每日的校園生活中不斷上演。不管同志學生是否認為自己就是同學口中的「死娘炮」，他都要經過「死娘炮意識形態」的洗禮才能獲得同志認同或同志意識。王儷靜（2010：170）也回應 Smith 這篇文章，分享在「多元性別」的進修研習上，聽同志分享生命經驗時，有些老師會詢問陰柔特質的男生：「你這樣不會性別錯亂嗎？」「你這樣子，你爸媽對待你的方式會不會很奇怪？是用男生還是女生方式對待你？」許多大學生對於同志的認識也來自這樣的論述：「我的高中老師說，男同志是因為女人的靈魂裝在男人的身體，女同志是因為男人的靈魂

¹⁴立場論承襲黑格爾主奴辯證和馬克思階級對立的想法，提出不同社會的座落（socially situated）有不同的知識生產方式，及不同的知識宣稱。立場論認為支配團體總是有系統的毀壞、限制有利的社會條件，讓少數或弱勢團體無法在有力的位置上生產知識(Harding, 2004)。

裝在女人的身體，所以我們要尊重同志，因為他們和我們是不一樣的人。」並提出教育人員可以檢視座落在社會脈絡裡的焦慮和不瞭解如何建構，提出一套不同於既定解釋性別關係的假設，不同生命經驗的交會才會帶有轉化的契機。

從 Filax 和 Smith 的研究得知，不僅在校園當中看不見同志學生，更把同志學生建構成「受難者-箭靶-犧牲者」(Martyr-Target-Victim) 形象。例如同志青少年自殺的比例高於異性戀青少年；同志青少年在學校是霸凌、性騷擾及取笑的對象；青少年覺得自己是同志是因為年紀還小，所以自我中心比較強、比較叛逆。很難看到有戀愛、羅曼史、快樂、性、健康的同志少年、好的事情、音樂、藝術、有家人朋友支持成分的敘事在描述同志 (Eric Rofes, 2004)。

上述的同志青少年校園經驗研究，讓我們知道對同志青少年的教育是必須的，這不僅是教育異性戀青少年要認識多元性別，更是提供同志青少年與異性戀青少年一樣平等的教育資源，讓他們能在教育的過程中認同自己的差異。Eric Rofes (1989) 用「打開教室的衣櫃」形容在校園中注入同志青年的教育，1985 年在紐約開辦的夏菲米克高校 (Harvey Milk High School) 與洛杉磯聯合學區 (Los Angeles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實施的 10 計畫 (Project 10) 都為此做了模範。不過在推動的過程中卻遇到許多阻礙因素，包含缺少承認各種性傾向的勇氣與鼓勵、難以把同志青年需求的資訊推廣到公眾以及學校系統可能會面對爭議。Rofes 認為學校在接納同志青少年前必須要有下列改變：第一、重視學生的需求，而非家長與外界團體的需求；第二、性相 (sexuality) 的議題必須從禁忌轉移到公眾領域，像是性教育中的墮胎與多元家庭議題，經常面臨宗教壓力而不提及；第三、培養對同志友善的教師，因為帶有性別友善觀點的老師往往最常受到學校主管的壓力；第四、學校課程必須加入對社會有貢獻的同志人物；第五、教育者必須理解以正面的方式討論同志並不會造成青少年成為同志 (1989, pp. 451-452)。在我的研究中，上面五點同時也是教育小組進入校園演講所要面對的問題。教育小組在宣導同志認同的同時，必然也會受到脈絡、情境的限制而改變演講內容，並非真空、去脈絡地、單調地呈現被壓迫或正面的同志形象。Rofes 所提出的困境與可能的改變正是影響教育小組演講的部份限制，在這些限制無法改變下，教育小組必須發展出應對的內容與呈現方式。

回到臺灣的現況，同志議題及同志教育在臺灣校園的處境又為何？今年 (2010 年) 二月底台北市教育局發函台北市議會附帶意見：「台北市政府應設置跨局處平台，檢討同志公民政策，確立各局處權責分工，並研議如何防止高中、

職(含)以下學校社團，假藉該社團名義，誘導吸收學生，從事同志交誼等活動，以保障學生自然適性之發展空間。」此公函不僅充滿嚴重的性傾向歧視，更公然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宗旨：「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這次事件除了彰顯出校園實行同志教育的困難之外，也不知叫致力開拓同志教育的現場教師情何以堪，當《性別平等教育法》淪為形式上的性別平等時，我們必須要停下腳步回頭檢證，是否所有的性別議題都因有立法而獲得在校園推行的正當性。

台北市教育局公函事件顯露出性平教育法當中的漏洞，雖然性平教育法保障同志學生在學校的「身份」，卻無法保障同志學生在校園的「行動」正當性，這個重要的論點也凸顯出教育小組作為在校園的一種同志行動所遭遇的為難。如果同性戀行為被描述為私密、私領域的，則不可能在公領域中提起，這也就是性傾向壓迫和性別壓迫、種族壓迫不同的地方。在公領域中，性傾向壓迫不是處在劣勢的位置，而是根本沒有位置，異性戀身份成為進入公領域的先決條件，使得同志必須採取虛假的異性戀身份，獲取公領域的充分權力。Cheshire Calhoun 就解釋性傾向決定誰可以說話的運作機制：

如果同性戀僅僅被化約為性（其實是化約成性行為的一種，也就是肛交）以後，同性戀在公領域裡就完全沒有位置、與公領域完全無關了，包括工作、社會互動、教育、媒體、軍隊等等公領域無關…更嚴重的是「同性戀行為」就不再包括同性婚姻、同性親職和生殖選擇。…加上對異性戀者來說，「普遍的異性戀預設」使得他們不會有壓力去弄清楚別人或自己的性傾向。然而，與其說「異性戀預設」假設了說話者的談話內容，不如說它預設了說話者本身。……只有（真正的或假扮的）異性戀者可以說話。（Calhoun，1997：155-65）

那麼公開同志身份的教育小組義工，如何在教育這個公領域中以同性戀的身份說話呢？只有把同志的「知名度」政治化，並進入政治辯論的公領域。這同時暗指同志往往沒有資格提及或公開，除非在某個環境裡，他們當成一個政治的、公眾的、可供辯論的主題（Calhoun，1997：166）。這也正是教育小組進入學校的重要途徑機制，因為同志無法在校園教室中呈現、提及，所以教育小組的任務就是讓「同志」完全展現在教室裡。在性平教育法庇蔭下實行的性別教育，也就成為教育小組進入學校的重要管道，但不免受到主流對性傾向的負面觀感，而無法進入學校發聲，以至於必須在體制裡外共謀出一個政治的、公眾的、可供辯論

的環境。總言之，性平教育法雖然開啓教育小組進入學校的機會，卻沒有保障教育小組進入學校這個「同志行動」的合法性，也就產生教育小組在不同的學校可能會有不同的進入策略及變形。

我參考 Cheshire Calhoun (1995) 的分析區分出「誰可以說話」與「可以說什麼話」作為性別平等法漏洞的主要分離點。性別教育平等法只確保「可以說什麼話」，也就是承認同志身份的合法性，允許在校園中宣導尊重同志學生，但並不確保「同志可以說話」，也就是不承認同志可以在學校公開地展現自己同性的情慾、呈現自己是同志的行為。上述的斷言或許對性平教育法的立法精神過於不公平，有人甚至可以提出這樣的回應：同志學生可以大膽的在校園展現自己的性傾向。但在現實的校園生活，大多數的同志學生有勇氣展現自己的同性情慾嗎？首先，光是同志老師的校園處境就有許多爭議議題，甚至不敢在校園中現身，又如何期待性平教育法能在各種性別議題上，提供給學生認知解放的可能呢？再來，這樣的性平教育法非預期地影響同志教育在性別教育的曖昧性位置，使得關於同志形象、同志的相關知識及相關解讀都在異性戀預設的性別教育下詮釋。最後，這也造成各個性別團體、甚至宗教團體在性別教育中開始彼此競逐對於「同志」的解釋權力，而出現形形色色的同志形象與詮釋，這部份李雪菱 (2007) 的研究已有初步指出。

李雪菱 (2007) 的研究細緻地描述出目前台灣性別教育的處境。她彙整四所小學與三所中學的田野資料，首先發現，教室的性別意識是主導性別教育成效與推廣意願的承辦關鍵；第二，教學方式採取書本、播放影片的教育方式，效果並不佳；第三，由聖經教義轉化的活潑教學，由非營利組織培訓志工媽媽進入基層學校義務教學的策略，試圖取代「安全的性」的性別教材，其教學活動受師生熱烈歡迎，但從全面性教育的角度來看，卻是走回頭路的性別教育；第四，政策性與實用性議題遠多於批判性（爭議性）議題，許多性別教育工作者企盼突破的主題（如：同志教育、親密關係、兩性交往等）易受迴避，此一情境是窄化性別教育意涵的教學實踐，同時也可能加深師生更多性別刻板印象。李雪菱一針見血的指出台灣性別教育目前的問題，尤其較少批判性議題的引入，更是同志教育發展的主要困境。

(二) 當同志運動遇上教育

在台灣的同志運動中，首先最大的爭議就是：要不要選擇公開同志認同身份的策略，以及同志運動需不需要一個固定的認同身份。朱偉誠（1998）關注到西方同運採取現身（coming out）的策略，但放到台灣本土的社會文化脈絡裡，台灣同志因為壓力的關係普遍對於現身感到力不從心，當台灣採用西方同運現身的策略時，往往發生水土不服的現象。支持現身策略的同運者認為，異性戀壓迫並不是要把所有的同性戀者從暗櫃中一一揪出來，因為讓同性戀者持續地待在櫃中（擔心被曝光），毋寧才是維持異性戀霸權最理想的狀況。反對現身策略的同運者認為戴上假面具、保留自己的現身權力，以集體現身（collective coming out）的方式反而更能用戲劇效果來反諷異性戀對同志的壓迫困境¹⁵。朱偉誠最後肯認不現身的運動策略未嘗不也是一種政治——不現身是因為沒有什麼好現身的！他並不擔心同運會因此沒有了主體，因為既然人的情慾是有可能流動變異的，又何必去認同那些武斷而僵化的性相身份。

朱偉誠這篇研究為台灣的同志運動的策略做了許多辯護，比起西方社會，尤其他看到同志「現身」在華人文化中有更大的壓力，而和西方同志運動策略做了精彩的對話。不過，如果同志熱線近年在校園的同志教育行動也是一種同志運動的話，朱偉誠的研究就不太適合用來解釋青少年同志的狀況。對於青少年同志而言，因為並沒有像成年的同志運動者一樣有豐富的社會與文化資本，可以反轉不現身的意義獲得同志身份的認同，青少年同志在學校並不會用酷兒的意義去選擇不現身的策略，他們仍然真實地受到暗櫃的壓迫而不敢現身。所以同志熱線教育小組的現身行動正是讓教室中隱形的青少年同志看見真實的其他同志朋友，才有勇氣與力量強化自己的同志認同，達成朱偉誠所認為的：不認同是因為沒有什麼好認同，不現身是因為沒有什麼好現身。

近年來，關於現身的研究，已經開始細緻探討同志現身的過程，分析出同志願意現身的特定條件（周佑儒，2007；陳培驊，2005）。周佑儒（2007）以敘事分析的方式，透過五位大學男同志學生的出櫃經驗，分析出櫃的因素，例如自身

¹⁵ 在婦女新知所出的期刊《騷動》，有幾篇文章在探討 1990 年代從英美引進「現身」概念對台灣同志運動的影響，並且開始質疑完全的現身策略可能會讓同志本身在生活中面臨之後更大的壓力。像是趙彥寧（1997）就認為當前出櫃與否的問題不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問題，而是必須去省思出櫃對於台灣同志的現況意義為何。另外有兩篇文章也開始初步釐清同志現身的層次差異，例如在媒體、學術、家庭的現身策略與劇碼，但兩篇文章的立場仍隱約把現身視作獻祭的牲品（王皓薇，1997；齊天小聖，1997）。

認同程度、家人態度、同儕是否友善，以及不同性別對同志議題的接納程度。他也探討出櫃的策略，像是直接表明同志身份、藉機向好友出櫃，以及使用不承認也不否認的方式。他發現出櫃的男同志在之後的校園生活中擁有情慾宣洩的出口、更能認同自己的同志身份，也更願意為同志發聲。我認為周佑儒的研究清楚地描述出同志學生現身的經驗與心境轉變，只是，就運動策略的啟發而言，可能會讓現身仍化約為原子化的個體行動，而變成強調現身是個人考量到現實環境的種種壓力所做出的抉擇，是一種理性計算下的行動，而忽略集體力量充權（empower）現身的可能。陳培驊（2006）以花蓮的瑪拉同志團契為研究對象，發現四種同志現身的場域與對象，包括：在姊妹的親密關係中現身、在家庭的兩代關係中現身、在學校師生的權力關係中現身、在教會信仰的權力關係中現身。他在結論中提出「現身」不能單純地被視為同志個人所選擇的政治行動，而應該從更高的視野俯瞰社會整體結構；同志要走出的不只有一個社會這個大衣櫃，家庭、職場、學校、教會、軍隊等都存在許多小衣櫃，因此同志現身並非針對單一對象的單次抵抗，而是在不同的處境下、不同的關係脈絡中重複經歷出櫃過程的千折百轉。陳培驊的研究試圖把現身拉出個人的政治選擇，從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關係來觀看現身的可能，雖然在結論中提出現身作為一種集體行動的力量，仍沒有太多著墨與分析。

透過上述既有研究的爬梳，我認為校園中以現身為同志運動策略是必要的。在同志運動剛起步的 1990 年代，同志現身的確有很大的壓力，尤其來自家庭中最難的情感的超越，但如果一直把現身當作是同志運動最後的目標，反而讓同志運動無法繼續前進。現身不只是目標，更是策略，並不是同志現身之後對於同志的污名就消失殆盡，現身之後，要達到異性戀對同志的理解與承認，還有好大一段距離。基於過去台灣相關的研究並不太關照同志現身在運動上實作的困境，較多只談到社會、家庭的壓力困境，所以我的研究有機會以教育小組的現身行動，來探討目前同志在教育場域現身所面臨的各種處境，提供同志運動在以現身作為策略上更完整的圖像，而不只是著重在道德與家庭壓力，使得同志教育現況躊躇不前。另外，目前也沒有任何性別教育或同志教育的研究以同志族群的現身作為研究主題，上述提到的研究都是集中在同志學生或是教師身上，而教育小組的特殊性就在於：由同志現身在教室中訴說自己的生命故事作為一種同志教育。而分析此特殊性所遭受到的限制則是本研究的主要關懷。

當同志運動進入到校園後，會出現什麼問題呢？校園作為一個保守的教育場

域，教育小組的論述勢必無法像街頭抗爭一樣基進，反而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同志教育是否變成一種「同化」(assimilation)教育則是本研究首先關注的議題。Iris Marion Young (2001) 批判社會運動當中的同化觀點消弭了被壓迫團體的特殊性，她以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北美印第安人運動、同性戀平權運動與女權運動作為例子，分析這些運動當中都有差異政治的兩難。上述這些運動在初期都以去差異化的公民權為目標，立基在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下，要求法律與政策給予平等權益的立法。但 Young 認為自由主義的立場沒有看見團體之間的差異性，反而會產生壓迫的後果，並指出三個對自由主義運動的批判觀點：第一、並沒有去挑戰支配團體既有的標準與規範，第二、忽略團體的特殊性，將使得特權團體的經驗成為普遍性與一致性，第三、被壓迫的團體會內化自我貶低的想法。更重要的是，Young 認為一方面自由主義的人本主義 (humanism) 把人當作一個個體，忽略種族、性別、宗教與族群的差異，而產生形式平等的建制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ormal equality)；另一方面自由主義下的多元主義 (pluralism) 想廢除團體差異的公共性與政治性，維持並促使個體與集體的多樣性留在私人的或非政治的社會脈絡。她精闢地道出，在公共政策上忽略差異，不表示被壓迫團體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忽視，尤其當法律和政策還持續宣稱一切皆平等時。

我在田野常常會聽到「多元性別」、「尊重」等字眼，但卻感覺到教育小組的論述有時候會落入 Young 所說的同化觀點。研究差異政治的學者 Steve Seidman (1993) 表示後現代主義提到的多元、在地、交錯的鬥爭不傾向「支配的終結」或「人類解放」的論調，而是創造一個社會空間，在個人化和民主化模式中鼓勵愉悅、慾望、不同聲音、不同旨趣在此社會空間中擴散。後現代主義的立場讓新社會運動有施力點，像是加入新社會運動精神的同志運動，鎖定的戰場不是街頭，是在制度的承載者，例如學校、醫院、精神科機構、監獄，這些都是製造壓迫的認同與社會規範的重要場域。以往個人不會在政黨及社團顯示自己的性傾向和種族認同，因為這些差異認同是不穩定的及排他性的 (exclusive)，我們可以大聲的說自己是個工人，但不會大聲的說自己是同志，因為藍領工人的社會壓迫根植於經濟與階級安排，新社會運動的社會壓迫則固定在更穩固的集體文化再現。這麼說也許並不為過：在社會空間中，許多人寧願當女人或工人，也不要當同志。

任何想要整合特殊性 (particularity) 與多樣性 (multiplicity) 的慾望都會使差異變成排他，因為差異的意義是特殊的、變化的、異質的，不是他者、對立的

(Young, 2001)。藉由對差異政治的討論，我所欲提出的是，當教育遇上社會運動，需避免走上自由主義的人本主義與多元主義，而應以差異政治作為目標。或許有讀者看到這裡，會認為在學校能做到不歧視弱勢者即可，所以讓學生每一個人都學會尊重的觀念最為重要。但此想法仍停留在原子化個體的概念上，好像「每一個人」都能在學校學會尊重的能力就可以治本，但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卻告訴我們，光是一個潛在的同志學生要肯認自己的同志身份、說出自己是同志就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勇氣，根本原因是同志與異性戀雙方對於「差異」的恐懼。

對於差異的恐懼描述，Frantz Fanon (2007) 的研究可說描述得維妙維肖，在《黑皮膚白面具》中不僅分析法國殖民地安的列斯的黑男人與黑女人自卑與恐懼自己的心理，同時也分析白人無來由對「黑」的恐懼，以及白人承認黑人時為何會猶豫。最後，Fanon 認為要「去異化」白人與黑人的方法為，黑人必須為自己的自由而鬥爭，而不是在白人的自由及正義庇蔭下而活，黑人的歷史只有在黑人開始為自己鬥爭之後才開始。

後殖民教育學家 Paulo Freire (1993) 的《受壓迫者教育學》，站在第三世界貧窮的人民在經濟與文化上受壓迫的位置而寫。提出壓迫者利益所產生的教育學，其實是一種家父長式的假慷慨 (false generosity)，壓迫者的假慷慨仍繼續維持一個不公平的社會秩序。處於壓迫情境的受壓迫者產生心理二元性，既想追求自由卻又受內化的「壓迫者形象」影響，恐懼地追求著自由。Freire 說得好，假慷慨無非製造了壓迫情境：當某一方 a 在客觀上去剝削另一方 b，或是阻礙其追求自我肯定 (self affirmation)，不讓其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格個體時，就是一種壓迫，它在現實環境中生產出「生命中遭受放逐的人 (rejects of life)」(Freire, 1993: 37)。

教育小組的校園演講行動就像 Freire 在南美洲第三國家所進行的教育行動，可以說是一種認知解放的社會運動。回顧同志運動以及差異政治的研究，可以提供我們看到運動和教育結合時的盲點，所以我認為不去看到性傾向、情慾與性上的差異，則無法接近同志教育的目標——社會正義與社會平等。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田野描述

本研究主要透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所收集到的資料，分析所提出的問題意

識。參與觀察可幫助我瞭解義工的各種行動與對話以及義工和聽眾間微妙的互動腳本；深度訪談則捕捉義工更細微的認同過程，還有沒說出來的各種情緒與矛盾。我以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教育小組為觀察對象，除了具有同志現身教室演講的特殊性之外，也有當前教育現場同志教育實作的代表性。

（一）參與觀察

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教育小組的義工，每一個人帶著自己的生命故事，在學校老師、學生及助人工作者面前現身（出櫃），近距離地展現出同志的真實面貌，並用自己的生命故事一一回答現場的問題。不管演講邀約的地點多遠，只要一通電話，即便在人力與經濟吃緊的狀況下，教育小組也會想盡辦法「到校服務」。

教育小組演講場次從 2004 年開始逐年上升，一直到 2009 年底完成近五百場的演講¹⁶。教育小組的業務主要由五位正職人員中的阿球作為領導者，帶領近三十位參與教育小組的義工共同完成。2004 年第一次的（羅東）高中入班演講，就以同志義工現身講述自己的生命經驗，此風格成為同志教育一個重要的資源及表現方式，相較於其他性別議題的資源，稀少的同志教育資源，讓教育小組的存在更具重要性及獨特性。不經由專家學者來告訴老師、學生和家長同志是什麼，而是同志朋友親自現身述說生命經驗，讓他們認識到真實的同志，透過同志義工在異性戀世界的生命經驗，把聆聽的異性戀拉進義工的故事中，建構共享的意義網絡，最後道出：這並不只是同志的議題，也是異性戀的議題。

2009 年 5 月，我開始在同志諮詢熱線的教育小組當義工並開始紀錄我的參與觀察。目前最遠去過金門與屏東的國小演講，平均每個禮拜去一所學校或是一場演講場次。限於經費、交通距離與人力，邀請我們的學校大多集中在新竹以北，尤其台北縣市的國中小最多。我主要觀察的部份著重在進入校園的過程、義工和學生的現場互動以及義工們與老師進行的會後討論，從義工、學生、老師的話語中可以收集到對於性別的想像與期待。

我的參與觀察紀錄方式主要包括三種，第一種為直接在現場觀察到的突發狀況，隨時寫下的關鍵字或對話。第二種為現場錄音，包括整場演講過程與事後討論的內容。第三種為當日觀察後所做的田野筆記，在演講結束回宿舍後馬上整理

¹⁶ 2007 年教育小組共有 233 場演講，2008 年有 322 場演講。

紀錄下當日觀察的小細節。

在 2009 年 12 月初，有一場特別的演講經驗，那是連續五天的花蓮巡迴演講，邀請者李雪菱老師安排了花蓮各個國小的老師場、父母場及入班的學生場演講，因為演講場次高度密集及類型多樣，觀察到義工間彼此間對性別教育理念有所差異，學校老師和義工間各式的互動，幫助我對於目前性別教育有更快及更深的理解與體驗，活動結束後我也和雪菱老師建立起良好關係，在私下的閒聊與互相鼓勵的對談中知道她在性別教育中推動同志教育所面臨到的壓力。她讓我看到就算是再渺小的個人也不能放棄衝破結構困境的可能性。

另外我也參與教育小組固定的開會。教育小組 2009 年 9 月到 2010 年 1 月之間每個禮拜二晚上開會一次。從 2010 年 3 月到 6 月因為招生的關係，義工人數增加後分成週二班與週四班兩班，第一個月隔週開會一次，第二個月開始每週開會，主要是一週義工的生命故事分享，一週認識各種同志族群與同志議題。每次開會也會檢討演講現場的各種狀況，包括義工演講過程產生的不舒服或是遇到學生犀利的問題無法招架。教育小組的開會並不是一臉正經地進行，反倒像是同樂會一樣，邊吃東西邊開玩笑，這樣輕鬆的氛圍時常也會流露出細微的互動，因為自己也是義工之一，所以很快就熟悉教育小組的成員。有時候阿球（教育小子的領導人）會開玩笑說我正在做教育小組的研究，要大家小心自己的話變成別人論文的一部分，要男同性戀義工收起 bitch 的態度。

（二）深度訪談

田野觀察能捕捉的是研究對象當下的互動與對話，我將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個體的主觀詮釋及對事件的理解。我主要訪談的對象是學校老師與教育小組的義工群。身為義工，讓我有機會可以和邀請教育小組到校演講的學校老師有直接面對面接觸的機會。通常我是在演講結束後，主動向老師表明我目前研究生身份及研究主題，邀請老師成為訪談對象。

目前我已經去過 21 間學校演講同志議題，包含國小到大專院校以及學生場與教師場。我訪談了 3 位高中老師¹⁷、4 位國中老師¹⁸及 2 位國小老師¹⁹，如表 2

¹⁷ 莊敬高中的秀英老師並非和我一對一的訪談，而是在一次熱線教育小組會議邀請秀英老師來演講自己邀請熱線的過程與困境分享，我採用會議當中她的演講內容。

¹⁸ 和平國中玉蘭老師的訪談來源同上。

所示。在教育小組義工的部份，目前義工分成工作人員、講師組、進階組、週二組、週四組、外部支援組及教育小組之友，我將以工作人員、講師組、進階組、週二組、週四組為主要訪談對象，此類義工長期且密集地參與演講及開會，所以對於演講及開會狀況最為熟悉，訪談名單如表 3 所示。

表 2 學校教師受訪或演講錄音資料一覽表

編號	姓名或化名	性別	就職學校級別	邀請熱線的場次性質	位置
1	玉蘭老師	女	和平國中	入班演講	新北市
2	志明老師	男	公誠國中	入班演講	桃園縣
3	秀英老師	女	莊敬高中	入班演講	桃園縣
4	麗華老師	女	禮樂高中	入班演講	新北市
5	淑芬老師	女	溫良高中	入班演講	台北市
6	美玲老師	女	自強國小	教師研習	台北市
7	怡君老師	女	公誠國中	入班演講	桃園縣
8	雅婷老師	女	公誠國中	入班演講	桃園縣
9	詩涵老師	女	博學國小	教師研習與入班演講	屏東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 教育小組義工受訪資料一覽表

編號	化名	年齡	心理認同	性取向	生理性別	組別
1	阿球	32	男生	男同性戀	男	工作人員
2	智偉	32	男生	男同性戀	男	工作人員
3	Seven	25	男生	男同性戀	男	講師
4	小魚	28	男生	男同性戀	男	講師
5	Winter	?	?	雙性戀	男	進階組
6	妖妖	27	男生	男同性戀	男	進階組
7	小莫	27	男生	男同性戀	男	進階組
8	Ling	21	女生	女同性戀	女	進階組
9	樂高	21	女生	雙性戀	女	週二組
10	Gaia	21	女生	?	女	週二組

¹⁹ 屏東博學國小的詩涵老師，因為時間與距離的關係，我是利用電話進行訪談。

11	Zoe	27	女生	女同性戀	男	週二組
12	柏豪	20	男生	男同性戀	男	週二組
13	小小海	22	男生	男同性戀	男	週二組
14	金金	27	男生	男同性戀	男	週二組
15	逸璇	23	女生	女同性戀	女	週四組
16	香菇	26	女生	女同性戀	女	週四組
17	小崔	22	女生	女同性戀	女	週四組
18	小 high	22	女生	?	女	週四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對學校老師的訪談著重在個人對於性別教育的想像與期待、自身的校園性別經驗、推動同志議題性別教育的過程以及對教育小組演講內容的想法。針對教育小組義工的訪談，著重在演講方式的呈現、演講內容的取捨、演講過程義工、學生與老師的互動、開會時的討論流程、私底下和其他義工的相處、互相學習、人際網絡、從菜鳥到講師的歷程。透過這些問題，除了理解每個行動者的對性別教育及演講的經驗外，更重要的是理解不同行動者對於性別教育、同志教育與演講實作的詮釋。

(三) 田野概述

我的田野樣貌並不是在一個固定的地方駐點，而是跟著教育小組四處演講，所以並不打算描述目前我去過的每一間學校的演講情況，而是藉由描寫一位義工完成演講所必須經歷過的階段，讓讀者們瞭解演講概況。教育小組的演講工作可大致分為演講前、中、後三個階段，下面將以 2009 年 10 月 6 日教育小組義工 Gaia 在長庚技術學院演講作為田野描述的例子，並加入我自己田野觀察的部份。

一、演講前的討論

對聽的人來講是八點的課，那我們可能五點就要起床，六點就要出門，而且就是要到那麼遠的地方，不是每次因為遠就可以坐高鐵，就可能還是要坐火車，坐客運，坐到那的時候還要轉車，幸運的話還可以坐終點站就是我要到的地方，可是很多都是那種你上車也不能好好的睡覺，像埔心那次，它就是小站，你要那麼早起，你又不可能休息，然後就加上演講的過程中，很多的情緒，很多的回饋什麼的那真的很累。(20100820 小莫深度訪談)

交通對於教育小組來說並不是小議題，義工到非台北縣市的學校演講一定要處理好交通的問題，否則將會因為找不到學校或是時間沒計算好，而遲到甚至缺席。距離的遠近與到場義工人數的多寡呈反比，除非有足夠的交通費補貼，不然偏遠地區的學校，教育小組大概只會派一至兩位義工前往，例如中部地區可能是三位上下，東部和南部則最多只能兩位，而外島學校經費只夠一位義工往返，不過有可能在演講順便遊玩的條件下，人數會增加，例如 2010 年 10 月到澎湖鎮海國中的演講就是義工們自己掏腰包加上少額的補貼才得以多人成行。

回到長庚技術學院的例子，阿球、Gaia、小米、屁屁與小丁，五個人一起坐客運到林口的過程中，彼此會討論待會演講場次的性質，包括男學生多還是女學生多、邀請的老師希望談的議題以及義工間能講的生命故事有哪些部份。透過對議題的分配，有些義工可以講家庭議題，有些則可以講認同議題，可說是一個沙盤推演的過程。義工們也會在路途中有說有笑地藉由聊天認識彼此。

演講前義工間的互動與談話，除了是為演講打好草稿之外，也是義工認識他人性別認同、分享對性／性別看法的短暫時刻。像是 Gaia 因為還沒找到自己的性別認同，不知道自己是女同性戀、女雙性戀或是女異性戀，但在打扮上偏向中性、運動風，小米就很直接的說：「我實在很難想像你旁邊有一個男生或女生的樣子。」讓 Gaia 甚至回到家都在想著自己的性別認同到底是什麼，最後還是不知道。

在我演講過的場次中，都是事先討論好演講形式與內容分配，尤其在入班演講時，更要互相先協調好演講進行的順序。入班演講的模式還算固定，通常會有兩到三個義工上台演講，其中一位演講經驗豐富的義工為「主講者」，其他的義工或是新進義工為「故事分享者」。當確定誰是主講者之後，主講者必須要知道其他故事分享者簡化版的生命故事，並快速地從故事中分類出「可以講」的故事，然後再跟故事分享者確認，讓故事分享者知道在演講中可以講什麼故事。而主講者並不需要講故事，他的工作主要是主持與演講同志基本知識，這一部份我將在接下來的「演講內容與方式」中說明。

（二）演講的內容與方式

長庚技術學院這場講座的名稱為《「同言同語」一聽同志說故事》，很明顯地把主題寫出來，但很多場次的演講標題卻不一定會出現同志兩個字。教育小組的

演講流程有一定的模式，以長庚這場為例大致分為四個流程，除了第四個生命故事分享以外，其他部份由主講者負責演講。

第一、需要暖場。所使用的方法有：猜猜在場五人誰是同志？以及詢問當聽到「同志」這個詞的時候會想到什麼？前面這兩個小遊戲很容易引起台下的興趣，尤其當性別氣質處在中間的義工群，往往讓台下的人一頭霧水，例如台下的人就不確定 Gaia 及阿球是不是同志，但往往陽剛的男性義工及陰柔的女性義工則是會讓底下聽眾驚呼說：「原來他／她也是同志！」透過此活動，也讓台下聽眾知道同志並不能單純從外觀來辨認。而詢問同學「想到同志聯想到什麼」是入班演講很常使用的開場白，義工會透過同學回應的答案，快速瞭解到整個班級動力²⁰與對同志的觀感，有些班級的同學很踴躍卻都是講出污名的字眼，例如「死娘炮」、「gay 炮」、「娘娘腔」、「人妖」等；有些回應則會講到公眾人物或是電影電視文學，例如蔡康永²¹、《刺青》²²、琳賽羅涵²³等；另外還有同學會講到同志大遊行與六色彩虹。

第二、認識同志 ABC。也就是 LGBT(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簡介，這是屬於知識的部份。要讓聽眾認識同志，就必須先講解有哪些同志族群。通常以最精簡的 LGBT 作為同學認識同志的基底知識，首先會在黑板上寫每個單字的第一個字母，然後要同學猜猜看 L 是什麼、B 是什麼等等類推，通常在雙性戀 (bisexual) 及跨性別 (transgender) 的部份是聽眾比較不熟悉的，例如國中或高中同學會把 B 當成是 BL (男男戀漫畫)。跨性別的部份，教育小組會再細分三個次族群：變性、雙性與扮裝，並舉公眾人物及目前當紅的一些跨性別演藝人員做為例子，例如劉薰愛是變性，利菁為雙性，紅頂藝人為扮裝。

第三、讓現場聽眾猜猜看同志占總人口的比例有多少。通常這部份也兼具暖場的效果，可以建立台上與台下的關係，讓台下的聽眾有參與感。首先，義工會問同學與老師到目前為止認識多少個同志²⁴，在我所參與的演講，平均每場有一半的老師與同學都不曾認識過同志，其他認識同志的數目也只有 1 到 2 人居多。

²⁰ 又可稱班級經營，意旨教師必須在課堂上和班上同學建立起良好的互動關係，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²¹ 台灣知名節目主持人。

²² 2007 年由台灣導演周美玲所拍攝的女同志電影。

²³ 美國新生代知名演員與歌手，在 2008 年美國電台的訪問中出櫃，坦承自己目前的女同志戀情。

²⁴ 這裡通常義工會說明所謂的「認識」定義，例如認識公眾人物不算，隔壁的同學或老師感覺很像是同志也不算。

再來，讓老師猜猜同志占人口比例多少，答案從百分之零點一到百分之五十都有，教育小組以成大柯慧貞老師的研究和建國中學的輔導室校園刊物《心泉》曾經在全校做過的一項調查為答案準則，認為同志人口比例為百分之十左右。往往同學及老師的預測都是低於這個數字。義工接下來會反問他們到目前為止認識多少人，然後以認識 300 人作為保守估計值，最後再問同學和老師：這 300 人裡面應該會認識到多少位同志？答案是 $300 \times 10\% = 30$ 人，讓他們知道自己所認識的同志數目為甚麼偏低。這時，義工就會問他們：「你們活到現在起碼應該要認識 30 位同志朋友，為甚麼卻有許多人認識不到這個數目？」通常老師和同學這時就會理解為甚麼認識的同志人數這麼少：因為這個社會不友善，所以同志不願意現身，不願意向別人訴說。

第四、生命故事分享。生命故事的分享是教育小組的招牌，是跟台下聽眾建立起共通的意義網絡的重要部份。不同義工的生命故事會去回應台下聽眾提出的疑問，而哪個義工講認同議題、哪個義工講家庭議題都會在演講前協商好。生命故事的內容有時候也不一定能全盤托出，必須以演講的狀況來編織自己能說出的安全故事腳本，當然，台下的聽眾也會去質疑並挑戰義工的生命故事。另外，生命故事分享時，主講者會適時向台下同學進一步釐清故事分享者的故事情節，讓同學可以瞭解故事的意義。可以說，主講者和故事分享者必須要一搭一唱的說完生命故事。

上面的流程是義工在入班演講中普遍會採用的演講架構，也可以自行依照實際需求加以變換。在教師場的演講的內容和入班演講不太相似，最大的差異點就是教師場會演講「性別光譜」，表 4 是性別光譜的內容。演講性別光譜的好處是，一方面可以讓台下異性戀老師知道自己也在二元性別的框架下，另一方面可以讓老師知道性別二元的框架充斥在日常生活當中，且往往都是僵固不變的。性別光譜讓老師理解到性別並非一分為二，例如不是男生就是女生，不是陽剛就是陰柔，而是有無限多種的可能性。性別光譜強調的是「程度」的差異，每個人在不同的關係中會有不同的位置，例如義工常會舉例馬英九、陳松勇和阿諾史瓦辛格的陽剛程度是一樣的嗎？另外也會邀請現場老師來說明自己在性別光譜中的位置，大部分男老師會認為：我生下來是男的，我覺得我是男生，我看起來很陽剛與我愛的是女生，沒有什麼變動。但義工有時候會請老師比較現場另外一個男老師的陽剛氣質，在藉由這樣的比較下，有些男老師馬上就知道自己的性別氣質開始往陰柔方向移動或是更往陽剛方向移動。

表 4 性別光譜

屬性	類別	落點位置		
我生下來是	生理性別	公 ←	光譜地帶	→ 母
我覺得是	心理性別	男 ←	光譜地帶	→ 女
我看起來是	性別氣質	陽剛 ←	光譜地帶	→ 陰柔
我愛的是	性傾向	女 ←	光譜地帶	→ 男

資料來源：同志諮詢熱線，本研究整理

通常性別光譜對於老師而言有一半可以理解，有一半則無法理解，尤其當我們以「跨性拉子」為例時，老師臉上會出現迷惘的表情。我以男跨女的跨性拉子為例，其在性別光譜的座標是這樣的：我生下來是公的，我覺得我是女生，我看起來很陰柔（或陽剛），我愛的是女生。通常老師第一個無法克服的問題是：既然一個有陰莖器官的男人喜歡女人，為何他還會想要變性或是認為自己是女生呢？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生物基礎下異性戀思考的邏輯。

（三）演講後的會後討論

會後討論主要分成演講後與定期小組開會兩種。第一種為每一場演講完後，回途的路上義工們會進行會後討論，針對剛才現場的演講狀況提出問題，包括義工是否講錯、義工的生命故事是否沒整理好與義工演講後的情緒等等。除了檢討演講之外，有時候會藉由後討論的機會，把彼此演講合作的心結抒發出來，並且雙方也在這時候進行澄清與理解，但有時候可能是無解。最後，義工也會從演講中獲得新的心得及想法，像是 Gaia 在這場演講過程中反而對同志議題充滿了各種新的疑問：「我是不是誤會了自己？」、「愛上同性是不是只因為想要標新立異？」、「所以我長大之後就會得愛滋死掉囉？」透過彼此的經驗分享與對同志議題的各種看法，就可以學習到當下一場演講遇到同樣情況或問題時，可以有哪些演講方向及應對方法。

第二種定期的小組開會時間與內容如同我在參與觀察所描述的。除此之外，小組開會時間更重要的是分配未來演講工作的人力，阿球會在開會前一個小時內

處理完這個繁瑣的事務，唸出他目前收到的學校演講邀約名單，如表 5。然後要去的義工再一一舉手，熱線的實習義工會紀錄下要去的義工名字並公佈於社群的網頁上。其實分配工作並不是一件無聊單純的事情，在這個認養演講的行動裡面，每一義工除了必須考慮到自己的時間許可之外，還會觀察是否有不想合作的義工舉手想要講同一個演講場次，然後再從中調整，避免同台演出造成不必要的困擾。這個現象在開會現場並無法察覺到，是我在義工深度訪談的時候才知道的。



表 5 演講場次表 (2010 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28 日)

5 月 17 日 (一)			5 月 18 日 (二)			5 月 19 日 (三)			5 月 20 日 (四)			5 月 21 日 (五)		
13:00~14:50 15:00~16:50 南投南開科大 對學生：阿球、諾亞 16:00~18:00 談同志與勞動權：檸檬、奧莉維						15:00~17:00 18:30~20:30 電影欣賞、生命故事分享，對學生：阿球、妖妖、逸璇 13:00~16:00 東勢高工對老師智偉、Afen、香菇			13:05~14:50 南澳高中對 15 位國中老師：阿球、Zoe、小小海、Winter 18:00~21:00 北大北極星、同志人權生命史：阿球、安德魯、金金			09:30~17:30 中華溝通分析協會，工作坊：阿球、香菇、金金、小崔 (下午)		
5 月 24 日 (一)			5 月 25 日 (一)			5 月 26 日 (一)			5 月 27 日 (一)			5 月 28 日 (一)		
						14:00~15:5 東勢高工對學生：智偉、Afen、香菇 13:00~16:00 金門述美國小對老師：阿球、薇龍			15:20~17:20 清大中文系同志與消費，對學生：Seven、柏豪			13:00~15:00 世新陳明莉學生：小莫、自華、阿奇		
和平國中 (小框為班級數)														
08:15-09:00	1 班	海、冬、怡雯、勇	2	Winter、小小海、香菇	1	妖妖、怡雯、Winter、Ling、小崔、勇之助	1	Zoe 小南、Winter 樂高、阿仁、逸璇	2	怡雯、金金、妖妖、Winter				
09:15-10:00	1	同上	0		0		2	同上	0					
10:15-11:00	0		1	Winter、小小海、香菇	1	妖妖、high、冬天、Ling、小崔、勇之助	0		3	Winter、妖妖、小high、怡雯、金金				
11:15-12:00	2 班	妖、金、海、崔、菇、龍、勇	0		2	High、Winter、Ling、小崔、勇之助、阿仁	0		0					
13:15-14:00	3 班	妖、金、海、崔、菇、龍、勇	3	Winter、香菇、阿仁、金金、安德魯、勇之助	2	妖妖、Winter、小崔、勇之助、阿仁	0		0					
14:15-15:00	0		2	Zoe (14:15 之後)	1	妖、Winter、小崔、勇之助、阿仁	2	小南、Winter、樂高、逸璇	0					
15:20-16:05	4 班	同上加樂高	2		5	妖、Winter、小崔、勇之助、阿仁、安德魯	0		0					

資料來源：同志諮詢熱線，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分為五個章節。在第一章中，我說明了研究熱線教育小組行動的背景與研究問題，並透過參與觀察描述了田野的基本樣貌。第二章我將先從熱線的外部困境著手，討論同志教育在性別教育當中的位置，並分別指出同志教育在學生場靠著課程的親近性得以入班演講，在教師場則受到性騷擾、性侵害與家庭暴力議題的影響，而不被關注。接著說明熱線教育小組入班演講的過程，我區分出教師面對的四個行動者：上級、同儕、導師與家長。最後從教師的邀請動機帶出同志義工必須考慮到教師立場的演講限制。

立基於第二章制度與結構層面的分析，第三章我進一步探討演講中同志義工的論述實作。首先，說故事是熱線在同志教育的賣點，我觀察到義工為了符合演講的效果，必須對自己的生命故事加以隱瞞與包裝，也促使義工對於典範故事的崇拜。再來，面對學生場對於性的好奇與問題，義工以教師立場與同學態度為座標軸，進行回應性議題的四種劃界工作：反擊、個人隱私、開門見山與移花接木。另外，在教師場，我發現義工處在性別流動說的兩難，在異性戀邏輯的框架下，同志義工的性別流動認同論述最後仍被轉化流動到異性戀的性別論述。最後，透過教師在演講現場的消毒動作與難得的激烈反對聲音，道出目前在同志教育中仍有大量難以揭露的偽善教師及其對「烏托邦」的人本教育想像。

第四章則回到組織內部，分析演講現場實作對同志義工主體的影響，試著從義工的情緒與反思更進一步瞭解同志教育的實作困境。為了避免在演講中說出不該說的話，我觀察到義工在合作關係中會互相監督彼此的論述，形成一種同志為難同志的現象。還有受到學歷象徵性的影響，義工的背景一方面可成為演講的助力，另一方面沒有教育相關領域或高學歷背景的義工則會產生難以言喻的複雜感受。在典範故事的影響下，說故事開始有隱微的比較心態，加上一場接著一場的龐大演講量，義工開始不自由地說故事，並漸漸和自己的故事異化，無力感也同時席捲而來。最後，義工在盡量不碰觸敏感的異/同性戀間性/別差異議題並以「尊重」為演講的目標下，導致同志教育中的同志主體性漸漸消失。

第五章簡要整理二、三、四章的討論，並進一步和理論對話，最後提出我對同志教育與校園青少年同志處境的一點建議。

第二章 同志入班演講的結構限制

在《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之後，性別教育如火如荼地在各級學校課程中實行，以往不被關注的議題開始受到重視，本研究所關注的校園同志教育即是如此。R. W. Connell (1985: 51-4) 分析當代性別研究的各種理論框架，認為性角色理論 (sex role theory) 過度簡化性別 (gender) 的複雜性，把陽剛氣質與陰柔氣質化約為一個相對立的二元論，例如所有的女人都擁有一樣的陰柔氣質角色，男人抑是如此。他認為性角色理論的問題在於兩個規範性 (normative) 特質，第一，它預設人們普遍把性角色當作適合生活的方式；第二，不論是在社會功能或是生物學上，此理論支持者認為性角色是人類適合生存的模式。

從對性角色理論的批判分析，Connell 提出規範性而非標準 (standard)，來解釋性相 (sexuality) 在社會中，是依照權力在位者的期望所安排。以核心家庭為圖像的各種統計數據，不過是神職人員、廣告與在位者所塑造的，並不符合現實家庭的主要形式。先生為主要持家者 (breadwinner)，太太為家務勞動者 (home-maker) 只是一種規範性模板。反而，在第三世界國家，女性往往才是外出勞動、賺取家用的人，男性則不在勞動力市場當中。不意外地，規範性模板的性別預設，會生產出「偏差行為」、「偏差認同」與「失調成因」等名詞，來對照於並強化「成功的性角色學習理論」(successful role learning)。舉凡同性戀、同性性行為、貞操、性工作、婚姻暴力與跨性別，都可能被套上個人的怪癖，或是不適當的社會化結果，而消除了性別關係中的權力要素 (Connell, 1985: 52)。

回到學校的性別教育，這一章我藉由 Connell 的規範性解釋，進一步指出的觀點是：性別教育往往會淪為「規範性」性別教育，也就是權力較大的擁有者能接受的性別教育。這不僅是正常與不正常的區別而已，透過揭開在位權力掌握者的理想性別教育框架，或許更能看到權力關係下性別教育的真實樣貌。如果異性戀體制仍是性別教育的規範式模型 (normative model)，那不管制度怎麼修訂，作為他者的同志教育仍是被邊緣化或被忽略。所以必須先清楚描述出目前的性別教育長得是什麼樣子？是否只是親近於權力在位者所希望或能接受的樣子？當對口的老師欲邀請熱線進入校園演講同志議題時，又會受到哪些阻力？我認為檢視這些阻力是否仍存在於校園中，對於《性別平等教育法》能不能夠落實各種性別議題的實施是重要的。

本章首先詳述同志熱線如何靠著《性別平等教育法》，獲得進入校園談論同志的管道，以及如何受到其他性別議題排擠而受阻的潛規則。再來，討論實作層面上，裡應外合的學校老師（關鍵老師）如何面對學校各層級人員、同儕與家長的壓力。最後是理解老師邀請熱線演講同志議題的動機，因為每個老師背後對性別或是同志的認識與立場並非同質的，而這也是熱線和老師維持長期合作關係重要的環節。

最後，教育作為熱線開展同志運動的場域，當《性別平等教育法》給予政治機會與資源讓熱線得以進入的同時，熱線又如何評估這些機會與資源？運動的政治機會並沒有讓熱線能夠直接的進入校園，這個機會的管道還需要其他的行動者參與才有達陣的可能。這一章我希望藉由爬梳熱線進入校園的途徑，來說明熱線在校園同志運動的結構限制，尤其是刻劃出同志教育目前在性別教育當中的處境樣貌。第三章則接著第二章繼續探討在此結構制度下，一系列認知解放的複雜行動，第四章最後回到運動者的主體上，運動者在面對結構制度與認知解放行動所產生的為難、相互比較與無力感，最終會影響組織在校園的行動。

第一節 同志教育在性別教育的座標位置

《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立法精神是值得讚許的，尤其從《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變為《性別平等教育法》更可看出法律不僅保障了女性就學的不利處境，也看到了不同性別氣質與性傾向學生的就學權利。在課程上，也規定融入男女平等與同志平權的觀念。《性別平等教育法》讓以往在學校不太重視的各種性別議題開始有正當性。尤其同志教育能走入校園當中，《性別平等教育法》絕對是開啓這扇門的一個重要的鑰匙。對於《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第一項明確的規定：「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育方式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第十七條更直接規定要求學校實行性別教育課程：

學校之課程設置及活動設計，應鼓勵學生發揮潛能，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

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

大專校院應廣開性別研究相關課程。

學校應發展符合性別平等之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粗體為作者所加)

在《性別平等教育法》作為靠山下，熱線進入校園的機會增加，但仍需要校園老師的邀請才有機會。在規定國民中小學每學期至少要有四小時的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下，製造了國小與國中校方對於性別教育的需求。但從上述所列的法條來看，性別教育的內容並沒有強迫一定要包含同志教育，這也讓同志教育在性別教育上可有可無。那為何一開始我前面說熱線能進入校園演講是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呢？

在《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更深入的說明性別教育課程必須包含的面向，即「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以提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粗體為作者所加)」細則清楚交代國中小的性別教育課程應有情感教育、性教育與同志教育的面向，所以想邀請熱線到學校演講的老師在《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下，其實是有力量面對學校的壓力，邀請熱線進入學校甚至班上演講，因為法條上清清楚楚規定著可以教授同志教育的課程。

除了性平教育法之外，讓熱線進入校園更重要的關鍵人物(key person)就是扮演對外窗口角色的教師，可以說，沒有這些關鍵教師，熱線難以進入到學校中。去年(2010年)，我演講過的台北縣和平國中²⁵與台北市仁愛高中，也都因為關鍵老師調職或是學校課程安排的緣故，而無法繼續邀請熱線，因為沒有老師願意繼續辦下去。另外，台北市內湖區的忠孝高中後來也沒再邀請的主要原因也是關鍵老師離開學校。所以，關鍵老師的位置具有重要的引介功能，而他們也必然會在校園體制內遇到各種不同的壓力，此部份將會在第二節詳細說明。

(一) 入班：輔導課與親近性課程的議題嫁接

但哪個課程可以教性別教育則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在國中、小(一到九年級)主要是由學校的輔導室辦理性別教育課程相關事項，輔導老師如果邀請熱線到班級演講，會放在輔導活動課上。台北縣的仁愛國中、台北市大安區的信義國中和桃園縣的公誠國中即為此情況。

²⁵ 下面所提到的所有學校以化名表示，但保留學校的縣市。

還有一些隱藏時段學校也會邀請熱線，但卻不在班表上的任何一堂課，也就是早上朝會時段。對於熱線而言，朝會場意味著不是面對一個班三、四十人的情況，而可能是在短時間內面對一整個年級或是一整個學校的學生。我曾和熱線義工夜盲與小莫一起搭著早上六點半的火車，從台北車站到桃園縣某國中的朝會上演講同志教育，等到訓導主任訓斥全校學生排隊的秩序之後，我們演講時數前後僅 40 分鐘，比搭車的時間還短。當月份演講量較多時，這種時段的演講通常熱線都不太願意接，因為並無法講到深入的內容，學生也不會專心聽。

上面是熱線進入國中演講的主要途徑。在高中／職的部份，因為輔導室並沒有「輔導活動」這樣自主教學的時段，所以如果是輔導老師邀請的入班演講，輔導老師通常必須向班級導師借課，或是使用其他「非升學考試課」。例如在台北市勤毅高工對高二學生的演講，就是輔導室利用綜合活動課、健康與護理課或生涯規劃課來實施。

有趣的是，高中／職學校會請熱線演講的不只有輔導室老師，另外還有公民、護理與家政（生活科技）老師也邀請過熱線入班演講。當公民、護理與家政課的老師也想邀請校外的同志團體到班級上演講，必須要在自身課程當中找到和「性別」相關連的議題與內容，才能嫁接到同志議題，進而把熱線引介到班級當中。表 6 是台北市某高中上學期課表。



表 6 高中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數學演練	地理	國文	公民與社會	班會
歷史	公民與社會	英文	國文	國文
基礎地球科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基礎化學
基礎地球科學	國文	音樂	英文	基礎化學
午休				
論語孟子選讀	美術	生活科技	自習	國防通識
體育	歷史	生活科技	體育	數學
電腦生命生涯	英文	地理	健康與護理	英文
綜合課程	英文課輔	團體活動		

(本表由本研究整理)

熱線在國中入班演講的部份，學校對外的窗口幾乎都是輔導室老師，由輔導室老師處理演講的整個流程。由於並不像國中有專屬的「綜合輔導課」可以使用，高中輔導室老師要請熱線入班演講，大多可能會向導師借「綜合課程」或其他課程來上。因此高中的入班演講，大部分邀請的老師並不是輔導課老師，而是其他課程的老師。像是台北市文山區溫良高中的淑芬老師，已經連續四年邀請熱線到她的公民課演講一節課；還有台北縣禮樂高中的麗華老師，也曾邀請熱線到她的家政課，演講兩個小時的同志議題；以及已經合作七年的桃園縣莊敬高中秀英老師，會請熱線到她的護理課上演講。

顯然地，高中並沒有課程是有討論同志議題；而且高中的公民課、護理課與家政課並沒有和同志議題直接相關。但老師們表示，其實透過議題的「迂迴嫁接」，同志議題還是可以在這些課程當中現身。例如，溫良高中的淑芬老師認為，只要公民課本有提到同志相關，就算內容佔得篇幅並不多，還是可以請熱線的義

工來演講：

後來公民已經變成考科了，考科之後課本就有，那當然你提到的性侵害、性騷擾跟家暴，我們第一冊的社會就有，放在不同〔的三節〕課，但是這三課的篇幅是差不多的，甚至連紐約石牆運動都介紹了…還有智偉的照片也放在課本上，可是照片是放在後面的多元文化，可是它那個背景就是同志諮詢熱線，那一年智偉有來我們學校，我還請同學翻開那一頁，讓同學看到活生生的同志從照片走出來…所以我是覺得性侵害好像比較少一些，反而是家暴、性騷擾、同志這部份，同志就自成一個小單元。

除了公民課以人權嫁接到同志議題之外，老師也會把「擴充」教學議題作為另一種解釋，邀請熱線入班演講。目前的家政課不再只是學習家務勞動的內容(例如烹飪或是縫紉)，也開始教授有關兩性的課程，像是分手技巧或是婚姻的社會功能等。教授家政課的麗華老師，以生命教育為出發點，開始在家政課上談論愛情、婚姻，雖然主要仍是以異性戀關係作為主軸，但因為想讓自己的教材內容趨向完整，於是她以性別文化為主題加進同性戀議題。

(二) 教師研習：性騷擾、性侵害與家暴防治的排擠

根據「98 年教師在職進修統計年報」，全國在職老師平均年度研習時數有 64.05 小時，比去年增加 13.11 小時。在各教育階段當中，可能是因為週三下午都有辦理進修活動，以國小老師進修情況最為踴躍，一年平均有 88.42 小時，比去年增加 17.08 小時，其次是國中老師(47.5 小時)及高中/職老師(34.85 小時，39.38 小時)，全國各級學校及單位舉辦的教師進修活動，也比去年增加 4 萬 8 千多個場次。

舉出逐年增加的教師研習數量，是因為教師研習也是熱線主要的戰場之一。從國小到大專院校的教師研習都有邀請過熱線去演講，我的研究以國小和國中老師的進修或研習為主。對熱線而言，對學生的演講效果其實有限，因為和學生的互動只有演講的幾個小時，但對老師的演講事後效果反而比較大，因為當一個老師聽完演講在想法上有所改變時，他所帶回學校的影響可能是一整個班級的學生，甚至是一整個年級的學生。

熱線能和老師有對話的機會，主要是在教師研習的場合。教師研習的主題在

教育部與教育處的規定下，每學期必須安排特定的議題，再加上教務處、學務處與輔導室都有自己的研習要辦，所以必須讓議題與各處室的研習時數達到平衡。在這種僧多粥少的情況下，老師只能就被分配到的時數，想盡辦法安插進自己想辦的議題。

如果是要對全校老師進行宣導的話，則會在每學期例行的研習會或進修課程中，安插進熱線的演講場次。但這過程並不是只要寫簽呈公文，呈給上級批准就能成功。2009年9月到台北市松山區自強國小對全校老師的演講，就是例行在學期中的週三下午舉辦的進修活動，全校所有老師都要參加並簽名，演講的空間是大禮堂，人很少空間卻很大。和之前其他義工分享的一樣，小學老師會帶著一籃作業本，一進來就坐定位開始改作業。邀請我們演講的是輔導室的美玲老師，老師很熱情地招呼義工，演講完後私下的聊天中，她才說到之前的研習都是請家暴中心的人來講，已經聽了好多場。

性騷擾和性傾害防治的宣導在《校園性傾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第二條規訂：「針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並評鑑其實施成效。」加上家庭暴力防治的觀念較為學校所重視，反而造成性別教育被當成性騷擾防治、性侵害防治與家庭暴力防治教育來對待。使得老師們最後為了滿足規定，在有限的週次下，只辦這三個議題的研習活動。另外，辦研習的經費也決定議題的優先順序，美玲老師無奈地說：「性別教育檢核裡面就會問有沒有辦家暴和性侵的研習，問說有沒有對家長和老師講過及對小孩做課程設計，性侵、家暴、性騷擾是在一起的，所以有些經費非辦這個不可，因為要送成果時能說我有。其他就叫其他類。」

2010年三月底到屏東市博學國小，同樣也是在週三的教師進修活動演講，邀請我們的詩涵老師，對從台北風塵僕僕搭車下來的阿球和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頻頻說屏東的同志資源並不多，很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後來訪談詩涵老師，才知道她是以「兒少保護與性騷擾防治研習」為進修標題，邀請熱線來演講同志議題。對於規定的議題與自己想辦的議題無法契合，以及時數的限制下，她常常必須找出「一魚多吃」的解決辦法：

我們學校是25班以上的學校，所以有輔導室，性平業務分配給輔導組長負責，暑假時教務處會統籌整學期的研習內容，各處室提出需要辦理的研習內容（包含依教育處規定要辦理的和學校依需求辦理的兩部分）。通常我們處

室會提出特教研習一場，輔導知能一場，比如放一部影片"心中的小星星"在描述學習障礙的孩子遇見名師的經過，資料組長做特教成果時就算特教研習，我〔輔導組長〕做輔導成果時就算輔導知能研習。……自從教育處來文指示家暴研習、性侵性騷研習、兒少保護研習都要辦理後，我們發現根本塞不下這些研習。我只好選擇辦一場研習又可以歸類為特教研習、輔導知能研習、兒少保護研習…等一魚多吃的研習。

從此例子可以看出，當輔導室要辦一場研習，必須考慮到兩個層面：第一個是和其他處室一起競爭的進修時段。一學期約 20 週，每學期大約會辦 5 場的研習，這 5 場研習由所有處室自己去調配，所以輔導室所能分到的研習週數約為兩週；第二個是輔導室有必須舉辦的議題，像是學務處必須舉辦的議題有反毒品研習和體育研習，而輔導室必辦的議題有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家暴防治、兒少保護、憂鬱諮詢等。這兩個必須考慮的要素產生每個學期都會焦頭爛額的問題：如何在分配到的有限時數（堂數）中，同時納入自己想辦的議題和規定的議題？表 7 為博學國小的週三教師進修課程表，可從中一窺端倪。



表 7 屏東市博學國小九十八學年度週三活動計畫預定表

週次	日期	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	週次	日期	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
一	9.2	校務會議	人	一	2.24	校務會議	人
二	9.9	受災情緒輔導研習	輔	二	3.3	研習	
三	9.16	人權教育研習(暫定)	教	三	3.10	家庭訪問	輔
四	9.23	縣府文化處閱讀研習	教	四	3.17	教室佈置觀摩	教
五	9.30	運動會籌備會	學	五	3.24	性騷擾防治研習	輔
六	10.7	反毒知能研習	學	六	3.31	園遊會	學
七	10.14	閱讀知能研習	教	七	4.7	第一次評量	教
八	10.21	認識過動症校內研習	輔	八	4.14	研習	
九	10.28	教室佈置觀摩	教	九	4.21	學年會議(課程檢討)	教
十	11.4	兒少保護系列研習	輔	十	4.28	兒少保護研習	輔
十一	11.11	學年會議(課程檢討)	教	十一	5.5	領域會議	教
十二	11.18	家暴防治研習	輔	十二	5.12	研習	
十三	11.25	領域會議	教	十三	5.19	第二次評量	教
十四	12.2	資訊 e 化教室研習	教	十四	5.26	研習	
十五	12.9	學年會議(課程檢討)	學	十五	6.2	教科書評選	教
十六	12.16	準備校慶系列活動	教	十六	6.9	體育教學研習	學
十七	12.23	領域會議	教	十七	6.16	端午節放假一天	人
十八	99.1.6	資訊 e 化教室研習	教	十八	6.23	課程發展委員會	教
十九	1.13	課程發展委員會	教	十九	6.30	休業式、期末校務會議	學、人
二十	1.20	第三次評量	教				
二一		休業式、期末校務會議	學、人				

◎下學期空白處依縣府公文處理

資料來源：屏東市博學國小，本研究整理

我們 3 月 24 號在屏東市博學國小的演講，是以性騷擾防治的標題為名舉辦的。詩涵老師認為，其實也可以用兒少保護的名稱邀請熱線演講，她半開玩笑地說保護同志青少年也是一種兒少保護，為甚麼一定要是家暴、性傾害議題才算兒少保護。在這裡看到對於議題名稱，其實老師有很大的詮釋空間，但一個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邀請的老師們不直接在標題上寫「同志」教育等直接明瞭的字眼呢？台北市自強國小的美玲老師認為，目前社會對於同志議題，雖然表面上好像普遍可以接受，然而學校礙於家長觀感的問題，常常會希望不要出現過於「敏感」、「爭議」性的字眼。她描述著自己在送公文給校長蓋章同意的過程中，就有因為「同志」兩個字寫在公文上而不願蓋章的經驗：「校長第一次有蓋章的時候，是因為還沒有講綱，我就把計畫送出去，當時校長不知道內容講些什麼，可能寫出去的東西是中性、安全的。但當時第二次沒蓋章就是因為看到欣瑞（阿球）的背景，到了前一天才蓋章，想要臨時撤掉是可以的。」我們可以從表 8 台北市松山區自強國小的公文看出標題和演講人中間的曖昧性。



表 8 台北市自強國小教師研習公文

臺北市松山區自強國民小學 98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專題演講實施計劃

一、依據：

(一) 本校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透過講師的講述與志工的生命歷程分享，協助教師瞭解兩性平等教育的內涵。

三、主辦單位：輔導室。

四、實施對象：全校教師。

五、地點：本校 5 樓視聽教室。

六、講座介紹：許欣瑞先生

學歷背景：政大中文與新聞學士雙學位／輔大心理研究所

主要經歷：記者、文字工作者、同志諮詢熱線教育小組召集人、同志父母團體帶領人

專長：同志論述、性別論述、性別教育、同志家庭

現職：臺灣同志諮詢熱線文宣部主任。

七、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主題	對象	人數	講座
9/30 (三)	13:30-15:30	由兩性到性別——開啟你的多元視野	全體教師	90 人	許欣瑞先生

八、經費：依本校預算項下支付，共 3200 元。

九、本研習活動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粗體為我所加

公文中「目的」的部份主要強調「兩性平等教育」，但在演講人的介紹裡卻出現了和目的有所差距的「同志」字眼。另外，從演講主題也可看出，「從兩性到性別」成爲掩蓋「同志」的修辭，我觀察到「性別」在教師研習一直是很好用的詞彙，既不會有男女兩性的框架又能帶進同志議題—同志議題也是性別議題。美玲老師說當初在提這個計畫的時候，困難的地方倒不是在輔導主任，反而主任覺得這個議題在教學上對老師是有幫助的，困難點是在校長那裡，校長曾直接問輔導主任邀請這樣的單位來講會不會不好，講的話題是比較不能接受的，會擔心進修主題和現場演講的內容不符：

因為校長很擔心『同志熱線』這個標題，那個單位名稱他就很擔心。所以計畫書的名稱其實找不出要講同志這議題的名詞，目的寫的其實很浮，比較宏觀的態度認識性別，而非兩性。其實不看主講人的背景，從計畫書是嗅不到一絲同志議題。

在說完上段之後，美玲老師最後說了一句：「如果主講人寫的是某大學教授，校長是無異議通過。」對議題的篩選機制不僅只是有無同志的出現作爲考量之一，更重要的是有無專業的背書。美玲老師認爲大學老師比較不會亂講話（不得體的話），所以比較有保證且讓人信服，話鋒一轉，他突然想到當天阿球的穿著，小小聲的跟我說：「就像那天欣瑞（阿球）穿夾腳拖跟T恤來，主任有點擔心，校長本來就覺得邀請一個有爭議的單位，加上講師穿這樣來，主任在想說可能要黑掉了，這都是很容易出現在學校的想法。」最後，說到校長遲遲不肯蓋章通過的那段過程，美玲老師愈講愈覺得火大：

可能校長那邊得到的訊息也不夠完整，所以壓力就給了主任，到底要不要辦阿！還想說如果校長臨時決定不辦，可能要臨時通知阿球，那時候覺得有點火大，覺得自己又不是在做不好的事情，爲甚麼質疑那麼多，後來相對的想想，其實沒有什麼好生氣的，這也反映出來學校對性別的觀念想法就是這樣，你來做性別平等教育就是要講一些特定的議題，男生要尊重女生、女生同時可以當警察當軍人阿！類似這種老生常談，而且其實這些觀念並沒有進入腦袋裡面，說歸說，你看到女警察女軍人還是會吃驚，像開車如果開得很爛就說這一定是女生開的。

另外也有因受限於經費名稱的規定，的舉辦的老師又想邀請熱線，變成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情況。有一場對國中小老師進行的演講，名稱為「學校衛生保健性教育研習」，就是在教育局給定的標題與會計項目名稱下，邀請熱線演講去演講同志議題。到了現場我才知道，原來這場老師並不是一開始就知道是演講同志議題，許多老師到了現場拿到了講綱，眉頭往往會皺一下，才知道今天聽的演講是同志議題。圖 1 至圖 4 是我所拍攝的教師研習海報。





圖 1 教師研習海報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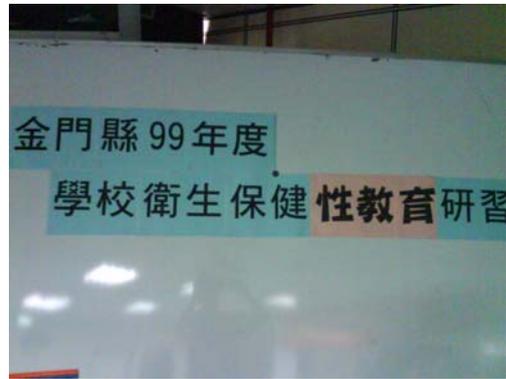


圖 2 教師研習海報標



圖 3 教師研習海報標



圖 4 教師研習海報標

過程當中，不管老師是用中性的字眼掩蓋同志標題，還是因為經費緣故無法更改議題名稱，形成書面與現實操作上完全不同的研習內容，但最後老師們還是可以達到自己原先的目標，雖然迂迴了一些，但有時候就是不能永不妥協。

讓我們回到這一章前面所欲回答的問題：**性別教育長得是什麼樣子？是否只是親近於權力在位者所希望或能接受的樣子？**雖然性別教育並沒有明文規定禁制同志教育，反而規定性別教育的內容必須包括同志教育，可以說在法律上，性平教育法給予同志教育進入校園的正當性，但實作上，同志教育卻可能在現實中不友善的處境下，被邊緣化或排除在性別教育之外。我透過在學生場演講的課程分析，只有和性別、家庭議題親近的課程才比較有機會邀請熱線，像是公民課、生活與科技課和家政課；或是和性教育相關的課程，如健康與護理課；以及導師可以自主使用的綜合課程。這些隱藏的同志課程就藏在學校的課表當中。另外在教師場的演講，輔導教師常常舉辦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或是家暴防治與兒少保護的研習，在週數不足的情況下，往往塞不進同志議題的演講。所以教師變通的方式就是標題名稱不變，但演講內容與演講人改變，於是形成海報標題寫著兒少保護或是性騷擾防治，但講台上卻站著同志義工，演講著生命故事。

第二節 打造入班演講的過程

學校並不是一個各自獨立作業的地方，有許多權力關係都在學校中運作，除了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關係之外，另一種就是老師和老師之間的關係。熱線在入班演講的前製作業流程，必須和邀請熱線的老師一起合作完成，才有機會讓義工成功地進入教室站在講台上發聲。隨著不同的情況，有些學校是公開讓熱線入班演講，有些則是老師私底下邀請，學校並不知道。下面是我剛開始跟演講的田野筆記，紀錄在某學校演講的過程中和校門口警衛的互動情形：

女老師帶我們到警衛室換證，裡面的一些警察看到老師帶三個人，就問要做什麼，老師結結巴巴的說是請來講課的人，不識相的警察繼續問是講什麼課，老師更結結巴巴的說分享一些性別的經驗，那一群警察其中有一位認出女老師的身份才讓我們不用換證的進去，不過當下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入班宣導其實並沒有公開，是老師偷偷地塞進去自己的課裡面。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桃園縣的莊敬高中，當警衛第一次看到一群熱線義工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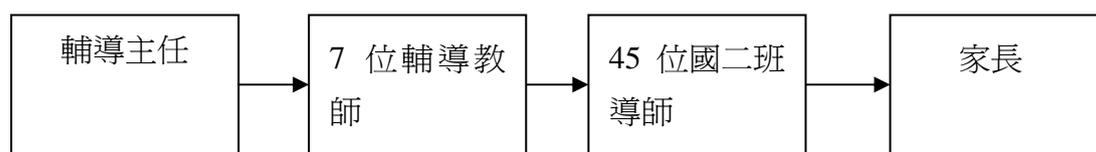
找秀英老師時，很緊張的打電話到教官室確認，第二次再看到又是一大群人來的時候，就和教官反應說：「有一堆不男不女的人找秀英老師，這樣好像不太好。」「奇怪，怎麼學生畢業後都變樣了？」可以說，熱線和學校打交道從警衛就開始，這必須取決於老師事前打造出什麼樣的管道讓熱線進入學校，不管是浮在檯面上還是隱藏在檯面下。

我原本以為國中的輔導老師邀請熱線入班演講並不是件困難且複雜的事情，但從和平國中玉蘭老師與公誠國中志明老師的經驗分享才知道需要克服的問題仍然存在。下面以和平國中為例，說明整個國高中入班宣導的流程。

玉蘭老師是在民國 95 年到台北縣和平國中的輔導室開始從事行政的工作，她說和平國中的特質就是家長很關心教育，因為升學率也還不錯，所以家長很在意導師是怎麼對待自己的孩子，當他的孩子在學校發生問題的話，有沒有相應的資源可以幫助孩子，所以在和平國中的輔導老師都有這樣的重任。每一班有個輔導老師，然後也會上輔導活動課，因為這樣子學生如果有狀況的話，家長才會覺得有輔導老師在協助他的小孩。

和平國中的輔導室並不是從來沒有談論過同志議題，在民國 87 年就開始接觸同志議題，老師對於基礎的同志知識和名詞們都還算瞭解，不過大多數的老師仍以參加研習來獲得同志議題的相關資訊。玉蘭老師第一年辦的性別活動是戲劇比賽，類似台北縣府所舉辦的戲劇比賽，藉由學生戲劇表演的形式來做性別教育，他認為這樣的方式往往得獎的原因不是有性別平等教育的意涵，而是以表演的水準與幽默程度獲勝。他認為這並不是他所期待的性別平等教育，於是第二年開始經由友人的介紹，得知有同志熱線這樣的非營利同志組織，於是聯絡熱線的工作人員，便展開一系列的闖關過程，圖 5 表示玉蘭老師邀請熱線所面臨到的關卡。

圖 5 教師打造入班演講流程圖



上圖的順序是玉蘭老師邀請熱線的先後順序，其他學校的老師並不一定會面臨到這四種行動者，也不一定是按照上圖的先後順序。另外，有些老師會考慮到校長的觀感，面臨的關卡也就會增加一個，不過我目前觀察到的入班演講過程，老師並沒有面臨到校長這一關。

（一）尋求輔導主任與校長的支持

和上級交涉是第一個也是重要的關卡，當輔導老師想要邀請外界的團體到學校演講，而且又是認為有爭議性的團體時，就必須詢問輔導主任或是寫公文請示校長。輔導主任通常是第一個要說服的人，因為在主任的准許下，就算校長不贊同也較可能繼續做下去，所以一開始有沒有主任的支持很重要。志明老師就表示因為這一任的輔導主任支持，所以他才得以順利的辦下去，如果是前一任的輔導主任聽到這件事情則完全不支持。玉蘭老師則很有條理的告訴輔導主任自己想改變的想法，並給予一套清楚明白的程序使主任安心：

可能我後面要想出一套我應該怎麼做，我把我覺得可以怎麼做告訴他…我那時候就已經想好，我可能就是請熱線的義工進來，就跟主任說會搭配輔導老師的課程，介紹 LGBT，介紹一些校園裡面發生的性別不平等的現象，然後他們可能也會介紹同志議題的一些東西，那時候就跟主任說搭配義工的入班，講完了以後輔導老師還是可以去跟同學釐清一些事情，之後再來看影片寫學習單，這不是很完美嗎？我就這樣跟主任講。

除了輔導主任之外，另外一個需要克服的關卡就是校長。當輔導老師把邀請同志團體入班演講的公文寫好送到校長那邊蓋章的時候，有時候輔導主任就會被叫去約談。志明老師為了贏得校長的支持，一開始寫公文還搬出法條，用螢光筆標示出性別教育平等法有規定包含同志教育，以及提醒校長目前已經有哪幾所國中開始從事同志教育，並附加在公文後面。在被校長退件以及輔導主任被約談之後，志明老師有感而發的說：「在教育現場上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學會妥協。」最後他從強調教授同志教育的立場轉為認識「多元性別」與學會「尊重」的觀點。

除了妥協讓步之外，有些老師則選擇先發制人的方式，讓校長在秉持著學校開放校風的立場不得不同意。桃園縣莊敬高中秀英老師在為熱線申請鐘點費的過程，校長打回票的說：「這個（同志教育）不太妥當，這個老師有他們的專業與

自主，可是上這個課來申請這個經費，這是不可以的，這個我不能批准。」於是在邀請熱線入班的那一週，秀英老師馬上寫一封信給校長，信這樣寫：「校長，我們莊敬高中的校風一向非常開放，從校長來之後，對我們的教學專業的尊重讓我非常感激，我也從以前就耳聞校長是一個對於性別非常尊重也非常開放，對老師的教學自主維護著力很深。」在不能顯得自己態度小氣以及被認為不尊重老師教學專業自主的情況下，校長往往就不再有所干涉。

秀英老師一直強調自己的作法是「低調但也高調」。低調在不讓校長為難與學校被告的情況下，小心翼翼地讓熱線進入學校，自然最要保密的對象就是家長；而高調在每年學校的性別教育評鑑，輔導室就會來找秀英老師要舉辦同志演講的資料，喜孜孜地在文件上添上這一筆業績。

（二）處理同儕的焦慮

當主任答應後，玉蘭老師接下來還必須和輔導室其他七位老師做說明，國二四十五個班級的輔導老師並不是只有一個老師在上課，而是由輔導室的所有輔導老師分配上課，所以除了告知其他輔導老師會邀請熱線入班演講，還必須對輔導老師先進行一場說明會，讓輔導老師知道熱線演講是怎麼一回事。一般來說，並不是所有的輔導老師都對同志議題抱持友善的態度，玉蘭老師觀察到在熱線入班演講完後，和一些輔導老師私下的互動中有感受到其勉強的情緒：

那一年我們學校有個代課輔導老師是有基督教信仰，很虔誠，那他平常跟我們相處都還蠻融洽，可是後來才知道可能因為信仰的關係，可能還不太能接受同志這個認同…那個基督教老師自己有點衝擊，可能從以前到現在都是覺得不能接受的，可是聽了入班宣導以後，他自己以一個老師的立場或是以一個人的立場他其實可以理解同志的身份會給孩子帶來不好的求學經驗，他覺得他也有想要幫助他的同志學生，可是他會有點衝擊，我會瞭解是因為他其實小我兩三歲，是在聊天的時候會說他實在不懂上帝既然這樣子，為甚麼還會有這樣的人（同志）之類的，就是他的信仰太虔誠了啦。他對於同志入班的時候對於性的描述也就很敏感，他不太能接受。

有宗教背景的老師在這個情況下，由於宗教信仰的關係而無法認同和接受同志，又因為教學專業的驅使下，必須先隱藏心中矛盾困惑的一面，勉強自己去同

理這個議題。另外，年紀較大的或比較資深的老師也會認為同志很怪，比較無法接受同志。

和七位輔導老師說明入班宣導的是熱線工作人員智偉，在陽光男孩的氣質與形象下，扭轉了輔導老師們對同志的印象，老師們紛紛不敢置信地說「這樣的人也是 gay 喔」。玉蘭老師認為沒有同志朋友的人，往往從媒體接受同志的形象與資訊，而看不到原來同志也很「平常」，所以智偉陽光的形象正好打破老師對同志怪異的想像；但也正因為平常而非怪異，才讓輔導老師們更為放心且信任的地邀請熱線入班演講。

同樣的，因為護理課和軍訓課是互相搭配的課程，所以莊敬高中秀英老師在向教官借軍訓課時，會邀請教官一起到班上聽課。由於秀英老師把性教育和性別教育結合在一起，介紹同志之前的幾週也會上異性戀的性教育，當教官旁聽完這一系列的課程之後，也就不會對某一週上同志議題感到奇怪與壓力。

(三) 化解導師的反抗

在邀請熱線的過程裡，輔導老師這一關並不是最困難的一部分，反而是班級導師。早期分發進來和平國中教書的老師，在大學時不是第一名不然就是第二名，所以一般而言都是兢兢業業的，對於爭議的教育議題也多採保守立場，於是玉蘭老師不知道該如何告知目前四十五個班的導師。她選擇一個禮拜五的導師會報時間，邀請智偉和阿球去跟導師們演講，希望藉此鼓勵導師邀請熱線進入班級演講，但並不是所有導師都同意，玉蘭老師描述了當時有導師不願意的情形：

那時候要辦導師會報之前，我自己也有點判，不知道該怎麼辦，可是開始講了以後我大概就是放了 90% 的心，另外 10% 就是一定會有很麻煩的導師，舉例來說，那一年就是有一個導師在他們講完以後，就站起來說我給你們鼓掌，我非常認同你們，講了一堆非常認同的話，可是最後講說：**「可是我們班不需要這樣的東西。」**就是也有導師是這樣子的。（粗體為作者所加）

在導師會報後，玉蘭老師發了意願調查表給 45 位導師，讓他們勾選是否願意讓熱線進入自己的班級演講，最後有 35 個導師勾選，有 3 個導師仍不放心，有 7 個老師表示不願意。後來詢問 3 個不放心的導師問題後，經過調整答應讓熱線入班演講，而另外不願意的 7 個班導師則寫下不願意的理由，包括「本班無同

志學生」「本班無此需求」「家長可能會有意見」或者是比較有趣的理由「學生比較過動不適合這個課程」。

但是那一年有些導師就提醒玉蘭老師：「既然你們搭配的這麼完整，這是你們的教學專業自主權，為甚麼你們還要得到導師的同意？」她頓時才恍然大悟，這是輔導室在輔導課所上的課程，為甚麼要得到導師的同意才要上這個課？她聽完後覺得很有道理，並反省到自己內心在面對體制的時候，其實產生過度的焦慮，最後變成好像要做一件額外的事情去化解自身的焦慮，可是她並不需要在輔導課程上對其他導師負責，她也有自己的專業自主性，所以在下一年就沒有給導師寫意願調查表，而只是告知。

某一年，熱線入班演講的訊息開始在和平國中傳開後，有一個沒有被分配到入班演講的班級導師反而主動打電話到輔導室，要求讓熱線進入自己的班級。輔導室有固定的鐘點費，在和平國中假設一個輔導老師要上 16 節課，全校一百三十幾個班除以 16 之後，大約還有 4 個班級是沒有輔導老師。在沒有辦法多聘輔導老師的情況下，這 4 個班的輔導老師大多由導師兼職，所以熱線就不會進入這四個班級，除非導師自己要求。剛好那一年，有個導師在研習的時候聽過熱線演講，便主動打電話到輔導室詢問。雖然後來導師的部份並不如第一年一樣小心謹慎地處理，但玉蘭老師認為熱線的義工一年只來一小時，但導師卻是帶學生最久的人，所以如果導師也能有這層性別意識會對學生很有幫助。

無獨有偶，台北縣的禮樂高中麗華老師在阿球的提醒下，一開學就去找每個班的導師詢問意見，全部的女老師都覺得非常好，反而是很多男老師不是很同意：

那個不同意的老師，他聽我講完就是面有難色，其實他跟我差不多大，他教數學的，他第一句話就問我說：「你覺得 16 歲的學生會懂這個嗎？」…他又不好意思一口拒絕我，他就說高三好不好，我就說：「老師沒關係，如果你覺得有壓力的話。你就考慮看看不用現在馬上回答我。」大概隔了兩個禮拜，有一次他在校門口看到我，我走在前面他走在後面，他就主動叫我，他就跟我講說：「麗華老師還是你決定好了。」（粗體為作者所加）

爲了要減低數學老師的焦慮，麗華老師強調所上的課程不是一個單獨只教同志，前面的課程會有很長的鋪陳，從異性戀的關係一直談到性別多元的部份，最後再談同志議題，她聳聳肩的說：「所以我是想減緩他的焦慮啦，但是不知道效

果有沒有達到？」不只是談同性戀，也談異性戀的方式，除了降低同性戀議題在教室的爭議性之外，同時也降低導師的擔心與懷疑，畢竟擁抱著「多元」與「尊重」兩個觀念就沒有什麼大問題，因為這是目前當代社會普世的價值觀。

但並不是所有演講過的學校都那麼順利，在智偉當教育小組領導人的時候，台北市英勇國中的入班演講就遇到導師聯合起來反對熱線的入班演講。對熱線而言，在英勇國中這個失敗的經驗中，學到進入學校不只是和邀請老師之間的事情，光是有友善的輔導老師並不夠。當有一個老師出現反對的聲音，有可能就會造成無法再進入學校的後果，尤其是年級導師在學校就會是一個次團體的狀況下，可能一個對同志議題不瞭解的導師，就會鼓動或說服其他導師。

智偉提到當年英勇國中因為邀請熱線的輔導老師向導師借時間與調課，導師在這個過程中並不是很瞭解同志議題，只要他覺得同志是可以被影響的、同志是髒的、同志是噁心的，就有可能會讓熱線的行動在後續無法推動：

那個時候英勇國中找我們進入的時候，其實是友善的輔導老師，那我們就入班了，可是入班第一天就有老師反對了，因為他可能以為講的是矯治的，可以改變，輔導室在這個歷程裡面就是堅持要把活動辦完，可是後來就沒有再辦了，因為就是有老師在反對嘛！

這次的行動讓熱線知道，如果是輔導室辦活動，就會希望跟導師或是學校的老師先談過一次，讓原本沒有意見的老師因為瞭解同志的議題，就算以後面對同儕的老師出來反對的時候，他是可以在同志議題上講一點話的，而不是完全沒意見。所以後來的和平國中入班演講就是在英勇國中經驗下學得教訓，細緻化入班演講的過程，以避免因為一、兩位老師的不瞭解，讓整個行動挫敗。

（四）害怕家長的介入

最後一部分則是家長，在和平國中有個機制是，例如當學校要辦親子講座時，會發給每個學生一張小小的條子貼在聯絡簿上面。在第一年的時候玉蘭老師在猶豫要不要全八年級都貼紙條，讓家長知道這個活動。但最後決定不貼紙條，一來是，導師的回應讓她覺得沒有需要這麼害怕，二來也害怕貼了反而更不好，並且想測試一下家長對課程介入的程度。她認為這件事要感謝升學主義，因為事後發現，學校的家長對國英數的教學是比較有意見，對其他科是沒有意見：

從我做了四年行政，我完全沒有接收到一通反對的電話，完全沒有，甚至有一位輔導老師特別焦慮他其中一個班的家長，好像之前跟輔導室反映過輔導課程的內容，那這個輔導老師事前有貼那個條子，可是事後家長也都沒有任何反對的聲音。

相反地，桃園縣的公誠國中家長則有打電話到學校，質疑為何邀請同志進入班級宣導。面對家長的質疑，老師們認為讓家長的情緒發洩出來就沒事，畢竟會打電話到學校輔導室的家長也不多，除非數量愈來愈多，不然通常都是零星幾個家長打電話來抱怨。志明老師覺得公誠國中相對台北的學校是較鄉下的學校，所以也相對保守許多，對同志議題的接受度並不高，比較會出現不滿的家長。下面是志明老師描述在面對歇斯底里家長的情況：

第一次打來抗議的家長還是跟我最熟的一個學生，他很開心地回去跟他爸爸講，結果他的爸爸就非常生氣說學校怎麼可以上這種活動，立刻就打來輔導室罵人，可是有些家長真的只是讓他情緒發洩掉就沒事了，他就打來罵了兩次之後，他說我要告校長，他也沒做，這個家長還好。後來又有另外一個家長打來說：「你們學校上什麼樣子的課，我的孩子上了這個回家非常的恐懼跟焦慮…」然後他就劈哩啪啦罵了一堆，不是我接的，那我們組長就說是哪個孩子這麼恐懼跟焦慮，可不可以告訴我們讓我們輔導老師跟他好好談談，結果那個家長就很不理智的說：「我幹麼告訴你我的孩子是誰，我要我的孩子去你們輔導室給你們做業績嗎？」那個家長就覺得我們沒有要處理這件事情，就打去告校長，所以校長後來就是再跑去跟我們主任做溝通，後來主任那邊都擋下來了。

英國性別教育學者 Debbie Epstein (2003) 的研究指出國小教師「恐懼」教導「性教育」，其中就擔心家長抗議。由於英國政府規定學校必須先將性教育的課程內容「知會」家長，這項規定助長老師的焦慮，後來只有一位家長來看性教育影片，這位家長最後看完決定不讓他的女兒接受如此「明白的性資訊」。如同 Epstein 的研究，同志教育和性教育一樣的敏感，因此不可避免必須選擇安全的異性戀教導取向，才是讓家長可以心安的鎮定劑。但也有老師預測家長一定會有所反彈，不等到家長打電話到學校抗議，洞悉學生心理的秀英老師告誡學生：「如果你們回去告，如果老師被你們的家長告，然後學校一定會停止上這個課，學弟、妹不是怪我喔！是怪你們喔！就說都嘛你們去亂告，害我們沒有看到同志大哥哥，害我們看不到同志，同學你們擔的起這責任嗎？」先在學生身上打上一劑預

防針，以不要破壞未來學弟、妹的聽演講的權利為理由，讓學生不把訊息告知父母，避免父母出現反對的聲音。秀英老師其實並不是擔心課程因此而無法繼續下去，而是認為沒有必要因為同志議題傷害親子間的感情，所以就事先設一道防火牆。

在經濟、階級、地理位置等等因素的影響下，某些學校家長會積極地關心學校給予自己的小孩什麼樣的教育內容，但有些家長並不會主動參與學校的教學事務，甚至有些家長是一開始就沒有能力與條件介入。在訪談禮樂高中的麗華老師時，當我問到是否有家長反對時，她無奈的說著這間學校的父母狀況：

我們學校的家長大概也不大關心我們這些副科教什麼，我的猜測啦，我們這個學區的家長大概不是社經背景很頂尖的，我覺得反而是愈頂尖的家長愈有這樣的問題，他對學校的干涉會愈多，社經背景愈好的家長愈在意我兒子女兒在學校你們讓他做什麼。可是對我們學校這區塊的學生來講，他父母親可能是藍領階級啊，老師教什麼可能都不管，我兒子女兒只要考得上大學就好，或是說他比較沒有那麼足夠的背景知識判斷說，我真的覺得怪怪的（，但）我怎麼去跟你 argue。他可能也沒有足夠的背景知識跟你講說，即便覺得不妥，（也不知道）怎麼跟你講這是不恰當的。

或許可以說是因禍得福，沒有條件與能力的家長對於學校的教學，通常會先認為：我賺錢都來不及，哪有時間再去管你。再來即便家長不認同課程內容，也說不出自己不同意的觀點，這群父母的意見就這樣消音。當性別議題遇到階級議題，反而從中獲得非預期的好處，但也突顯性別與階級之間交織角力的關係。我前面所提到的自強國小，位處於台北市民生社區，家長對於子女的教育問題多是主動參與和介入，或是像各個縣市的明星國、高中，例如和平國中和莊敬高中，父母也會提高警覺，當在學校教學內容出現爭議性議題時，隨時出來扮演滅火的角色。在我寫完論文不久，今年（2011 年）三月就得知文山區的溫良高中因為被家長知道熱線進入校園演講，使得家長會給學校施壓，加上教會也介入其中，讓支持多元性別與同志教育的校長與主任，也不得不妥協於家長的龐大壓力下，停止讓熱線進入校園演講。家長的反對聲浪其實是最大的阻礙力量，以至於熱線與關鍵教師往往考慮到未來繼續演講的可能，而會低調、秘密地進行，演講內容也會選擇安全的論述。第三章將會探討這個不得不考慮的無形限制，如何使義工們有不同的論述策略。

第三節 教師邀請熱線的動機

邀請熱線的老師為學校方面主要的行動者，沒有他們，熱線教育小組的演講絕對無法運作。李雪菱（2007）從舉辦性別教育的七所國中小老師當中發現，願意在學期中舉辦四小時的性別教育課程，不代表就有「性別意識」，反而強化兩性角色的二元對立，像是有位老師在提醒女學生不要駝背時說：「女生胸大要更有自信，不要駝背，以後長大才能去取笑荷包蛋跟飛機場。」或是當老師提到教授同志教育時，某國中教務主任反問：「同志教育？那是要教愛滋病防治的嗎？」在在都說明了會舉辦性別教育課程的老師並不表示有性別意識。

如李雪菱所觀察到的，往往邀請熱線到學校演講同志議題的老師，並非一開始就有基進的性別意識，或是和熱線的立場相同。所以分析老師背後的動機是必須的，如此才能更清楚同志熱線能進入學校是機會還是另一種限制。Freire(1993：42)也提醒我們：「某些原屬壓迫者階級的成員可能會加入受壓迫者的行列，而與後者一同進行解放的抗爭，但仍可能帶著其出身的標記：他們的偏見。」當友好的異性戀老師想和同性戀學生一起反抗受壓迫的體制時，也可能帶著身為異性戀的標記、偏見及盲點。下面我整理出邀請熱線的對口老師或上級老師的三種動機，第一種老師本身認識同志學生，並從和同志學生的相處與談話中，漸漸發展出想幫助學生的心態。第二種是站在生命教育的立場來實施同志教育。第三種老師以「行為偏差問題」來區分同志與異性戀的好壞，只要有好的行為，不管是同性戀或異性戀都是正常的。

（一）遇到同志學生：第一次認識活生生的同性戀

在二十年前的時候我在教書的時候認識一個學生，這個學生對我影響非常大，這個女生非常可愛，非常的甜，非常的熱情，那時候第一年教書，這個學生每一節課都會跑過來找我，不是聊個天就是買個酸梅給我吃，遇到情人節一定會送我鮮花，遇到我生日的時候，卡片、巧克力、糖，整個辦公室就只有我有這樣，我也不以為意，因為剛畢業比較年輕，會跟學生更靠近。反正每天她一定會跟我請安，然後跟我聊聊天，他哪怕沒有事都會過來。後來一段時間之後，他的導師是一位六十幾歲要退休的國文老師，就過來跟我講說：「秀英老師，我們班那個小雅，她最近心情不太好，她週記常常寫她很信任你，要不要幫我們輔導一下？」我說：「好阿！好阿！叫她過來阿！她

怎麼會沒有講她心情不好？」後來這個老師欲言又止，臨走之前就跟我說：「秀英老師阿！你還是小心一點。」突然間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愣住了，為甚麼叫我小心一點？他就說：「我跟你講，小雅是個同性戀。」說實在的，我當時聽完之後我的心真的抽了一下，我們那個年代，同性戀就等於新公園，就等於黑暗，等於很恐怖的一群人。從那一瞬間我才開始在想，她是怎麼回事，可是我們沒有機會交談，因為我覺得我很怕，我真的很怕。（莊敬高中秀英老師）

上述是典型的異性戀者第一次遇到同性戀的情緒，充斥著對刻板印象的害怕與無知。秀英老師事後採取迴避的態度面對小雅，不再以和善的態度互動，而是板著一張臉，不帶情緒的語氣和小雅互動。後來小雅用自殘的方式宣洩被一位異性戀女生劈腿的痛苦情緒時，秀英老師赫然體會到：「我那時候才有一種很心痛的感覺，我們（異性戀）在失戀的時候可以吶喊，可以喊說：『我失戀了，這個人太過分，怎麼可以劈腿？怎麼可以欺騙我？』，可是他們（同性戀）卻不行。」同理到小雅無法找到感情宣洩的出口是因為來自於環境的不允許，不願再看到自己的同志學生一個人承受壓力，秀英老師暗自下決定的告訴自己要做一點事情，於是開始接觸同志議題，第二年就把同性戀課程加在自己的護理課。

也有老師在教授的過程，有學生向他出櫃，而第一次感受到「同志」原來真的存在他的生活周遭中，而不是一個口耳相傳的名詞。民國 82 年開始教書的淑芬老師，說到那個時候在國、高中是不太有聽到同性戀或同志這個名詞，大概只知道同性戀就是同性喜歡同性，直到第一次有學生跟她出櫃，才真的相信同志真的存在：

我教書的第一年有一個學生，他在我離開那個學校，我在那個學校只待一年，然後我離開之後，那個學生跟我聯絡，然後跟我講他是，因為我已經調到台中縣的清水去了，所以我就覺得天高皇帝遠，當時就好像是在聽一個事實，我只是覺得好像有一個活生生的人跟我講他是同性戀。然後他跟我講說他很喜歡保養，然後被媽媽發現他的保養品、化妝品，他（學生）就很生氣，就一直講髒話，透過長途電話大概就跟我罵半個小時，然後（我）才知道說這件事情對他這麼重要，那之後的話就是我帶他回台北的時候，會帶他去百貨公司買化妝品。

當年和男同志學生一起去買化妝品的回憶，淑芬老師說到時仍然記憶猶新，

與男同學認識十幾年，到目前仍有聯絡。她看著這個學生一路走來愈活愈自在，不再是當時不敢一個人去百貨公司專櫃買化妝品的小同志，淑芬老師認為這幾年會在自己的公民課上談論同志議題，出發點是這個學生。第一年自己私下邀約熱線進入班上演講，她就自掏腰包地給熱線演講費用，加上曾經待過消基會，她知道像熱線這樣非營利的民間團體都很窮，所以當時最多一次有 19 個班級，一個班給 1,000 元的鐘點費，所以總共給熱線 19,000 元。當我聽到老師拿自己的薪水作為熱線的演講費用，忍不住地說這筆錢真不是小數目，而淑芬老師只表示這筆錢她覺得花得很值得，因為她認為「這種東西」並不是光靠她講課就能「通的」。

在課程上，同志議題雖然可以用「尊重多元」來教授，但老師認為授課還是「隔一層」，因為同志仍然活在書本而非生活當中。公誠國中的怡君老師曾邀請熱線到健康教育課演講，她強調同志議題並不是嘴巴說說就可以讓同學理解與感同深受：

以前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講，因為我不是（同志），那我不是（同志）我怎麼跟學生描述，我不能一直跟學生描述說我以前的同志朋友怎麼樣怎麼樣，我覺得那個還是隔一層。主要是阿球他是所謂真的帶同志朋友來，我覺得這是好的，不要我們描述嘛！你們自己看嘛！所謂同志不是三個眼睛六隻手，不是電視上那個樣子一看就是同志，其實不是嘛！

「看見同志」作為一種最實際且有效的方式，怡君老師認為有些老師因為沒看見同志，就認為教室沒有同志學生，也就沒有討論同志議題的必要。但其實一開始老師就沒有想要看見同志學生，所以同志學生也不會去向老師談其困擾，以至於變成老師的眼睛沒有張開去看到同志學生這一塊，也就不覺得是需要且必要的去瞭解。

這一類的老師在第一次認識到同志時，心中會充滿許許多多的好奇與疑問，甚至是害怕。但像秀英老師和淑芬老師一樣，多數老師會同理到班上同志學生的處境，並把同志教育納入課程當中。不過因為本身是異性戀，這些老師認為只有請同志來現身說法才最具有說服力，同學也能直接的和同志互動，而不只是書本上簡單的「尊重同志」幾句話就帶過。這類老師在性的議題上也相對開放許多，當義工和老師溝通使否能講到性議題時，他們大多都不太限制演講的內容尺度，非常相信義工的演講方式。和這樣的老師合作，可以說較無壓力，許多同志情慾、情感的部份也較能舒服地講開。另外，老師們通常也會在演講當中扮演引導問題

的角色，或是義工與同學之間的潤滑劑，不讓場面太過冷場或是火爆。可以說，這類老師對於同志議題的關心程度相當得高。

（二）同志教育也是一種生命教育

在我訪談的老師當中，有許多老師認為同志教育也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當我問到為何會想要舉辦同志議題的入班演講，莊敬國中的雅婷老師直接地說：「原則上，我覺得性別教育也好或者是同志教育也好，它就是一種生命教育，我把它看成是一個很重要的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無非成為老師重視的教學領域，但什麼是生命教育呢？

在九十九年三月二四號教育部所公佈的《教育施政理念與政策》中提到教育的主軸：「以『全人教育』為目標，以『生命教育』為基礎，以『終身教育』為目的，以『完全學習』為歷程，以『健康校園』為園地」。因此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特別擬定了資訊教育、環境教育、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家政教育、海洋教育等等教學作為根植生命教育的新興議題。

生命教育因此成為教育內容的根本，沒有一個學校不談生命教育。教育部也實際地在學校課程中融入生命教育，在幼稚園及國中小階段，生命教育已納入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十大指定內涵之一；在高級中等學校，99 學年度起自高一逐年實施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規定在高中三年選修課程中，生命教育類至少修習一學分；大專院校基於課程自主原則，多設在通識課程及相關系所開設必選修課程。生命教育可以說如火如荼地在學校中展開。

隨著家政課程大綱每年不斷的改變，開始把生命教育當作教學第二專長的麗華老師，扣著家庭的為主軸，就在自己的家政課程中慢慢發展有關生命教育的議題：

我後來去參加研習也好，或是修生命教育第二專長也好，我還蠻有興趣去不斷累積累積，所以都有啦！因為家政課程綱要也有在改變，就是說我那個時代的煮飯、縫紉轉型談到家庭關係的部份，所以也改名啦叫做人類發展與家庭，它就會訂一個很清楚的主軸是我就要談一個人在家庭裡的發展是什麼，從家庭來看小孩子的發展，從家庭來看爸爸媽媽的發展，從家庭來看老年生活應該怎麼樣，其實我們現在系上主軸應該是走這一塊，所以它的轉變其實

也蠻大的。

強調自己不只是專作同志教育，莊敬國中雅婷老師認為，自己把同志議題當作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因為同志的確占人口有一定少數的比例。她認為以目前的國、高中生所在意的還是兩性間的交往互動，而不是教育他們如何認識同志：

所以同志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全體，我覺得觀念也是這樣子，但是我也願意，就是說談到這種這個異性戀兩性交往當中，多多少少一定會有某一些人，某一部份的人口比例，他會是屬於喜歡同性或是雙性，那這個我們都應該接受，我只是不特別地強調，但是我會願意把它納入。

把同志教育當作生命教育一部分的老師，有時候課名和教學內容並不是很契合，例如禮樂高中的麗華老師在家政課教授情感關係。。當我提到是否會與其他領域的老師所教授的課程重複時，麗華老師認為自己也有教學上的專業自主性。對於別人對其教學內容的質疑，她早已想好一套合理的說詞，一般人對於家政課的刻板印象就是烹飪課，但她以烹飪也有中西之分來解套：「即便是烹飪課，有的老師就是烘焙專長，他就全部拿來上烘焙，你也不能說他不對，有的老師中餐很強就全部拿來上中餐，有的西餐很強就全部拿來上西餐，所以我們在這個科目上細部內容的自主性本來就很高。」在此解釋下，專業自主性可以說就是老師的專業能力，要求不會做西餐的家政老師教授如何做西式蛋糕，除了是強人所難之外，還是違反老師的專業自主性。當我再繼續追問學校是否還有其它老師和她教授相關的課程內容時，麗華老師堅定地跟我解釋家政課也可以談性別的理由：

研究者：可是如果像你上情感關係或愛情這樣的課，有別的老師上嗎？

麗華老師：沒有。

研究者：可是這個（情感關係）你又說（跟家政課）有相關？

麗華老師：我只能說有相關，但不是在課程綱要裡面的東西，它反而是在生命教育裡面有的東西，所以如果學校硬要講說我上的這個不是家政課我也不能否認。

研究者：那家政為甚麼要上這個，這樣就很難回答？

麗華老師：不會很難回答，很好回答，我就是深化它的深度，因為我們家政

課只談婚姻的部份，談愛情的部份，它還是有談愛阿、談喜歡阿、有談迷戀、有談單戀，只是我用很深的方式在談愛是什麼。你不能說不是，它一定有相關，只是它要硬講說這不是家政課程綱的東西，我承認，沒錯。…嚴格來講我不是在做性別教育，你們（同志教育）就是在這個課程脈絡的最後一個部份，最後一個部份才談同志議題，之前都是談性別文化，性別暴力的部份也有談。

此類的老師和第一類的老師不同，同志教育只是生命教育或是人本教育的一環，所以同志教育並不是主要強調的教育，反而「尊重」的精神才是重點。所以「尊重」和「同志」的位階比較上，前者是優於後者的。這類老師的教學立場並不少，如果一層一層的抽絲剝繭，最後可以聽出同志議題其實只是引發尊重的一項工具。所以，通常這類老師的掌控權會比第一類老師來得高，在性議題的態度上也開始有尺度的限制，但相較於下面第三種的老師來得開放，像是麗華老師就沒有對義工的演講內容有所限制。不過，義工知道這場演講的關鍵老師是此類的話，會在「尊重同志」這個概念上有所著墨，所以講述的生命經驗也趨向負面或被歧視的例子。曖昧的是，第二種老師和第三種老師其實並非截然二分，在生命教育或人本教育中，多少會流露出好壞優劣的道德標準，而這常常是評判是否值得尊重的指標。

（三）只要是優質的典範，同志也是好的

我跟隨熱線教育小組到台灣各處學校的這段期間，和老師互動的過程中有個隱微的氣氛：只要你是陽光健康的同性戀，就和異性戀沒什麼兩樣。抱持這種想法的老師把道德倫理視為衡量的準則，只是道德倫理不是在性取向上，而是在情感關係的模式上。例如對於愛情的想像不再是異性戀為正常，同性戀為不正常，而是互相信任、珍惜對方的感情為正常，換伴侶如換鞋、都在床上愛的感情為不正常。我在和某國中老師的對談中就聽到類似的說法，講到最後老師甚至激動地批判那群對感情關係「隨便」的人該死：

如果你們對於你們所愛的人是很珍惜的，你們認真地去談一場，你也從這過程當中讓自己的生命跟對方的生命互相呼應，可能你們的這種觀念基本上是很保守的，是很傳統的，是很珍惜的，不是很隨便的，如果你們是這樣的話，那有什麼差別，不是嗎？那你們還是最優質的典範，沒有什麼差別。我也跟

那些小孩子講，你以為異性戀就叫作正常嗎？那些換女朋友平均一個月換三個的，你認為那個叫正常？我覺得他才更不正常，根本就是玩的心態，根本就不負責任。

這樣的說法除了符合目前社會對於感情關係的價值與規範之外，同樣的也套用到同志族群當中。除了未婚懷孕之外，異性戀的速食愛情、劈腿、一夜情等價值批判也被拿來衡量什麼是可以接受的同志教育，第一，只要不亂搞，同性戀和異性戀沒有什麼兩樣；第二，也只有不亂搞的同志，才可以被鼓勵。

這種老師其實算是一種極端的類型，熱線其實很少遇到此立場的老師邀約，不過，如果在聊天的過程中，此類老師就常常會不掩飾的說出什麼才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而我們應該去尊重那個好的。當這類老師遇到同志議題，心中的那把尺馬上會拿出來衡量，通常只要維持在一對一的交往關係、不劈腿、不外遇、不亂搞，則同志它就不是在劣質的那一面。原本判斷異同之間的好壞標準不再是性取向這個範疇，而是被轉化成單一伴侶與非單一伴侶的比較範疇，尤其是後者中，非單一伴侶的關係更來得讓人值得批判與抵制。

在本論文並不去深究探討道德議題的內涵，只想舉出這類邀請熱線的老師，他們的動機往往是以陽光健康的同志想像請熱線到學校演講，但曖昧的是，標舉著「尊重多元」的熱線似乎和學校老師們對「尊重多元」的想像有些差異與差距。對於熱線而言，尊重多元不僅只是尊重不同性取向和少數性群體，還包含較為爭議的部份，例如開放式關係與多重伴侶關係。此類爭議議題幾乎很少在教育現場被提及，原因很簡單，因為和尊重多元性別的主題並不相關。

意識到老師背後的邀請動機是重要的，尤其對教育小組的演講工作更是。不能直接預設每個邀請熱線的對口教師都有著開放、多元與進步的性別意識，通常不是學校發生了同志學生的問題，不然就是老師無法處理同志議題而「委辦」給同志熱線來處理，如果「幸運地」讓老師認識到悲慘的同志學生，則更有機會聯絡上熱線，熱線一開始大致上接到的邀約電話都是如此。但隨著演講的場數愈來愈多，累積一定的口碑之後，常常就會發生教師場一演講完，學校的一些老師會來跟教育小組要名片，有意願邀請熱線入班演講，像是有次我們到台中對近三百位教務主任演講同志議題，會後就有三、四位主任來要名片，不過通常這些主任也是本身遭遇同志學生的問題，對於同志議題較為關注。如同阿球和智偉說的，通常這些邀約背後都是因為發生「同志問題」，不知道該怎麼「解決」才會找上

熱線，所以一般對性別教育或同志教育有興趣的老師其實並不多。

第四節 小結：演講的無形限制

熱線從成立一開始，除了每年為性別不平等事件發聲或走上街頭之外，其實一直都有在校園演講。民國九十年的四月，在台大婦女研究室經費的補助下，熱線和台大浪達社辦了第一場認識青少年男女同志的教師研習營，因為當時《性別平等教育法》還沒有通過，智偉說當時組織的動力與能量比現在更強，不管有無經費都要自己動手舉辦，他很驕傲的跟我說：「那一場還莫名其妙地上了聯合晚報的四版整個半板²⁶，我們現在要上一小格都很難。」

後來隔一個月又舉辦同樣的演講，這場演講申請到教師研習時數，且將活動訊息寄到台北縣市的學校單位，可以說教育部也等於承認同志團體辦的教師研習營，認可同志教育也算兩性教育的一環（當時仍稱兩性教育而非性別教育）。約有七十位老師擠滿在耕莘文學院裡面，熱線才第一次感受到原來有這麼多老師對於同志議題有很強的動力要瞭解。而這一場也出現了影響熱線未來教育工作的羅東高中胡敏華老師，智偉回想當時敏華老師嚴厲訓斥熱線的話：「同志團體都只在台北辦這種活動，你們有想過其他縣市的同志學生更辛苦？像是從羅東來的，今天就一大早坐火車參加這樣子的研習，你們有資源的同志更要把這個資源帶到台灣其他地方。」也因為敏華老師的一番話，奠定了目前教育小組不放棄任何一場演講的態度，尤其是偏遠的台東及南投。

在這一章一開始，我使用 Connell 的規範式模型，探討目前台灣的性別教育是否讓所有性別議題得以發聲。發現在校園實作上，性別教育只停留在位者所能接受的樣子，對於性別教育的想像也多是在性騷擾、性侵害、家暴防治上，這種規範式的性別教育只是一套異性戀想像的性別教育。在本章第一節描繪出同志教育和其他性別教育議題的位置，尤其發現同志教育受到主流的性別教育如性騷擾防治、性侵害防治與家暴防治教育影響，座落在邊緣甚至仍是禁忌的位置。台灣已有學者關注性騷擾、性侵害防治的發展，對於性騷擾與性傾害議題也有不同的聲音，當中何春蕤對性騷擾、性侵害防治與性解放的辯證能提供本研究分析同志

²⁶ 2001-05-27 / 聯合晚報 / 4 版 / 大社會，標題：「學生是同志，老師拿佛經要他轉性，家有同志兒，家長拜託老師『讓他變回來』，同志諮詢北一女、建中也求助，『認識同志—教師研習營』要為校園同志諮商紮根」

教育和這些議題的消長關係。我同意何春蕙（2006）認為在大力提倡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的同時，也應該正視「情慾」這件事情，尤其不該把「學生」去性化，如果性騷擾與性傾害防治教育走的是把「騷擾」、「侵害」不斷的「性化」的話，則會產生「情慾恐懼」（erotophobia）²⁷，勢必會干擾同志教育的實行與內容，因為似乎擁有情慾一直都是同性戀才會被詬病的事情。異性戀運作的方式好像根本就沒有情慾似的，但在現代階段，異性戀通常化身為無害、無性的面貌出現，例如「家庭」「傳承」「人口」以及「愛情」，而同性戀似乎就一直擔負著所有情慾的重擔（Garcia, 2006）。所以同志教育必然會被限縮在「去性化」的範疇當中，而不是「性化」、「情慾化」的範疇。這也就是在我的訪談中，學校或是關鍵老師對於同志教育卻步的原因，除了爭議性之外，「同志」與「性」的親近性也是讓處於教育場域的教師們不願啓齒的，深怕講同志就等於赤裸裸的在講性、情慾。

第二節我關注關鍵老師實際在校園推動同志教育的困難處。學校的老師並不是一個個原子化的個體彼此毫無關係，他們的行動仍像全景敞視一樣隨時受到監控，而監控的人就是彼此。從垂直關係的上位者校長與輔導主任、到水平關係的同儕與導師、最後延伸到校外的家長都是關鍵老師需要考慮的因素，當中只要有人反對，則熱線要進入此學校的機會就幾乎微乎其微。要實行同志教育本身就是一件簡單的事，加上又是邀請學校外的同志朋友進入教室現身說話，更讓關鍵老師小心翼翼的處理面對行政上的各個關卡。這也是我不認為《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同志教育後，就會完善的落實在校園中的主要原因，如果看看這些關鍵老師仍需如履薄冰的面對各種可能發聲的異議，就會知道同志教育的實行真的並沒有因為《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而獲得正當性。

第三節，我特別想歸類出關鍵老師邀請熱線的心態，其實是有原因的，因為理解關鍵老師的壓力與動機，對教育小組來說是必要的，之後才能考慮到演講內容的尺度。在演講多年的經驗中，阿球很清楚的知道主動邀請熱線的學校分為三種，第一種根本不知道熱線是什麼性質的單位，因為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有同志教育、老師又想做同志議題、又在網路上搜尋到熱線或是同事介紹，於是就找我們演講，這是最外層的一群，像是在文山區的仁愛高中。再來比較內層的是學校本身發生過同志學生或是因為性別氣質被霸凌的事件，老師也有動力做這個議題，熱線就成為連結的重要資源之一。另外屬於同一層的還有覺得熱線演講得不

²⁷ 情慾恐懼可以說是一種對性的偏見，所有描述生殖器官和情慾活動的語詞，聽在文雅的耳朵中都是「令人震驚」的（Garcia, 2006）。

錯，演講完後口碑也有在學校傳開，或是老師自己本身經驗就存有同志相關議題，比如本身就是同志老師或是親人朋友是同志。最後核心的合作學校，像是台北縣和平國中、桃園縣莊敬高中、桃園縣公誠國中與台北市慎思高職就是這類長期合作的對象，阿球認為這些學校的老師不僅有運動意識，也會選擇與熱線合作的模式，在合作關係中知道自己要扮演什麼角色。

所以每當熱線接到演講邀請時，必須先瞭解學校的屬性，詢問對外窗口的關鍵老師是怎麼引介熱線，如此，熱線的義工到現場時才能「按照規矩」表現，所謂的按照規矩表現指的是理解老師的處境來選擇演講的內容與方式。像是志明老師曾經直接的對義工說：「我覺得大家（義工）進去就是在工作，沒有要跟任何人挑戰什麼。」如果義工不知道關鍵老師所承受的壓力時，反而可能會危害到和老師的合作關係。

這一章就是要指出熱線的行動其實受到更大的結構影響，此結構不是由熱線直接所面對，而是由對外窗口的老師直接去應對承擔，但如同志熱線協會秘書長智偉所說的，義工也必須看到這一層限制，去理解老師的處境，才能更反身性的看待自己的行動：

在學生場，如果以團體的目的來講，比如說像那麼友善的秀英老師，她就不太希望我們講太多性，好像也不是說你都不能講，但是她就希望你在最後能加上一句：**「雙方互相尊重的性是最重要的。」**你能怪這個老師嗎？你怪這個老師也不公平，更上面還有一個更大的社會結構在那邊，也壓著這個老師說：「你要注意一點喔！你不要讓學生在校園一天到晚講性。」我們不應該忽略外在更大對於性的恐慌，然後來指著老師說：「你不讓我講性。」這對老師也不公平，因為他也是在層層的結構壓迫之下長了一些東西讓我們進入。……你有更大的結構不去談，把責任放到一個老師身上，他不是何春蕤阿！但至少他是開放百分之九十的空間給我們舞台的人，他也沒有嚴格限制，只是他就很期待最後的圓場是可以回到這個功利的、比較保守的學校裡面，讓他有一個可以跟學校交代的東西。

最後，我想指出同志熱線教育小組的運動目標和進入運動戰場的兩難。對教育小組而言，「能否再進入學校演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同時又常聽到義工們說：「只要有一個學生或老師理解就好」。到底對於教育小組來說，是前者還是後者為主要的運動目標呢？熱線的官網簡介直接寫出教育小組的工作宗旨：「消

除歧視，尊重多元」，深入淺出的談性別教育。可以說，教育小組的目標在於藉由現身、近距離互動的方式，讓學校老師與學生能破除對同志的污名刻板印象，試著建立一個友善性別的環境，所以強調的是，只要演講內容能夠讓一位老師或學生理解同志，教育小組的行動就算是成功。曖昧的是，教師與學生需要理解同志到什麼程度呢？並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另外為難的是，從實際的運動操作層面來看，教育小組不免必須要考慮到關鍵老師面對結構的壓力，使得「能否再進入校園演講」反而從手段轉變成目標，這也造成能否進入校園的考量有時勝於演講內容的自由度，產生該講或不該講的內容限制。

這裡我使用韋伯（Weber，2005：51-2）在四種社會行動分類中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概念區分熱線的雙重目標。工具理性行動是行動者將其行動指向於目的的手段和附帶結果，同時會理性地衡量手段和目的的關係、目的和附帶結果的關係，最後也會考量各種可能目的之間的關係；價值理性相對於工具理性則是非理性的，尤其當行動者一味顧及行動的自身價值（絕對的任務、絕對的善），則愈不會去計較行動的後果為何（51-2）。「能否再進入校園演講」為一種工具理性的目標，而「能有一個學生或老師理解」為一種價值理性的目標。「能否再進入校園演講」是實現價值理性目標的一種手段，但此手段卻轉變為一種工具理性的目的或目標。這樣的區分可看出熱線教育小組在此雙重目標所產生的水土不服現象：過於考量能否進入校園演講（工具理性），使得義工的演講內容必須受限，連帶的理解同志（價值理性）這件事情也開始有所窄化與劃界。對教育小組來說，一場成功的演講並不是只要達到工具理性或價值理性的目的就好，而是要兩者都能兼顧才能算是成功。特別針對熱線教育小組的目標進行討論，主要是避免讀者在閱讀時過度強化工具理性目標的層面，做出單一因果的解釋，而忽略了價值理性目標同時也會被義工們考慮進去。下一章也就是在這脈絡下，探討義工們如何展開應對現場的演講策略與劃界工作，讓演講能順利完成。

第三章 現身在教室內的論述戰略

熱線教育小組入校演講最大的賣點就是「現身」並自我揭露生命故事。在教育與同志運動結合的特殊場域，自我揭露是一個有力量的策略，透過同志義工說故事的方式，達到讓異性戀理解同志真實處境的目標。上一章描述到進入學校的管道中，必須考慮到各種行動者的壓力與老師的處境，都是影響義工在教育現場演講的條件。

在 Mary Bernstein (1997, 2002) 對同志運動策略的研究中，她提出認同佈署 (identity deployment) 概念，解釋同志團體最後選擇的認同運動策略會隨著條件不同而有差異，包括有/無管道進入政治體制、有/無清楚的反對方與有/無清楚的盟友。我認為熱線教育小組在教室中的論述也類似認同佈署的機制，隨著不同的條件有不同的論述策略。同樣地，Joshua Gamson (1998: 49) 分析脫口秀節目中的各種性別怪胎²⁸ (freaks)，如何透過不同的論述策略，反駁 (talk back) 觀眾對其性別不一致的不舒服觀感。這些脫口秀節目願意製作這些單元，主要是看上社會大眾普遍對此議題缺乏瞭解，加上性話題的隔靴搔癢、帶有禁忌的氛圍、跨越公私界限的敏感、又富有爭議性與政治性 (專注在當紅的社會議題)。但是，在慶祝高收視率的同時，製作人同時也會考量這些單元所帶來的社會輿論壓力；性別怪胎來賓也必須在製作人規範的節目腳本，與自身論述的能動性之間取得平衡；異性戀觀眾則在特定的論述脈絡中，理解性別怪胎的世界，過與不及都可能造成異性戀觀眾的反感，甚至加深對性別怪胎的刻板印象。

「性」在教室有著特殊的位置，使得教育小組必須小心翼翼地處理它。Michel Foucault 在《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首先不把性意識 (sexuality) 的歷史看成是一個壓抑「性」的歷史，他提出社會對性採取的策略不是以禁忌為主，而是一整套生產性意識的技術系統。例如家庭就是性意識生產重要的場所，對於歇斯底里的女人與習慣手淫的孩童，精神醫學與心理分析都有一套解釋或說法。另外也點出，在資產階級或貴族的家庭，性也是不可缺少的一塊，只不過他們不去注意肉身的慾望，反而從增強體質、研究獲得健康的條件來滿足對於性的好奇、恐懼與快樂，可以說資產階級念茲在茲的「血統」其實就是「性」(1978, pp. 77-102)。在我的研究中也發現類似的現象：性的議題其實並沒有被壓抑。雖然

²⁸ Gamson 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者。

對口老師希望不要對性有太多的著墨，但仍壓不住學生們對於同性戀「性」的好奇，在這樣的情況下，義工們會有不同對性議題的回應方式。但不論是用什麼方式來講性或不講性，都仍壓抑不了性意識的生產。

這一章我將從「說故事」的策略、性議題的回應與性別流動說的兩難角度，探討義工並不是天真地直述自己的故事與回應現場的各種問題，而是「策略性地說故事」。一方面義工會意識到自己的故事情節可能產生正面與負面效果，而加以隱瞞與包裝；另一方面，他們會去看穿學生與老師問題背後的意識形態，而避免落入同志污名與性別二元的暴力框架。可以說，在教室中的認知解放過程是雙向的，當同志義工試著藉由自身的故事，讓學生與老師理解的同時，又必須意識到對同志深層的污名與刻板印象會影響認知解放的過程。

再來，我也分類出義工回應性的論述方式。除了分析在教育的保守尺度下，性如何被說與不說之外，也希望能從義工們的例子中，看到目前「性」在教育體制中仍如 Foucault 所認為的，不斷地生產著，從未缺席。最後，特別提出在演講中，異性戀教師們詮釋「性別流動」的邏輯：流動的本質不再於能流到哪一方，而在於流動到適合生存於這個社會的一方。異性戀並不會天真地完全接受同志的深情呼喚，他們也在仔細聆聽義工們的故事中犯了哪些錯誤、違反了哪些道德倫理、符合哪些刻板印象以及幫助同志義工變回異性戀的可能。

第一節 說故事作為主策略

大眾對於說故事（storytelling）的概念普遍都是來自日常生活，但說故事其實也有促使社會變遷的力量。美國社會學者 Francesca Polletta（2006）注意到在社會運動中，說故事其實是一個很常使用的策略，尤其弱勢團體更以說故事來證明其價值、索取同理心、對抗社會的不公正與建立新的集體認同。當弱勢者說出不正義與不平等的經驗時，同時也就贏得正當性的勝利，並喚起潛在的新成員加入，甚至是引發對立一方的同情。但說故事也有風險，說故事隨著是誰說故事、什麼時候說故事、為了什麼目的說故事以及說什麼內容都會有不同的效果，所以說故事能否產生權威性、使用性與理解則端看上述各種說故事的變項。

那麼什麼是故事呢？不同於歌曲、歷史、框架（frame）與意識形態，故事可清楚地分成開始、中間情節與結束；所有的故事都含有角色人物與對故事事件

(events)的觀點。事件在故事當中通常會隨著「發生」(occurred)而重新排列²⁹，但發生並不只是按照編年學(chronology)的邏輯，事件會隨著情節(plot)重新組態(configure)產生意義，情節可以說才是故事的整個結構。下面以 E. M. Foster 小說的例子來說明什麼故事和事件的差別，「國王死了，然後皇后也死了」這一句是個事件，但並不足夠構成故事；「國王死了，皇后也因為悲傷而死去」則是個故事，因為「悲傷」連結於此事件。另外，情節也同時注入事件裡面，讓故事產生轉折：「故事一開始，國王和皇后都還活著；最後，他們都死了。」(Polletta, 2005: 9)。本研究也採取上述 Polletta 對故事的定義，以開場、中間情節與結束來認定是否為故事，在研究方法上必須要說明的是，教育小組的行動本身就是以說故事自許，所以我讓教育小組的義工自己定義，他/她覺得自己在說故事那就是對故事的定義。

但故事為甚麼值得說呢？語言學家 William Labov 與 Joshua Waletzky 認為，故事最後的評價性(evaluative)要素讓故事重要到需要說出來；說故事者鮮少會直接地告訴聽眾故事的道德涵義，反而讓故事的事件自身去發酵出更大的意義(Polletta, 2005: 10)。說故事不在於它的確實性或真偽，而在情感的認同結構化與共同經歷相似的情節，故事不用結合普世的價值或共享的價值，因為故事本身就內嵌價值，此價值是事件所給予的(Polletta, 2005: 88)。教育小組使用說故事作為演講工具，產生情感連結的效果，只有讓聆聽者聽到情感結構相似的故事，召喚出自身生命中相似的經驗與情感，讓台上與台下達到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才有可能理解彼此。

不同於走上街頭進行抗爭，熱線教育小組以裡應外合的方式，進到教室訴說每個義工的生命故事，在教室進行著論述的運動。此節我將參考 Polletta 有關說故事的研究，分析教育小組說故事的策略，主要關注「為甚麼故事值得說？」，並分析製造故事的過程與機制，探討義工們是如何分辨什麼是好故事與不好的故事。Polletta 以美國婦女運動為例，分析這些運動把女性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的論述爭辯。到底在故事裡，女性扮演犧牲者或受害者的角色，對於修改法律、改變政策與社會實作有無幫助？Polletta 分析的結果發現，雖然受害者化的故事帶來的情緒最多是同情與保護，而非尊重與權力，但並不是所有的受害者化故事都擁有這樣的效果。在殺夫的刑事案件中，法官、陪審團與律師對惹人憐憫的受

²⁹ 可以說，故事被視為一連串事件發生的序列。

害者與瘋女人的區別只在一線之隔。

最後，我同意大聲公開地說故事不僅能帶來運動的力量，同時也能充權主體。在 1960 年代，自由女性主義運動鼓勵被家暴婦女、被強暴婦女與墮胎婦女打破沉默，勇敢的大聲說出遭遇的經驗，才能顯現出問題的嚴重性；這群家暴婦女不斷地說出日常生活中私領域的經驗：性，並反擊被扣上「羞恥」的罪名，直言羞恥不是來自於公開地說出自己的故事，而是造成這些不幸經驗的男性加害者與厭女組織³⁰（misogynistic institutions）。這個「女人大聲說」的行動也讓同性戀現身運動有了學習的榜樣，許多故事不僅是鼓勵其他女／男同性戀大方地承認自己的同性戀情慾，也試著迫使異性戀者看到周遭的同事、朋友、親屬也有同性戀者。並透過「被迫活在一個秘密的生活當中」的受害者化故事，讓異性戀者去設身處地的同理擁有此秘密的巨大壓力感受（Polletta，2006，pp. 115-16）。

透過下面的分析，也能補充 Polletta 分析弱勢族群說故事所忽略的心理機制：義工要意識到什麼故事需要被修改，以及什麼故事不能說。並且矯正生命故事的事件，以避免讓故事本身強化了污名或是刻板印象。在下一章，我將會繼續描述說故事帶給義工的焦慮，尤其當說故事變成一種競爭的演講工具時更是如此。

（一）承載故事的身體

其實它（長髮）一直很有效果，那個效果甚至強大到我當初沒有料想到，就是我原本覺得認同就講說我是什麼就是什麼，可是對現場講很困難。因為你跟現場講了 LGBT，講扮裝什麼的，現場永遠都還是會覺得我是跨性別，就像我們上次去屏東博學國小的時候，那都已經是演講兩年了，可是社會的二元（性別）概念跟「做自己」的衝突還是很強烈。甚至我可能還是很積極地去回答為甚麼要做這樣的打扮，我怎麼去面對社會的眼光，相對於其他的義工來講，我可能更容易被問到關於跟社會互動的事情，會被問：「你為甚麼要留長頭髮？」、「你為甚麼要做這樣的打扮？」、「你想要變性嗎？」、「你家人可以接受嗎？」幾乎是一些對性別很刻板印象的東西全部都會到我身上。

（小莫 20100820 深度訪談）

³⁰ 厭女組織指涉有些醫院委員會禁止墮胎醫療行為，以及以不干預私領域為由拒絕處理家暴的政策。

上述是留著一頭烏黑長髮的男同性戀義工小莫，到學校演講常常遭遇到的情況。說故事並不是在開口之後才被說出，在外貌不符合主流的期待下，小莫的身體已經開始在訴說著故事，或者應該說，聽眾已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小莫那頭烏黑秀髮所承載的故事。但原本只想打扮得美美的，像個女藝人登台作秀去演講的小莫，卻沒想到女性氣質的裝扮會引起同學的騷動，甚至可能導致演講無法順利進行。更糟的是，在還沒開口演講之前，會遭到底下同學的猜疑並指指點點地說：「阿！他是男生耶！」以至於小莫有一段時間爲了化解尷尬的情緒，在自我介紹時會開門見山地說：「大家好，我是小莫，我是男生。」

麻煩的是，小莫的身體更說了對同志刻板印象的故事。一開始喜歡化妝的小莫，在演講現場一定會畫好妝現身，但同學卻把所有能聯想到的同志刻板印象套在小莫的身上，像是男同志就是娘、同志就是要變性…，只要是刻板印象或是變性相關的話題都會落在小莫的身上。小莫的身體不僅給他帶來演講上的麻煩，同樣也讓合作的夥伴義工無法發聲，因爲同學過於好奇留著長髮的小莫會有什麼精彩的故事，使得其他義工被冷落，現場宛如變成是小莫的個人記者會。下面是小莫在苗栗的一間高職和智偉一起演講的情況：

我一上台當我講完說：「我是小莫，我是男生。」現場彷彿來到了臺北市立棒球場，就是從後面的人群整個站起來，整個禮堂兩三百人，幾百個人像波浪舞一樣從後面站起來，幾乎到最前排都要站起來了。我那時候真的被嚇到說，我沒有想說會有這樣的效果，連智偉他都被嚇到，我不曉得怎麼回應，智偉還跳出來說：「大家可能對他有一些好奇，可是他今天是帶著一些故事，我想我們今天不是來到簽唱會現場，所以我們大家先坐下來看看他會不會講什麼樣的故事。」

小莫最後跟我說，經過一年的演講之後，有時候時間來不及，就不化妝上場演講，但不變的還是那頭及腰的長髮。他慢慢地知道一個完整女性的形像對於演講來說，並沒有太多的益處。他曾經被智偉提醒過，如果能夠以短髮男生的形像引起同學們對於生命故事的好奇，才真的算是故事情節感動到同學，而非外表的裝扮嚇到同學。

另一名跨性別義工 Zoe，不管是在小組開會或是學校演講都是著女裝現身。Zoe 加入熱線約一年，在這半年常常聽到其他義工說 Zoe 正處於同志認同的初期，也就是同志驕傲期，所以 Zoe 對於自己的打扮感到相當滿意，認爲能夠美美

的出現在學校的教室，感覺很像在走星光大道：

Zoe：我們常常在入班的時候，好像在走星光大道，每一班學生都會探出頭來看，我都會想說他們到底是在看誰，是我長得最奇怪在看我，是單獨看我一個還是看我們整個 group，他們在看得時候他們是怎麼想，我會很掰勢（台語）。

研究者：你有沒有穿過 T 恤、牛仔褲然後沒有化妝的去演講過？

Zoe：沒有，去演講的時候，我會盡量展現我女生的樣子，這樣才有效果。而且 T 恤、牛仔褲，這種最安全的男生裝扮，我現在完全沒有辦法接受。我覺得一點特色都沒有，我想要展現的個人特質完全被社會要男生的限制掩蓋起來，至少我身上多少有些女性的部份，尤其會想露就對了，不是露上半身就是露下半身。這就是跨性別跟 gay 跟拉不一樣的地方，跨性別相對比較看得出來。

研究者：你不覺得一個穿 T 恤、牛仔褲的男生突然說他是跨性別不覺得更好奇嗎？會想說他跨性別的部份在哪裡？

Zoe：可是你跟聽眾接觸最多就那兩個小時，我可以穿 T 恤、牛仔褲進去然後播放 powerpoint 讓他們看我女生的樣子，可是我沒有這個機會，我就直接以我現在的樣子。

研究者：因為他們可以想像你穿 T 恤、牛仔褲的樣子嗎？

Zoe：對阿！這跟路上的人沒什麼不一樣。像我常常也因為懶沒有化妝，不過去演講我幾乎都會畫。

爲了讓同學一眼就看出自己跨性別的身份，Zoe 自認穿著女裝，以女性的形像演講是最好的方式，他只怕穿 T 恤與牛仔褲沒有辦法在外表上彰顯跨性別的認同身份。Zoe 是一個男跨女的跨性別義工，他並沒有動變性手術，只是在外表上進行改變，從化妝到穿女裝。因爲家人的反對與不諒解，所以在家裡的形像一直是男生的裝扮，Zoe 跨性的裝扮除了可以達到演講的舞台效果之外，更藉由演講現場的機會展性出真實的自我形象，而不是日常生活中在家裏的男兒樣。

相對於小莫和 Zoe 明顯的外表形象，有跨性別認同的生理男義工 Winter，則

認為沒有必要穿著女裝讓別人知道自己是跨性別。當我一問到是否會想給人反轉性別的感覺而穿著女裝去演講時，他不經思考地說：「不會！我覺得沒有必要。」接著說：「如果是個表演是 OK 阿！像我有時候也會很想穿女裝到演講現場，因為我好像讓大家看到我漂亮的樣子，哈哈！可是當其他人穿女裝在現場，那我就覺得沒有特別必要再去做同一件事，因為已經有人幫我做到了。」Winter 並不贊同一定要打扮成異性的樣子才是真的跨性別，他心目中女性的形像反而不是穿得花枝招展，而是白 T 恤與牛仔褲的隨性打扮。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此句來自木蘭詩，是在描述從身體外觀並無法辨別一個人的生理性別。在小組開會的時候，工作人員阿球說自己帶義工演講的經驗相當豐富，卻也發生在演講之前誤認義工性別的糗況：

有過一次，這是在還沒上台之前發生的事情，我一直以為他是 gay，結果講到最後，他講到說他女朋友，我就驚一下，想說是 bi 嗎？然後繼續聽又不是，結果是個 T（全場笑），有時候真的會有這個狀況，有些人聽聲音真的是一個 gay 吧！看樣子也是個 gay 吧！結果就完全不一樣，真的是不要以貌取人（笑）！（20100622 教育小組開會田野筆記）

身體為什麼重要？我認為身體是說故事的前導物。在義工還沒正式開口講話之前，不管是走在校園中、走廊上、中途去上廁所，就是和穿著制服的學生格格不入，更不用說一個生理男性穿著裙子，或是臉上抹著鮮艷濃妝走在學校。我曾與 Zoe、小莫分別一起到學校演講，在走廊時，每經過一個班級就會有許多同學探出窗外，投射出觀看珍奇異獸的眼神。在這過程中，學生或許已經發出了各種疑問、好奇甚至恐懼，如同小莫說的，許許多多對同志的刻板印象會自然的投射在義工的身上。故事不是在義工開口時才開始，而是在一踏進學校的時候就已經啟動同學對同志義工生命故事的想像。

（二）有些故事還是不要說的好

並不是什麼故事都可以說出來。教育場域中總有許多的限制，讓義工們能感覺到什麼故事可以說，什麼故事沒有必要說，尤其故事中對「性」的描述更要避免，因為對於老師而言，「性」並不是教導學生「尊重」同志的必要條件。在我一年來跟隨不同義工到學校演講，故事主要包含認同過程、學校求學時遭受霸凌

與家庭議題，說性談愛不是同志在教室中說自身故事必要的內容。湊巧的是，眾多的故事當中，我幾乎沒有聽到過義工講述親密關係，或是關於性的情節。

怕故事失焦是最常隱藏特定情節的原因。在教育小組，我很常聽到義工們講這句話「今天講故事的重點不是在性而是在尊重」，所以一切和私密的性議題有關的內容都盡量要避免。Winter 描述自己在述說和某一段男友認識的過程時，會省略掉細節的部份，因為惡魔就在此細節中：

我跟他（男友）是在公園認識的，那認識的一開始是因為性的關係，我可能就不會講說我是跟他在公廁裡面怎樣怎樣，因為我想在後面的老師可能會瘋掉，除非今天是跟大學生，或者是比較友善的場所分享的話就 OK，可是今天你跟一個還沒有很成熟的人講這些，他可能根本就沒辦法去接收到你講的東西，只會注意到「喔！你是跟他在廁所裡怎樣…」焦點就放錯了。

Winter 並不是第一個省略掉性情節的義工，已經是講師的阿仁在說到和第一任男友認識的過程，也刻意隱藏「公廁」的部份。對國高中生的演講，義工自然而然地必須在「性」上消音，因為根本沒有辦法講。Winter 認為像公廁的部份是一種同志社群瞭解的文化，但對小朋友而言是很難解釋的一件事情，所以爲了不浪費時間解釋，直接跳過比較快：

因為其實我聽到阿仁的故事之後，我就是知道說他有省略到某個部份，因為我聽過阿仁團體分享的時候講的東西，就知道說他跟他第一任男朋友怎麼認識。他們認識的時候就是發生關係，因為我們都瞭解公廁的文化，那你就知道這個東西你要跟小朋友講就沒有辦法講，你就必須省略掉這個部份，就說：「我跟他在車站認識。」認識的過程就不需要多說了嘛！對不對？場合就不恰當。而且一般人都還是很污名在看性這件事情，所以你真的很難跟小朋友講這些東西。

「要說也說不出口」的心態讓義工們對性退避三舍，這個心態的養成通常也需要一段時間，當義工演講次數頻繁，或是演講一段時間後，自然會從「老鳥」義工的糾正中學習到。所以會毫無避諱的在教室當中講「性」的義工，通常都是「菜鳥」義工，當性的情節被說出來後，發生了什麼事呢？金金在公誠國中的經驗是個很好的例子。六月中到公誠國中對國二學生演講一個禮拜，在和妖妖某一場的合作上，金金描述到自己的認同是來自於五歲和表哥上床的性啓蒙，在一旁

的妖妖一聽到關鍵字「上床」，馬上觀察台下同學與老師的臉色，並在組內開會時描述當時發生的經過：

我們在公誠國中的時候就是不小心講到…就是學生問性或是說怎麼確定是gay，我那時候已經有心理準備要回答這個議題，可是沒有想到分享的人就是太 high 了！講的很直接。然後後來志明老師就是臉色非常難看。因為金金的情慾發展比較早，他就講到說第一次的啟蒙是來自情慾，因為是在五歲，又太小了，而且又有些…那時候又非常尷尬，不知道怎麼接，而且老師臉色就…（妖妖皺眉頭），全班就…（妖妖倒吸一口涼氣），我就是把重點放在說，強調說每個人的感受不一樣，其實情慾的啟蒙、情感的啟蒙是從情感開始，接到說每個人大家發現喜歡同性，有些人可能是從情感，有些人可能是從情慾，可是那就是我們真實的生活，不是什麼被誘導，被騙之類的，引導到這樣子，再讓他接下去。（20100622 教育小組開會田野筆記）

考慮到學生與老師的觀感，妖妖開始對金金的性啟蒙情節進行消毒的工作。害怕金金的故事對學生造成衝擊，他在現場強調有些人發現自己喜歡同性可能是從情感，也可能是從情慾開始，每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以淡化「五歲跟表哥上床」的情節，再把同學重新拉到故事情節當中。

在我訪談的所有義工裡，大家幾乎都在「性」的情節上選擇隱瞞。另外，也有跨性別義工爲了讓自己的性別認同有正當性，選擇隱藏自己生活中較被人詬病的部份。Zoe 的父母就對於 Zoe 沒有工作賺錢相當感冒，也是反對 Zoe 的其中一項原因，怕影響到展現自己跨性別認同的正確性，Zoe 覺得沒有必要講出來：

Zoe：有一個我蠻常講的，那是改編過的，我家裡對我那麼不爽其實還有別的原因，一個就是大學念很久一直在那邊混，還不去工作賺錢，他們對這個很不爽，可是他們自然會把這件事情跟性別全部扯在一起拿來罵我，我覺得在教育現場倒是沒必要講出來。

研究者：講出來你覺得怎麼樣嗎？

Zoe：我覺得會讓自己變得很麻煩，而且可能會讓人家覺得你自己生活都沒顧好，你還在搞這些性別的東西！就比如說，如果我有個還不錯的工作，有經濟能力，可以養活自己什麼的話，那我再去性別方面展現自我，會比較政治正確一點，爸媽也比較不會有意見，可是反過來講，我今天愛展現自己，

讓自己比較難找到工作，沒辦法生存的話，那我就變得很不正確。如果你有比較好的學歷、比較好的工作你可以這樣搞。

Zoe 的例子有趣地指出，干擾性別認同正當性的因素有許多種，像經濟獨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如同 Zoe 說的，要「搞性別」得先養活自己，不然其餘免談。如果故事情節沒有教育意涵，以及給予故事本身正當性的話，都是要盡量三思而後行，以免拿話砸了自己的腳。如同上面 Winter 和金金的性啓蒙情節會被解讀為沒有教育意涵，而 Zoe 沒有經濟能力的部份則無法正當化自己的酷兒生命經驗。可以更細緻地看出，不能說的情節背後存在著挑起聽眾道德倫理的緊繃神經。故事可以把觀眾拉進當事者創造的世界當中，並聰明地整合成相似的架構，讓觀眾定義自身的道德意義 (Polletta, 2005: 88)。當故事的情節結構和觀眾的生命經驗結構相距過大時，可能會給當事者的故事在道德意義上帶來誤解與反感，所以說故事的人必須學會如何聰明地藏拙。

(三) 懂得包裝故事才會有效果

在脫口秀節目中，性別怪胎來賓在「說實話」的同時，也需各種「非實話」的實作，透過故事的個人化權威 (personalized authority) 讓性與性別的實在更容易看見 (Gamson, 1998: 101)。有些情節經過改編後會有不一樣的效果。相對於刪除故事情節，改編故事是最容易發生的，可以說沒有一個義工不修改自己的生命故事。為甚麼要改編情節而不乾脆直接剪掉不說？義工改編的情節是基於除掉可能誘發觀眾不良觀感的情節，修訂過後的情節反而更能政治正確地滿足觀眾的期望，以免原本故事的情節被污名化，加深對同志負面的刻板印象。

在家庭議題上，義工們多少會把自己家庭關係修正成聽眾可以接受的樣貌，也就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圖像，健康的家庭關係是為自己故事加分的重要調味料，而不健康的家庭關係則會扯故事的後腿。在組內生命故事分享的妖妖，說到和家人的關係其實是相當悲慘的。他盡量不在教師場說父親在他小時候毒打他的回憶，有些場合覺得同志就是因為家暴或家庭不溫暖所造成，妖妖就會故意去選擇講媽媽接納他的這件事。當碰到把同志等同於家庭有問題的論述時，他一定「挺身而出」的先說自己的家庭很健康，來破除同志就是因為家暴造成的刻板印象³¹：

³¹ 這裡我並不是要讓讀者認為熱線的義工是惡意地扭曲事實，而是能夠看出同志對於「家暴成因論」污名的恐懼與抗拒，在說故事的策略上理性地選擇迎合主流對家庭的普遍想像圖像。

以前我自己在講我家庭，當有些人說同志是不是有問題的家庭的時候，我就會說：「不會阿！我自己的家庭就很健康、都很正常。」可是認真檢視的話，我的家庭絕對是符合問題家庭的定義。我不想要有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所以我會很理所當然，而且我會很斬釘截鐵的否認，然後說我家庭很健康、很正常。

在小組開會時，也曾討論過義工如何選擇性的改編故事。阿球認為義工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時會有一股誘惑，這股莫名的誘惑會讓義工選擇性的重新改編自己的故事。但有時選擇性的改編故事會產生牛頭不對馬嘴的情形，小莫分享自己在演講現場說謊的經驗，他把自己和父母的關係塑造成一種完美的形象，現實中並不然。最後卻導致故事情節連結不起來，甚至他覺得台下的老師好像都識破他的謊言，而感到赤裸與丟臉。義工有時為了現場的力量與效果，現實的家庭關係並不符合主流、健全的家庭圖像，卻要潤飾自己的父母擁有好爸爸好媽媽的主流形象，化解底下聽眾對同志都是來自不健全家庭的刻板印象。

還有一種誘惑的情況是，義工可能在累積演講的經驗中，意識到自己講述的過程，某個情節最能感動人心或製造現場的效果，而加油添醋讓這部份的故事情節更為活靈活現與戲劇化。但有時候效果卻不一定會生效，義工們便會在下次演講時修改內容或是換成另一套帶有情緒的、戲劇性的描述。目前認同是雙性戀的女義工小米，在一次和她到新北市寧靜技術學院演講的經驗中，我才知道原來她時常在故事裡修改一些小地方，讓故事更為合理，她認為故事不是自己講得舒服而已，還要能帶出聽眾對故事的感想：

小米：因為我講生命故事，一開始也是會想把事情交代清楚，因為這是對我很重要的事情，我想要讓大家更理解。但是後來我發現，當我工具性在看自己的生命故事的時候，我不會讓別人瞭解我的生命故事是什麼，而是我的生命故事要怎麼去切割，然後來帶出他們什麼樣的感想。其實我剛才講的那個故事是簡化版，甚至有些地方為了讓它合理的時候，稍微掰一點東西進去。

研究者：什麼是掰的？

小米：我爸爸把我叫回去（審問）並不純然因為我是同志，是因為我哥順便跟我爸說我在 T bar 打工，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把我叫回去，我媽哭最大的原因也是因為我在 T bar 打工。

或許讀者可能會認為這些都是小細節，但對於在台上演講的義工來說，這些細節的修正都是讓接下來的情節能夠繼續下去。為了能夠讓同學正視同志議題在家庭裡的處境，小米必須放大父母知道女兒是同志的情緒，但小米的父母或許更在意的是她在龍蛇混雜的夜店打工。

可以說，隱藏與包裝故事的思維是這樣的：有意義的故事是訓練出來的。並不是口才好的人就可以說得一口好故事，在教育小組裡面，沒有一個義工天生就很會說故事，每個義工表示自己第一次上臺說故事都是處於緊張的狀態。除了緊張之外，對於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在臺上剖析給一群陌生人看的恐懼更大，沒有安全感、被他人評價自己的故事等複雜情緒通通會在當下湧入腦袋。所以，從「天真地說故事」到「策略性地說故事」是每個義工必經的修煉過程，義工從不斷說故事過程中理解到自身故事哪裡有賣點，哪個部份要加強，哪個部份要添加，哪個部份要去除。最後，可以比較跨性別義工 Winter 的兩個版本的認同故事的差異：

【修飾的故事】

跨性別認同大概就是我最早認同自己是 gay，那可是我混 gay 圈的時候總覺得有一些些的格格不入，我自己心裡面也有一種感覺是「我想當女生」，或如果我是女生的話該有多好，有時候我真的覺得我就是個女生，那這樣的想法沒有間斷過。到後來我自己留長頭髮，然後去讓自己看起來更像女生的時候，我發現到我是很喜歡這樣子的，我被當成女生其實我是非常喜歡的，我是很開心的。因為我一直沒有想要變性，那我就想說我到底是怎樣，後來上 ptt 看跨性別版，被跨性別版的人丟水球，他就介紹我認識其他跨性別，後來去了 TG 蝶園，才知道不是只有變性才是跨性別，不是只有每天穿著異性的服裝才是跨性別，因為我到後來自己的部份，跨性別認同 ok 了，那我自己也覺得我是女生，我男生的部份我也不會想要捨棄掉，之後我穿什麼衣服我都覺得 ok 阿！

【原版的故事】

當我去 gay 的團體或是聚會的時候，他們就會強調我女性的部份，他們就會叫我姊姊或是就是說我很像女生，你就會感覺到「對！我就是女生，我跟他們 gay 不一樣」，就讓我感到不舒服，所以說我有一段時間是沒有跟 gay 的

朋友或團體有聯繫。

兩個版本的差異重點，在於修改版的故事必須含有「性別/同志認同」的心路歷程情節，在充滿自我懷疑的認同旅程中，最後找到了自我認同的歸屬。另外，修改版的故事完全符合 Polleta 定義故事的三個部份：第一是故事的開場，再來是一系列的行動，然後以某種方式結束。以 Winter 為例，一開始講述在 gay 圈感到格格不入以及想當女生的感覺，再來描述自己開始留長頭髮，讓自己看起來更像女生，以及在網路上認識跨性別的朋友的一系列行動，最後體認到不是穿著異性服裝才是跨性別的「跨性別認同」。

教室作為另一種社會運動的戰場，義工們清楚地知道對話對象是異性戀、僵固的性別二元與恐同情結 (homophobia)。在 Winter 的認同故事中，前者修飾的版本最適合放在演講，可以清楚地彰顯對於性別二元劃分的質疑與挑戰，而後者的版本只是單純地宣洩對同志內部團體的怨氣，對話的對象並不是異性戀族群。這也就是阿球時常耳提面命的「請搞清楚敵人是誰」，如果故事沒有辦法幫助義工和台下異性戀聽眾對話的可能³²，那這個故事就沒有意義。

(四) 典範故事的崇拜

演講的過程中，總會聽到一些義工分享其他義工「經典」的故事情節，而不甘心自己的故事過於平淡。典範故事之所以經典並不是因為故事情節所造成，而是合乎聽者對於故事情節的期待與想像 (Polleta, 2005)。葉永銖的故事就是同志教育的典範故事，雖然此故事仍著重在性別氣質上³³，但仍是教育小組會拿來說的故事之一，故事描述就讀高樹國中的葉永銖因為性別氣質陰柔，在學校常常被同學欺負，最後悲劇性地死在廁所裡。小莫無非是擁有典範同志生命故事的義工之一，下面是我訪問他時，他簡單敘述在演講現場會說的故事情節：

從小就被家裏笑說是娘娘腔，就會被講說，家族聚會被介紹的時候，人家會

³² 這裡和異性戀對話的可能也可以解讀成不要讓瑣碎的 (trivial)、和性別/同志不直接相關的內容，甚至講述異性戀者無法立即體會的情感去干擾演講者故事的意義，當故事沒有意義自然就不可能對話，例如異性戀可能就感受不到 Winter 在男同志圈的不舒服感覺，而且 Winter 這樣的感覺對於「教育」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反而可能把矛頭指向同志團體內部。

³³ 這個故事事實上是講性別氣質的歧視，但義工們絕不會去澄清葉永銖的死跟同志有何關係呢？難道葉永銖是同志？還是男同志都是娘娘腔？這使我在教育現場每次聽到義工講這個故事時（有時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也會講這個故事），不得不去反思的是：是否在說玫瑰少年的故事同時，不過是去迎合異性戀聽眾對於故事內容和同志想像的不謀而合？

說這是我的小孩，然後可能念什麼學校，考試第幾名阿！參加什麼比賽之類的，我可能是被講說因為投胎的時候跑太快，王母娘娘來不及把雞雞收回去，所以才這樣男不男女不女。小學的時候常常被同學欺負到哭，甚至是女生都會欺負我，把我弄到哭為樂，有一次上課我又在哭，老師一進來就很生氣的把課本摔在講桌上，講說：「小莫你到底是不是男生？！我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娘的男生，每次經過你們教室你都在哭。」然後那時候同學就知道說，原來男生娘是不好的事情，開始他們那種不理性的霸凌，用遊戲治療我，玩如何幫小莫治好娘娘腔的遊戲，那可能就不管玩什麼遊戲，玩到最後的懲罰就是我要被壓在牆上，分兩組，就會像忍者飛簷走壁一樣，踢我幾下得幾分，那時候我甚至常常受傷的回家，然後家裏到現在都還不曉得我小時候常常受傷回家是因為被欺負，家裏都以為我是自己跌倒或幹麼，家裏應該其實到現在都還不知道。高中的時候喜歡同校的一個學長，然後那時候我升旗幹部集合我會看到他，甚至後來我會知道他是哪一班的之後，我會每次經過老師的辦公室，回來的時候會故意經過他們的教室，在那裡迂迴地繞了好幾趟，只是為了多看他幾眼，或者有的時候會不小心故意撞到他，後來就去保健室偷了他的資料，以有一個學妹喜歡他的理由約了他出來，就跟他通好幾次電話，然後約了他在台大對面的麥當勞跟他告白，被他當眾羞辱，就禮拜天的下午人最多的時候。那時候才知道說原來喜歡同性不是一個想講就講的事情，他就說：「你這個變態、死人妖不要再靠近我。」跟他同學就走了。

小莫的三則故事很典型地把「家庭議題」、「性別氣質議題」與「情感關係議題」跟同志議題相結合。在家庭方面，可以從故事看到因為性別氣質陰柔的關係，和父母相處可能不太融洽；在校園方面，因為娘娘腔而遭到血淋淋的同儕霸凌；在情感關係上，和異性戀學長告白的不順經驗都一一滿足刻板的同志故事情節。藉由小莫的生命故事，我想指出同志的生命故事在追求演講效果下，可能非預期地讓義工開始對於自己的生命故事有所評價，甚至覺得自己的生命故事相較之下不值得一提。

前面兩節所描述的，就是義工自身的故事是否能夠符合典範故事的情節所發展的策略，達到預期的宣導效果。弔詭的是，在組內時常會聽到義工們說每個人的故事都是獨特的，但仔細的觀察卻發現，每個義工都在找尋可以在演講現場發揮效果的故事情節，進而導致義工在面對其他義工精彩故事壓力下，產生出複雜情緒。

從熱線教育小組的說故事行動可以看到，說故事不一定會成功，有時候可能會失敗。當主流的聽眾還沒有準備好聆聽時，說故事者本身的污名太深且運動戰場（演講量）太多時，非主流族群的故事內容會趨向政治正確。故事中的敏感議題、道德倫理禁忌與刻板印象都要適時的收斂起來，故事的情節最好符合主流族群對於非主流族群最普遍的想像。我們無法確切知道在什麼時候，什麼樣的故事是好的敘事，加上說故事者並無法準確預測聆聽者如何看待與回應故事的方式，使得說故事這件事顯得更為小心謹慎，對於像熱線這樣非主流的同志團體而言更是如此。

這一節，我分析義工們敘說生命故事的機制，發現義工們有意識地避免真實卻危險的情節出現在故事中，防止故事造成反效果。范雲（2010：101）研究說故事在民主討論中的效果，結論發現說故事讓敘說者同時成為故事的主角與作者，因而有可能成為自我認同的主體，找到自我改變的能量。並反轉主流族群的「主流故事」，這些主流故事通常對問題提供非常單薄的解釋（thin description），沒什麼空間容納生命的複雜與矛盾，因此無法讓人說清楚自己行為的獨特意義。在我的研究中，恰恰和范雲的研究有所差異。范雲研究的說故事環境是相對開放且自由的族群對話工作坊，會參加對話工作坊的人都是自己決定要參加，所以參加者說故事的氛圍是自由的、沒有壓力的；但教育小組說故事的環境則是義工們無法選擇的，甚至為了下次能繼續到同一個學校演講，必須有所顧忌地考慮到這個環境當中不同行動者的觀感與壓力，所以義工們反而較容易敘說主流故事。更精確的說，義工們傾向於說一個安全的故事，這個安全的故事雖然部份仍是義工真實的生命經驗，但仍存在著一條警戒線把不該說出口的故事隔離在教室外。

第二節 回應性議題的四種類型

「性」在學校教育中是老師們普遍感到頭痛的議題，Debbie Epstein 很精彩的描述英國國小老師對教學「性」的各種恐懼教學，以及採取各種的態度與行動，例如「性／情慾」醫療化，讓性限縮在生物學的範圍當中，也藉此不去宣導在此「正常生物性」範圍之外的同性戀情慾；或是以「保護學生」的論述，警告性行為帶來的危險，強調關係、承諾和愛才是性的前提；不然就是「直接忽略」，不去回應滿肚子對性好奇的學生。在學生場的演講，性的議題一直是學生最喜歡問的問題之一，尤其是男生較多的班級，更是一定不會錯過。對於同志最大的好奇

也是在性上的差異，也就是性行爲的差異。但在不同情境下學生問出性的問題，卻會讓義工們選擇不同的方式來講性。

前一章提到老師背後的立場是我們入班演講首要考慮的條件，所以我以老師的態度爲一變項，加上從訪談內容的編碼結果，發現義工另一個考慮的變項爲學生態度。以此兩個變項交叉出義工演講性議題的四組理念型，如表 9 所示，此四組理念型並不是完全互斥，可以說是光譜，所以義工也不只使用單一詮釋方式來回應同學的性問題。此節我也想從義工對性的回應，指出在不友善或是保守的氛圍下，義工會選擇去性化的策略回應，而不正面回答同志性行爲的相關問題，尤其是避開討論男同志的性行爲³⁴。另外，除了開門見山的論述方式，我參考 Young 提出的轉化式同化主義（transformational assimilationist），統稱其他三種爲轉化式同化（transformational assimilation），轉化式同化指得是，仍把既定的制度視作支配團體的觀點與旨趣（interest），所以主要在防止任何性別歧視的現象發生，但不去解釋同志和異性戀上在情慾與性的差異，間接的把性議題當成是負面的與不受歡迎的（undesirable）。

表 9 義工回應性議題的四種類型

	老師	開放	保留
學生			
嬉鬧		直接反擊	個人隱私
認真		開門見山	移花接木

（本研究整理）

（一）直接反擊

強調同志親密行爲和異性戀有共通性，是反擊所要傳達的主要概念。當學生以窺探或嬉鬧的態度問出性的問題，老師開放出討論性議題的空間時，義工大多一開始會採取反擊的策略：異性戀也會肛交。爲甚麼性就是肛交呢？同學幾乎會先入爲主地把「性」和「男同志」做連結。我訪談的女同志義工所有人都覺得演

³⁴ 阿球提醒有時候老師也會考慮到自己班上的學生有無承受性話語的能力，才決定讓熱線的義工們講到什麼程度，所以老師對性的保守態度並不一定是個人特質，而可能是保護學生的方式。阿球就說道在升學率好的高中，仍較無法討論性議題，但相對地，高職的老師和學生對性的態度比較開放，尤其高職的老師會認爲「這就是現實」的態度，反而不容易造成像升學率好的學校有去性化的現象。妖妖也提到南強工商的老師就認爲「這是學生需要的東西」。

講現場同學只要問到同志如何進行性行為，大多都是指涉男同志如何做愛，逸璇就認為：「幾乎好像男同志很容易跟肛交連結在一起，所以同學可能一想到男同志就會問。」所以在這樣的條件下，最好的回應方式就是告訴底下的異性戀同學，尤其是男同學們，他們所指涉的性行為，也就是肛交，不只是同志的專利，異性戀本身也在實作肛交。男同性戀義工 Seven 以異性戀男性看 A 片的經驗給一記回馬槍：

我也會澄清說不是只有男同志才會肛交，因為他們未成年嘛！我就會說：「我知道這年紀的人應該都『聽過』異性戀裡面的 A 片，裡面有什麼樣的內容，也是有肛交的內容，今天不是只有男同志會肛交，我們跟親密的人發生關係不一定要是用性行為來證明我們愛彼此。」

除了把異性戀納進其所指涉的性行為之外，當男義工被問到是否會自慰或如何自慰時，也是同樣把國高中男性同學含括在此話題中。Zoe 就曾經被問到如何自慰：「有國中生就問我說你怎麼自慰，就問你會不會打手槍，我就很直接回答跟你們一樣阿！用手阿！我會比較想要強調說共通點。」反擊並不只是要單純進行語言上的報復以宣洩怒氣，反擊更重要的就是要讓異性戀知道，第一、許多性行為不是只有同性戀才有，第二、去除肛交在男同志身上的污名。就拿自慰為例子，異性戀同學仍然把同志當成是異類，而認為男同志自慰的方式與異性戀男生自慰的方式完全不同。

直接挑戰肛交的正當性也可能是回應的方式。女同性戀義工 Ling 說：「我可以跟他們面質說肛交哪裡不好？你平常也用手擦屁股啊！還用那個手來吃飯，你不覺得很髒嗎？」直接反問異性戀為甚麼害怕肛交作為反擊，Ling 認為異性戀覺得肛交並不符合自然的性行為，且肛門又是排泄糞便的出口，所以肛交違反人體自然的器官運作，而且也是不潔淨的行為。所以她假定如果每個人都用吃飯的那隻手（大部分是右手）擦屁股，不也是不乾淨，但為何從來不覺得如此呢？這種回應方式更進一步的駁斥現今社會對肛交的觀感，去污名化肛交的行為。

但也有義工認為以異性戀也會肛交的回應方式並不妥當，男同性戀義工金金以自身的性經驗質疑女生不一定喜歡肛交的感覺：

如果是把異性戀拖下水說到肛交這件事情的話，恐怕不是個好策略，我有點疑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對這一點有點存疑？而且回溯到我自己的肛交經

驗，那不是一個很舒服的感覺阿！那我甚至想像說我有女生的陰道的話會不會好一點，那如果我有女生的那個器官的話，那我為什麼要用這個呢？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會想像自己是女生，如果我有前面，為什麼要用後面？一般女生應該不會很喜歡肛交吧！？所以這是我一直很存疑的地方，如果把異性戀者也拖下水的話，有些女生也會跟我有同樣的感覺，就覺得說：「我們也不喜歡肛交，我們已經有陰道了！幹麼要肛交？陰道交比較不痛阿！」

金金以自己身體的經驗，認為這種把「異性戀拖下水」的策略可能會引起反感，在現場的女同學不一定會覺得這樣的性行為是可以接受與想像的。義工採用反擊的方式回應性議題，主要是因為學生用窺視與輕蔑的態度挑釁義工，大部分經驗豐富的義工不會生氣的反擊學生，但義工們多少在面對極不友善的學生時，還是會被影響到情緒，而帶有一絲怒氣的語氣反擊。反擊的優點在於讓學生們立即感受到對演講者不舒服的感受，但卻可能失去深入討論性議題的可能，尤其是女同志義工更不會想在嬉鬧的氛圍講到任何有關性的話題，避免又再度掀起一陣同學的喧鬧與訕笑。

（二）禮貌說：這是我的隱私

隱私作為理由是使用最多的策略，尤其是當學生的態度輕浮與惡劣，而老師又趨於保守時，隱私是保護義工自身最好的方式，也避免產生令老師覺得不舒服的話語。使用隱私作為策略有兩種手段，第一種是直接告知學生，性是個人的隱私，不方便在教室現場回應，第二種則是結合反擊的策略，通常反問提問的男學生：「你第一次認識人會問你昨天是用右手還是左手打手槍嗎？」教育學生用輕浮的態度問性問題可能是侵犯到他人的隱私，尤其又是第一次認識的陌生人，把同志議題轉化成人際互動的禮儀議題。在熱線，這種方式通稱為「禮貌說」。

義工往往使用隱私作為回應性問題的方式，主要仍是考慮到老師的立場，如果老師希望能避開性議題的話，多數義工會選擇此策略。男同性戀義工小小海就認為自己比較常使用「隱私」作為回應性問題的方式，因為比較不會帶給老師困擾：

大部分的時候都是比較婉轉的帶過那種，都是說這是一個隱私，沒有特別深入講的狀況。一方面是因為就是教育小組的人會比較偏向這個講法，跟我出去演講的人我看到的比較是這樣的說法，另一方面是，我會擔心老師是比較

保守的，我會顧慮到老師。我講了之後如果學生回去跟家長講，那老師不知道怎麼應對的時候，我覺得…會不知道該怎麼去幫忙到老師，我就會選擇那我就不講那麼詳細，可能就避過去這樣子。

有時候合作較久的老師也會主動要求義工在性議題上不要著墨太多，盡量以「個人隱私」帶過，順道教育學生要「尊重個人隱私」。像是和平國中的玉蘭老師就希望性的議題可以用隱私帶過，避免演講綜藝化：

蠻多輔導老師事後會寫說關於性的議題（講得太過頭）。因為有時候學生很敢問，而且又是很活潑的班級他們很敢問，然後大家可能會把他當成朋友就直接回答了，有時候我們很難拿捏到底要多討好他們，就是可能想要表現友善，可是如果過了那個程度就變成討好他們，我覺得也不需要，因為他們都是未滿十八歲，大家可能要衡量說，如果講出來的東西只是淪為一種好笑，好像對人家隱私的探究還是玩鬧，就反而失去了我們要達到的目標。我記得去年有一次好像有個義工講了一個蓮花座觀音座什麼的，他就會用隱喻的說法，可能學生就會開始私底下問。我覺得性的部份，大家可以知道說，老師希望就是朝向隱私的話題，不見得一定要回答那個孩子，就告訴他這是一個隱私的話題，避免讓學生好像在看吳宗憲的節目。

在未滿十八歲的考量下，避免和國高中生直接講到性行為是大多數老師考慮的要素之一。就算是異性戀的性行為也沒有清楚地在課堂上講過，何況是同性的性行為，但也有老師認為其實學生對於性的瞭解已經有很大的進步，拜網路資訊發達所賜，只要搜尋關於性的關鍵字就可以找到相關的資訊，所以維持一種上下之間不說破的默契，避免學生把大多數興趣集中在性上，而使得同志議題失焦。「禮貌說」對於老師仍是一種比較討喜的說法。

在我所演講的學校，當我們詢問老師是否有不要談的議題，多數老師會希望在性的議題上盡量能不提到就不要提到，如果學生還是問了，就以尊重個人隱私為由避開直接談性。在新北市某天主教高中的演講，因為音樂班女同學的友善態度，當詢問義工有關同性性行為的問題時，妖妖便講到性行為是一種讓對方愉悅的行為，與性行為的種類姿勢不只有同學們所想像的陰道交如此簡單貧乏。講完這場演講後的休息時間，老師就表示仍希望我們還是不要在性上有太多著墨，畢竟學校有天主教的背景，害怕談論到性議題會有鼓勵未成年青少年嘗試性行為的味道。

其實禮貌說對於熱線和老師而言都是個安全的選擇，熱線可以很快的和性議題做切割，老師期待藉由隱私為理由，順便教導學生「尊重」他人隱私。但對於學生而言，他們仍是對同志的「性」感到好奇，當同志義工在講台時仍是把性歸化到一個不願談、不許談、不被談的「化外之地」時，不僅再一次神秘化同性情慾，更諷刺的可能是教育對「性」的保守立場，不管是在異性戀或是同性戀上的性似乎都是個禁忌。

(三) 開門見山：肛交、手指、情趣用品

能夠開放地談論性議題的場次，在我所參與的演講中其實並不多，大多還是基於老師立場的關係，避免直接地談論性。唯一用健康的態度講性議題是在台北市的慎思高職。當時演講過程中，學生很認真的聽著演講，所以當問到性問題時，義工們直接詢問在旁老師的尺度，在經過老師點頭許可下，義工們便讓同學清楚地瞭解肛交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一場的男同性戀義工妖妖就認為那一場是演講性議題最開心的場次：「我有過一兩次真的講性的時候真的很盡興，然後我在想為什麼，其中一場是慎思高職，那一場就講得很開心，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在開心什麼，因為我覺得說我把我的底線都拿出來的時候，你可以真正接受完全的我。」

小崔是一個中性打扮的女同性戀，她一貫是採取開放的態度回應性的問題，尤其是當老師也選擇開放的演講內容尺度下，更不會刻意去避諱。當我提到如何回應現場學生的性問題時，小崔斬釘截鐵地不等我解釋完問題就說：

我會正面回應（性議題），因為我就被國中生問過，其實我知道有些在講的人會比較避諱談性，就算我知道提問的人可能是帶著一種窺視的心態跟眼光在問，但是性對我來說不是禁忌，它對我來說不是一種障礙。那我會正面地回答他，直接跟他面對面講，我說女同志就是用手指，或是你要用一些玩具也可以，我還跟他們講用哪一種玩具，這時候可能可以滿足他窺視的心裡，或是他可能就傻眼，他也沒有辦法回什麼話，可以堵住他的嘴，也可以讓在場的所有人知道女同志就是有各種方法做愛。

教育小組內部對是否選擇開放地講性議題仍有許多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在男生較多的班級中，我觀察到女同志義工比較不會開放地講性。留著一頭烏黑長髮的女同性戀義工逸璇，就很猶豫地說：「感覺（性）好像是在熱線可以講，可是出外面就好像太私密，對外人的話，或是對一個異男（異性戀男生）。」對於逸

璇而言，只想在小組內講性議題，外面的學生老師僅僅是無法信任的陌生人。另外，逸璇光想到台下還有異性戀男生在場，更不會直接的講性。在異性戀男生面前演講性議題，Ling 同樣和逸璇有相同的感覺，Ling 目前就讀於台灣大學，是一個中性打扮，講話中氣十足的女同性戀，她曾經在小組開會的時候表示自己回應性問題不免會焦慮成為異性戀男同學意淫的對象，這樣的感覺讓她很不爽和不舒服。所以 Ling 在避免滿足男同學性窺探的意圖下，她帶有反擊意味地公開談論性：

研究者：你怎麼講性？

Ling：就保持一個開明、健康、愉悅的態度。

研究者：比如說？

Ling：就是直接面對阿！就我可能反問他們什麼是性？如果是白目的小朋友的話。我會問他們怎麼樣叫做愛，然後本來 high 的人都講不出話來了。

研究者：他們知道嗎？

Ling：他們其實知道，可是他們就只是知道「那個東西」叫作做愛，那除了你們想像的插入的動作叫做愛，這樣就是做愛了嗎？

研究者：你不會講出生殖器？

Ling：我不喜歡講，可是我會講，如果需要的話，我心裡會覺得怪怪的，沒人看得出來。

此種開放態度講性的演講大多會引起老師的反感與緊張，喜歡直接談性的小崔自認遇到尺度保守的老師，自己還是會選擇不談，她在花蓮某高中的演講就因為事前不知道老師的尺度，而在演講的過程中以拉子「上」與「被上」的光譜關係，直接回應性議題，卻被台下的老師暗示不要談性。另外，有義工認為直接講性可能會引起反效果，尤其使用到敏感的性字眼時會引起一陣躁動。對於性議題頗有感觸的男義工金金，就以自己在公誠國中講第一次發現自己喜歡男生的性經驗為例，跟我訴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心情：

金金：國中更要小心處理一些議題，像我上次在公誠國中，性的問題就處理

的太深入，或者說處理的太不清楚，如果深入的話也有點危險，寧可清楚，但是不要深入。

研究者：危險在哪裡？

金金：危險在他們很容易斷章取義，在性的議題上，很容易只聽到性的部份，而沒聽到別的，因為性的議題一說出來很容易就譁眾取寵，只聽到那個別的都聽不見。

研究者：你是說你五歲的時候跟…

金金：跟表哥上床的故事。我後來其實也都非常小心處理這個問題，其實不要說國中，拿去跟大學或是跟教師場，這種同一個故事拿出來講，可能也都有點超過底線的一種危險行為，所以我當時還沒有想到要怎麼講，就純粹想要把它說出來，這個故事我用過幾次，一次是在台科大用過，公誠國中也用過，那當時在台科大其實就已經泛泛起一陣討論，連老師都很驚訝，連老師都跳起來問問題，所以其實就那個故事本身，會引起蠻多的爭議，所以不管在哪一個場次，看起來它都是違規的。

研究者：你應該以後不會再輕易嘗試了吧？

金金：不會再輕易地講得那麼…我可能會用別的東西去代替它，可是我還是要講五歲（語氣堅定）。我還是要講五歲跟表哥，但是上床這件事情我會用別的事情取代它，用其它比較輕的東西取代。

這一場在公誠國中的演講，後來在內部開會被一再地檢討，義工要如何拿捏性議題的尺度。也因為此場演講，而造成義工緊張的合作關係，尤其是同場演講的妖妖和金金就因演講內容與方式的出入，對彼此頗有微詞。是否可以開放的講性？阿球認為有些性的東西是不必要講的，因為講了也對同志教育沒有什麼作用與太大的意義，反而會產生反效果。智偉認為不是能不能講性的問題，而是義工有沒有辦法掌控講性議題之後的場合與失焦，他最後強調工作人員其實沒有硬性規定義工不能講性。但所有義工一致表示如果前提是老師不傾向開放的講性，又何苦去挑戰性的尺度，損害到與老師的合作關係呢？同場中，另外一位搭檔妖妖激動地跟我描述志明老師的臉色有多難看，以及如何處理現場金金突然的性議題：

我們在公誠國中的時候…我已經知道志明老師就是不喜歡我們去談太多性，而是希望放在尊重，放在多元，放在瞭解。當他（金金）這樣一講的時候，我就意識到台下會聯想到同志是淫亂的，同志一定都是小時候被引誘的，所以才會變成這樣，那時候我刻意引導到「你是被引誘的嗎？」還有就是說那時候刻意的去淡化，我就說有些人在這過程中是很開心的，一個是淡化，一個是幫他把話做一些篩選，如果台下是高中生還好，可是台下是國中生，他們不會做…這是我自己的判斷，我當時的判斷就很快。所以當時第一個是幫他的話做篩選，做一些過濾，還有就是幫他把 focus 不要放在性行為的事情上，而是把 focus 放在不是被引誘或是性其實是一件開心的事情，還有一個點是那時候志明老師的臉色很難看，他是真的在現場的後面臉色很難看，我很怕會打破我們的合作關係。

合作關係是義工演講首要考量的原因，菜鳥義工一進來教育小組就必須學習到演講不僅只是與同學的互動，更重要的是與老師的互動，如果因為演講中一句不適切的話語，引發老師的反感而無法再進入學校，則是最不願見到的結果。一方面義工要面對國高中學生對「性」高度的好奇與窺探，另一面又需維繫與老師的合作關係，性可能就不會是健康、陽光的、可以公開分享討論的議題，而是義工政治選擇的問題。不選擇公開、直接地探討性，也不甘願只是以禮貌說、隱私的方式帶過性，義工就會選擇避重就輕或是衛教的方式來回應同學對於性的好奇，而這種方式我統稱移花接木。

（四）移花接木：大腦說、安全性行為與愉悅

你們知道人體最大的性器官是在哪裡嗎？是大腦。為甚麼？因為人體的所有感覺、觸覺都是藉由神經傳輸到大腦，由大腦接收訊號經過處理釋放出舒服、愉悅的感覺，而且許多性愉悅也都是經由視覺感官，經由大腦接收所引發，所以大腦是不是人體最大的性器官？（妖妖於 20100107 光仁高中的演講）

上段「大腦說」是妖妖在新北市某天主教高中回應同學性問題的方式，妖妖在音樂班直接地說出肛交，而被老師反應不要講到露骨的性字眼，於是妖妖在下一場男生較多的班級採取大腦說，一方面可以避免直接講到特定的性行為與性器官之外，另一方面也可以含蓄地討論性，而不是都不談「性」。我第一次演講聽

到「大腦說」是在台北市仁愛高中的護理課演講，那時也是妖妖演講，期間我也陸續聽到許多義工使用此方式，例如阿仁。由於妖妖本身有心理學的背景，所以他自然而然以專業的知識論述轉化刺耳的性論述：

因為我對性並不會避而不談，我會很下意識的是，當然跟我的學科，我有一些心理學的、生理學的背景，所以很快我就有很多 data 可以用，比如說就是人類跟海豚是透過性可以獲得愉悅，…我記得我在仁愛高中的時候，那時候一直講最大的性器官是大腦，避開去談生殖器，因為我還是有一些老師的影子在，就會覺得不要直接去談。

避開生殖器或是性行爲的描述來談性是避重就輕方式的邏輯。此論述的機制在演講現場大約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上述妖妖提到的「大腦說」，第二種是「安全性行爲」，第三種為「愉悅與親密」。不直接的討論兩個同性的人如何做愛，而是把做愛的議題拉到其他生理器官、心理與關係的層面，如此可以滿足老師希望忌口不談性的需求，卻又不至於完全的去性化（像是禮貌說）不談論「性」這件事。

義工普遍喜歡用「大腦說」來回應性，Seven 認為在不知道老師的態度立場下，這個回答方式是最安全的，「我會跟他們提醒說，其實頭腦才是最大的性器官，我們怎麼樣最舒服的，怎麼樣可以激起我們的性慾的、愉悅的是靠腦袋，不一定要性交，當然我在演講場合是為了顧及說我不知道老師的反應會是如何，這個答案是最保險。」他說。

但也有義工對「大腦說」相當的反感，在開會時，義工們有時會開大腦說的玩笑，認為這種方式只是幼稚化台下的同學。其中我訪談的義工中，女義工 Ling 最為反對，她百思不解地問我「大腦說」到底好在哪裡，尤其對「最大的性器官」的曖昧指涉，讓她感到極不舒服：

我絕對不會採用大腦說，大腦說完全無法說服我，就我覺得為甚麼要提到大腦，我覺得你說你喜歡這個人，然後你們享受親密的感覺這樣很好，可是不用講到大腦說，什麼人類最大的性器官是大腦，這很奇怪阿！這到底想要影射什麼，你不覺得很詭異嗎？…我覺得大腦說根本就是個屁，就像是異男的笑話一樣，我不喜歡。

除了幼稚化之外，對 Ling 而言，「大腦說」的邏輯在於義工提問的字詞已經

造成同學們的遐想。當義工反問同學人體最大的性器官是什麼的時候，聽在女同志義工 Ling 的耳裡很明顯得就是在指涉男性的性器官，雖然最後義工說出來的答案是同學也猜不到的「大腦」，但這樣的表達邏輯仍讓 Ling 感到不舒服，彷彿就像是異性戀男生私底下也會開的黃色笑話。

在老師處於保守，學生開放的演講，除了大腦說之外，「衛教」的方式也是多數義工認為不錯的選擇。把性議題轉化成衛教的議題，進行「安全性行為」的宣導，除了適合在特定課程中使用之外，例如護理課，也可以偷渡性行為與性器官的字眼，因為這是一個健康的衛生教育宣導模式。男同性戀義工小魚考慮到老師的立場，選擇衛教的方式：「如果有老師在場的話，我就會看老師臉色，看是決定講衛教呢！還是把它含糊帶過之類的，那如果老師不在場或是老師 ok，然後我覺得學生不會因此非常躁動，我覺得其實可以談到比較深的東西。」妖妖在文山區的溫良高中也曾經使用衛生教育的方式回應性問題，以宣導「戴保險套」的方式來談性。在東部某高中對學生演講的小 high，提到在演講前得知許多女同學已經有過性經驗，但卻沒有進行安全的性行為，在不管老師的立場下，他決定仔細地向學生講解如何進行安全的性行為：

性議題我也看情況講話，像我之前去南澳帶小團體的那一場，幾乎都是生理女性，T 樣的小女生，才高中生，可是在我還沒正式上課之前就跑來問我，因為他們那裡是原住民部落，小朋友都很熱情，他就問說：「老師，你有沒有跟女朋友做愛？（原住民腔）」我們就有小聊一下，我就問說：「你有嗎？」他們就開始說：「有阿！」就是他們都拿哥哥的保險套或是塑膠袋、保鮮膜，就是一些我覺得很不正確的性行為，可能會有危險風險，不安全的性行為，然後所以在那個正課開始之後，因為我知道他有做，如果他有做還不講的話就是會更危險，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講，可能我就會介紹指險套是什麼，安全性行為是怎麼樣，就是比較嚴肅的去講性觀念、正確的性行為。可是如果今天是在那種開玩笑的場合，就我會反應他為什麼要這樣問，然後去看我今天要講什麼，看我今天是要回答他，還是禮貌說，我就不用回答這個問題，所以那時候主任有點嚇到，為甚麼要講那麼細？可能他覺得講性就想避諱一下，可是對我來說，我就覺得我一定要講，因為我知道他有做。

楊佳羚（2002）研究國中的衛生教育課程，觀察到：「在學校性教育課堂實踐的過程中，不斷劃出「性」的範疇與界線：包括界定正確／不正確的知識分野及區分正常／不正常的性。而所謂『正常的性』必須是以生殖為目的、以男性為

主體、並被放在異性戀婚姻家庭之中，因此必須規訓同性戀與青少年的性，使異性戀婚姻生殖的界線不被踰越。」雖然熱線教育小組跨越異性戀生殖與婚姻關係的性教育，藉由安全性行為的框架，把同性的性正當地加入進「性教育」當中，承認同志的性也是性教育的一環，而不應該被忽視，但就僅止於安全性行為的框架中才能說出同志的性，慾望的論述在此模式中仍是缺席。

最後一種說性的方式為「愉悅」，這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論述，使用此論述的義工有時候會含蓄地帶入自己對於性愉悅的感覺，大量使用各種感官愉悅的形容詞，把肉體的愉悅轉化成心靈上的愉悅，例如「舒服」、「開心」、「高興」與「互相取悅」；把性器官所進行的行為修飾成「牽手」與「擁抱」。如何進行同性性行為變成了什麼是親密關係的專題講座，性行為不是重點，親密關係才是議題。對性議題感到害羞的逸璇，就會把不敢啓齒的「性」改變成親密關係的論述：

我就說，性的目的就是要讓彼此之間很開心、很愉悅，就是那套說法，就是教育小組很常用的那套，比如說怎麼樣才是親密關係，有可能是你們牽手就會覺得很開心，或是覺得擁抱，然後或是撫摸，不一定要是插入式的才是性行為，然後我就說其實只要能夠達到互相取悅或是開心就是性的一種。

不管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從親密關係所獲得的愉悅都是相同的，這種異同相似的論點是此論述重要的基礎。對國高中的異性戀同學來說，除了健康教育課本教授的異性戀陰道與陰莖交媾的性行為之外，很難有同性性行為的想像。所以能夠在感官、情感或心理結構上強調異同的相似性，則能讓台下的異性戀同學容易進入對同性性行為的想像，並去除掉「性」與「同志」的強連結。妖妖算是這一論述的支持者，和他合作的演講場次中，時常聽到他強調異同之間的相似性，性也不例外，他說道：

變成我講得性不是把它特異化，而是你們做愛開心，我們做愛也會開心，為什麼只准你們用那種方式開心，不准我們用這個方式開心？你失戀會難過，我失戀也會難過，開始在那種異同之間去拉攏，或是說我跟你都一樣，只是我們的某些方法不一樣，去這樣講，一樣還是講性的方式。

到最後，乾脆直接把性的議題轉變成心理層面的情感議題，或是親密關係議題，去除掉同學對同性戀性行為的好奇與想像。其實妖妖並不是頻繁使用此模式的人，在教育小組幾乎每位義工都曾使用過，因為這個「合適」的說法除了正是

老師所期望的之外，也讓某些義工能取得維繫現場狀況的主導權，而不讓學生與所欲求。Ling 自己就會分析現場的狀況來選擇「性」要如何講，以及講到什麼程度，有時候甚至都不要講更好：

要看提問者的動機，如果就只是八卦或是好奇或是淫蕩的提問的話，我就覺得我為甚麼要回答他們。如果台下真的有需要知道這個問題的話，我還是會好好回答，但如果是整個純男生班，我就會覺得為甚麼要告訴你這種事情，我可能就會避重就輕，我就會說兩個人在一起有親密的接觸分享好的時光，就算是性愛的一種（笑），就是避重就輕阿！

不論是大腦說、衛教宣導或愉悅的演講方式，都帶有一點避重就輕的味道。有時候義工會感覺到自己對於學生的反應太過敏感，反而讓性議題完全被封死，女義工 Gaia 就質疑採用此方式的義工把自己的預設套在學生身上，沒有真的回答到問題，可能會導致學生不再提問：

我有一點很不習慣，可能是大家要破除污名或是在台下有問題的時候，會繞一大圈都沒有回答到，都在講自己的理念，我不太喜歡這樣，就比如說我印象中台北市的勤毅高工，就台下有個學生就問，就是男同志要怎麼做，那我想說我在台下，如果是一個學生就真的是好奇，因為我想像中男生怎麼跟男生做呢？我就會好奇想要問，但是那個時候我們主講者的回答是：「性是同性戀跟異性戀都有的阿！那性要怎麼做呢？要『安全』的做！所以要帶保險套避免得性病。」就這樣繞繞繞了一大圈之後，還是沒有回答到男同志是怎麼做的，我就覺得…如果今天我是那個問問題的人，我就不會有下一個問題，我是覺得今天我會有問題是希望得到你的解答，但是我覺得講者沒有把我的問題聽進去，他只是講自己想講的東西。就算是窺視的問，我還是會先回答他的問題，而不是一開始就把我的意識形態加在他們的頭上，我會覺得那樣的回答是很政治正確的，男同志的性跟一般的性沒什麼兩樣，都要帶套阿！但他還是沒有回答到那個學生的問題，我比較不喜歡這樣。

Gaia 的質疑或許會遭受到義工們的批評，認為 Gaia 並沒有考慮到老師的立場，在上述勤毅高工的例子，Gaia 認為義工應該直接講到男同志性行為，例如肛交，而不是以戴保險套就交差了事。性議題的兩難可以說是義工們演講一定會經歷到的過程，每個義工並不是隨意地回答性問題，在考慮特定的條件下，選擇對教育小組安全也對自己安全的回應方式是必要的。但如同 Gaia 提出的質疑，

是否因為在「考量」各種「考量」下，反而強加了過多的意識形態或預設在演講上，而失去了更多對話的可能？回到工作人員阿球與智偉對於性議題的回應，兩人都強調不是不能講性議題，而是義工如何承接性議題以及回應性議題所帶來的後果。我認為，不是義工能不能承接性議題，而是在維持與老師的合作關係意識下，義工首先就會選擇安全的論述，尤其是去性化的論述，避免破壞熱線和學校的合作關係。

性的論述在台灣的公領域或運動上，本來就一直處於邊緣與禁忌的位置，遑論是在教育體制內。雖然熱線教育小組的賣點是說故事，但我觀察到義工並不會用說故事的方式來談性議題，因為情慾的敘說在教室中有更大的困難與挑戰，情慾與性在同志教育中是落在不重要與危險的區域，碰不得。這一節的焦點並不是要鼓勵學校開放性論述的空間，而是性在性別議題的重要程度並不亞於情感關係、家庭議題、尊重與多元性別等議題，尤其對於性探索正處於高度好奇的青少年時期，性議題也是他們尋找自我認同重要的一環。不管是基於校規、價值觀或是私領域等理由，如果當學校或教師仍在避諱談性，反而壓抑了青少年在學校找尋情慾與認同的出口。

第三節 異性戀想像的性別流動說

在老師場的演講上，教育小組的女同性戀義工與女雙性戀義工遇到最為困擾的問題為假性同性戀（或是同性密友期）與性傾向流動的挑戰。有女義工在場的演講，幾乎都會有老師舉手提出假性異性戀的問題；另外，雙性戀義工也常面對教師對性傾向流動的反擊，使得不僅是雙性戀義工聞「流動」色變，連其他義工也都避免講到「性別流動」的字眼，害怕一說出性別是流動的，可能就被教師質疑：為何不流動到異性戀的性別？而帶來許多解釋上的麻煩。

（一）雙性戀的性取向麻煩

為了避免在性別定位上的麻煩，性別在這裡反而必須是固定，而非流動。對於雙性戀義工而言，喜歡男生與喜歡女生的性別認同在演講現場不一定可以理解。許多老師聽完雙性戀認同歷程的故事後，還是抱持著雙性戀可以變成異性戀的心態回應義工。所以許多雙性戀義工在教師場，寧願選擇當同性戀也不要表露雙性戀的認同。目前就讀師大的女雙性戀義工樂高，在教師場的演講，就刻意淡

化喜歡男生的經驗：

如果在父母場或老師場的話，我的故事會講得比較少，因為我是雙性戀，你知道就是假如我跟一個女生在一起，可是我下一個伴侶有可能會是男生，像這種話我就不可能會講，因為雙性戀可能會講到情慾比較流動的部份，如果沒有講好的話是大忌！我怕台下的父母跟老師會覺得你現在是同志（同性戀），以後也有可能變成異性戀阿！雙性戀也可能會結婚，（我覺得）這樣很不好，我自己知道這樣講很不好。

雙性戀所面對的「雙重暗櫃」議題，在日常生活當中是保護自己的一種手段，避免製造額外麻煩的策略，同樣地在演講現場也是。強調自身沒有性別認同的女義工小 high，對別人在她身上貼任何標籤感到相當反感，她認為自己喜歡一個人不是因為那個人的性別，而是那個人的本質。但當我提到教師場的演講是否會以雙性戀的身份出櫃時，小 high 仍保留的說：「老師場我有一個顧慮是，今天我想要出櫃，我寧願說我是同性戀，我不會跟他們說我是雙性戀，就是很複雜，就是如果你跟他講雙性戀，他會期待有一天你會變回來。」

異性戀體制不僅穩固地鑲嵌在社會結構上，更是交織於行動者的心態結構中。雙性戀義工的焦慮不僅來自於自己的性別認同被扭曲與誤解，更來自於對僵化的異性戀思考 (thinking straight) 的無奈。女性主義學者 Chrys Ingraham (1994) 認為性別無可避免地束縛在異性戀當中，她稱此性別為異性戀的性別 (heterosexual gender)，使異性戀在日常生活被視為理所當然、自然地發生與毋庸置疑。此異性戀想像 (heterosexual imagination) 必須依靠一個偏差的他者 (同性戀)，這個他者無法不去參與異性戀性別支配性的安排，當然也就沒有正當性或被視作正常的可能。

樂高與小 high 的演講經驗清楚地刻畫出性別在異性戀中的樣貌，以及「性別流動」在異性戀詮釋下的荒謬。「性別是社會的，異性戀是自然的」變成台下異性戀教師反擊的圭臬，性別認同只是社會建構的一個標籤，異性戀才是自然的、本質的，社會建構的標籤可以隨意更換，但自然的異性戀無法改變，就算性向會流動，最後也會流動到自然的異性戀。雙性戀義工就在這性別流動的弔詭之處中，時時提防著陷入異性戀性別的泥淖當中，擺脫不掉。

不僅是雙性戀義工隨時要注意性別流動說，有時其他義工為了強調性別二元

並非固定不變，隨口會加一句「性別是可以流動的」，卻引發非預期的後果，老師們開始質疑，既然可以流動為何不流動到異性戀呢？演講經驗豐富的男同性戀義工 Seven，有感而發的發表自己不想要鬼打牆和老師們辯駁，會刻意不去提到性別流動，避免增加多餘的困擾：

老師場我會盡量避免講性別是可以流動的這件事情，因為我發現老師們聽到性別是可以流動，就會開始急著說，那他（指學生）是不是可以矯正回來異性戀，他所謂流動的意思就是可以「流回去」（異性戀）的意思，最好不要流回來（同性戀）。那我覺得說這只會增加我演講的麻煩，我覺得這樣會變成鬼打牆，常常有老師會問成因會問半天，然後還是會問同志為什麼形成這樣，我就想我講得還不夠清楚嗎？我常遇到這樣鬼打牆的狀況會很困擾。我又不能臭臉，我還必須很耐心地跟他們講完，所以與其要我自己講到口沫橫飛，然後海枯石爛，我覺得倒不如不要講流動，直接告訴老師有可能發生，有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乾脆這樣講而不是跟他們說情慾是可以流動的。這句話我覺得不會在老師場講出來，我會盡量避免，我不會說我可能喜歡女生，那老師一定會說：「那你有沒有考慮以後喜歡女生？你就流動到喜歡女生就好啦！」我會覺得說，這樣的場合會讓我很困擾，我不喜歡老師一聽到或逮到有變回異性戀的可能時窮追猛打，我不喜歡這樣的情況，雖然這個情況常發生。

不給老師最後一絲可以變回異性戀的希望，Seven 選擇只講有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等性群體，不再深入的解釋情慾流動的可能性。僵硬的性別認同對於教師場而言，反而是義工們普遍認為較好的演講內容。另外，教師場的老師普遍都有另一個身份：父母，所以有時教師會用父母的立場和義工們對話，義工們和老師對話就等於是在和父母對話一樣。目前還沒有確切認同的生理女義工 Gaia，就相當害怕游移的性別認同成為老師反擊的小辮子：

性傾向可以改變是絕對不能提的，或者是那種可以變來變去，或是搞不清楚狀況像我這種的就是大忌，像郭媽媽就會講說父母都會挑自己想聽的話聽，你講性傾向可以流動的，或者是雙性戀的可能，比如說講一個人雙性戀好了，那父母永遠都只會看到至少有異性戀那一塊，同性戀這一塊就不要，或者是性傾向 99% 不能改變，那父母就會想：「喔！所以還有 1% 可以改變之類的囉！」所以我就會覺得說，性傾向可以流動，或是像我這種搖來晃去這種狀況，萬一讓父母老師聽進去了，他可能就會覺得說雖然你是同性戀搞不

好你下一個喜歡的是女生阿！搞不好你之後就變成是異性戀啦！我覺得這是大忌，如果是很傳統的老師就不要講，有時候不要太誠實，這樣也是保護同志小朋友的方式。

從上述義工們的經驗可以發現，當演講內容再怎麼完美，只是露出一絲絲性別是可以流動的言語，老師們便會見縫插針，極力地把流動說轉化成和義工對話的武器。這裡浮現出一個矛盾的現象：激進的學術語言轉變成攻擊自身的武器。原本拿來充權（empower）主體的流動說，在教師場的演講上，卻被挪用和歪用成鞏固異性戀傾向的證詞，既然可以流動那就流動到異性戀吧！許多義工面對此糾纏不休的反擊，寧願放棄袒露自己真正的性別認同為流動或是沒有認同，轉而選擇一個安全的、固定的立場，不讓老師有機可趁。

（二）當女同志遇見 100% 的異性對象

在老師場的演講裡，我觀察到跟流動說相似的另一個議題：同性密友期。同性密友期往往專指國高中女學生讀女校時喜歡上女性友人，男校反之亦然。同性密友期時常成為女同性戀或女雙性戀義工演講上的困擾，老師會用自己在學校的求學經驗挑戰義工們的認同故事。在信義國中的演講，邀請我們的關鍵老師也在演講空檔透露自己曾在求學的過程中欣賞一個很帥氣的女生，並問我這樣是不是算「情境式同性戀」（假性同性戀）的問題，雖然最後她還是有結婚。像這樣的疑問幾乎是女性教師的共同問題，在聽完義工（尤其是女義工）的故事後，對照自己曾經喜歡同性的經驗，於是反問目前是同性戀或雙性戀的義工們，是否將來也會變成異性戀？這樣經典的假性同性戀或同性密友期模式，幾乎會在每一場教師演講中出現。

Adrienne Rich（1980）提出強制性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概念指涉文學作品當中充斥著不假思索、普遍預設的異性戀關係。這樣的強制性異性戀觀念讓曾經喜歡過同性最後結婚的異性戀老師們相信，同性戀只是個過度、暫時的迷戀，無論如何到最後都是會「變回」異性戀，哪怕只有 1% 的機率也可以變回來，因為同性戀只是個例外。本身認同是女同性戀的香菇，對於教師場同性密友期的質疑感到不耐煩，認為這是一個複雜的議題，尤其當自己的故事無法回應時更難處理：

演講的時候我覺得可能有一個議題蠻難回答的，就像同性密友期。老師們他

們會問，兩個女生兩個手牽手走在路上，那你怎麼分辨他們是好朋友還是情侶？有些老師也會以自己的生命故事來回應，就會說：「我也曾經迷戀學校某一個偶像，到了某一個階段就沒有啦！」我覺得我很難用一個統一的論調來回應他，我沒有辦法去回應他說，那密友期那個階段到底算什麼。他們會很強調說，他們會覺得說可能國中的時候女同志交往，只是兩個女生很好，那不是真的喜歡或真的愛什麼的，他們會比較這樣解釋。我會比較無法去回應他們這個說法，因為我覺得那是個人的想法，個人的生命故事，我沒有辦法去判斷說他們現在是怎樣的關係，他們對感情是怎樣的想，我沒有辦法去回應這個。

是情人還是朋友？香菇認為這個不是單純情境的問題，而是複雜的情感議題，不是三言兩語或是單一論點就可以解釋。面對強調對同性有好感是求學過程的一個階段，並用自身生命故事作為證明的老師，女同性戀義工小崔無奈地表示如果老師無法反思，對話很難繼續下去：

對阿！是情人還是朋友對女同志來說是個議題。就是我們講到同志是不是階段性的問題，（老師）她就說她以前高中的時候很喜歡一個女生，也不是好朋友那種喜歡，但是她大學之後就喜歡男生了，也結婚生子，她覺得這是階段性的，就以她個人的例子來說同志是階段性的，就會有這種情況。我就覺得這種人最難講，這種人最難講。而且如果她也不做反思的話，我們也很難繼續下去，目前我覺得這是最難對話的。

除了以自身經驗去挑戰義工本身的性別認同之外，老師也常提出假設性的前提，反問義工是否有變回異性戀的可能。如果遇見 100% 的異性，有沒有可能就變回異性戀？我觀察到問出此問題的狀況，多為男性教師當面詢問女義工。打扮像「一般」異性戀女生的女同性戀義工逸璇，老師們聽完她的故事後，不免會對於外表溫柔婉約的逸璇提出這樣的問題。逸璇就跟我分享在一場高中老師研習的演講，不斷被問是否可能變回異性戀：

研究者：你大學有交過男朋友？

逸璇：沒有，只是有喜歡過男生。

研究者：所以等於是你講你也有喜歡過男生？

逸璇：對！但我還是會說我是女同性戀。

研究者：所以你之後演講也會講到那段嗎？

逸璇：我會講我是女同性戀，但是我會說我可能會變雙性戀或是有喜歡過男生。

研究者：那如果有老師就跟你說，為什麼就不去喜歡男生呢？

逸璇：我有被質疑過，我那個時候只是說國小的那段完全很迷濛的愛情故事，完全沒有什麼感覺，結果老師還是一直鑽一直鑽。

研究者：他怎麼鑽？

逸璇：他就說：「你**真的**確定你喜歡這個女生嗎？」反正他就一直要我確定一次那種喜歡的感覺，我可能那時候沒有回答的很好，或是沒有回答我喜歡女生是多麼真實、多麼難以壓抑，沒有回答得很清楚，那一場這個老師問我這個問題問了三次，我回答以後，他又轉用一個方式問：「**如果你遇到一個條件很好，什麼都是符合你的條件的男生，那你有沒有可能喜歡他？**」（粗體為作者所加）

對是不是「真的」同性戀這個問題的焦慮，可以從老師場的反應有所端倪。在三番兩次地向義工確定是「真喜歡還是假喜歡」同性，一直到最後使出真空、去脈絡的完美前提「如果遇到符合你的條件的男生」出現，有無可能改變性傾向。這種不斷區辨是否為同性戀的焦慮來自「及早發現及早矯治」的心態。Seven 一針見血的指出，這些不斷想辨識同志與否的老師仍然把同志視為一條偏差的道路：「我發現老師最大的癥結點，就是看起來不是同志的學生怎麼分辨出是不是同志，避免他們踏上同志這條路。」這種及早發現及早矯治的心態和同志是先天後天的問題有同工異曲之處。

對於同性戀與否的鬼打牆問題，義工們時常感到不耐煩。有一場老師不斷對一位女同性戀義工的性傾向鑽牛角尖，在旁的男同性戀義工金金忍不住用自己的經驗反駁老師：

上次跟智偉去某技術學院的時候，幾乎差點跟現場的老師對罵起來，有一個男老師問 cherry（婆的形像）說：「你現在可能是沒有遇到對的人，你剛剛

自己有講說你自己交過男朋友，然後你覺得不是很喜歡他，那可能是你現在沒有遇到對的人阿！你要不要多試幾個人，才能確定自己。」然後我就立刻跳起來說：「我也交過女朋友。(現在卻認同自己是男同志)」然後就被智偉攔下來。

面對同性密友期的問題，除了不耐煩的反應，義工其實也會發展對策直接和老師對話。我最常聽到回應同性密友期的方式是：在不反對老師的生命故事，去正視老師當時和同性朋友之間的情感關係，並給予肯認。妖妖就認為這樣的回應方式很好，既不會公然的推翻老師的經驗，又可以讓同性的情感再一次被承認：

在很久以前，有一次我跟夜盲、小杜跟樂高去台北縣的某個國中講，然後有個老師就是自己大學的時候，曾經有過同性密友，可是現在覺得走回來了，就覺得那個只是過渡吧。而且那是老師的故事，你也不能去反對，那時候我就在想我會怎麼講，可是後來是小杜跟夜盲講，他們說：「喔！對！可是那段過程中是開心的，是快樂的。」我後來想這樣講還蠻棒的，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重點是在當下。

另外一種回應方式則是連結到社會結構的壓迫。許多同志會在工作、家庭、婚姻以及社會的壓力下選擇進入婚姻。這種把生命故事連結到社會結構帶來的壓迫的方式，讓聆聽者可以理解到現實日常生活當中還有更大的結構脈絡不容忽視 (Polletta, 2005)。前面 Seven 提到被流動說糾纏的慘況，在面對假性同性戀的論述，他以不同時代的同志面對不同程度的社會壓力有不一樣的選擇回應老師：

我通常回應他的方式是說：「老師，我們接過很多電話是男同志大哥，他們很感慨當年那個情況好手好腳的男生能不結婚嗎？」今天我們沒有看見那個女同學的情況，但是第一個有沒有可能是被逼婚的，第二個有沒有可能他是雙性戀的一種，可能剛好這個女同學遇到的真愛是男生就跟男生結婚，有可能阿！我們不能否認這樣的事情發生，我盡量會避免說他是「變回」異性戀這樣的情況，我會告訴他各種的可能促使他結婚，或是說他今天如果沒有傳宗接代的壓力、沒有家庭壓力、沒有社會對同志負面的刻板印象，如果他真的是一個同志搞不好他也不會結婚，這也是有可能的，他的選擇多的時候，他有可能選擇跟男生結婚嗎？這是個問號。我不會去說這個女學生是一時迷惘，那老師可能就會說：「那要怎麼幫他避開這個迷惘？」又來了！鬼打牆的方式又來了！

義工們的回應並不是在跟異性戀討價還價。面對流動說的風險與情境式同性戀的糾纏，義工知道必須先透視教師們心中的預設，才能去除掉後續不必要的麻煩，就算是拐彎抹角的帶過這兩個議題也好。Ling 很清楚知道，首先要觀察到教師們問題背後的預設為何，避免正中老師的下懷，因為這不只是一場簡單的演講而已，而是一場上下交相賊的鬥智遊戲，雖然回應的答案並無法說服自己：

研究者：還有哪些內容是你講完後沒有辦法說服自己的？

Ling：就像是我覺得性傾向是不是會改變這很難回答，像今天的假同性戀問題。

研究者：不能說服自己的地方是在？

Ling：就是我想回答說：「就是會改變阿！它就是會動來動去。」卻沒有辦法這樣講，一定要拐彎抹角的講。

研究者：那你怎麼講？

Ling：如果這個社會能夠延續女校友善的氣氛的話，我不覺得他們會變回來，我不覺得他們的感情就會到此為止，就是他們也許會有更多的可能。

在生命教育中，對於同性戀是否可以改變仍有支持的一方，錢玉芬（2010）在第六屆生命教育研討會發表的文章總結「同性戀可能受到童年經驗的影響」與「同性戀有改變的可能」，她認為：「如果一個同性戀者想要走出同性戀，重新審視自己的成長經驗是必要之舉。」雖然錢玉芬並無直接把同志等同於不正常，但字裡行間充斥著同性戀改變成異性戀的過程是一個「全人的甦醒」等話語，不免暗示異性戀的關係才是應該追求的倫理與價值。錢玉芬認為的生命教育和第二章提到「同志教育作為生命教育」立場的老師有所差異，但在校園中仍有非常多數的老師是抱著類似錢玉芬所提的想法在「教育」學生，一邊在同理同志學生的同時，一邊卻把「同性戀可以改變」當作是不可動搖的信念，卻不自知的維持著異性戀霸權意識，而這也是讓義工們棘手的地方。

固定/流動的性別認同不管是在雙性戀還是情境式同性戀都充滿著論述上的兩難，造成兩難的根源正是老師異性戀想像的預設。一方面義工擔心真實的性別流動想法一脫口，會造成難以解釋的後果，所以「噤口」變成最普遍的反應形式；另一方面義工也想試著回應老師僵化的異性戀想像，當華麗的性別流動論述不適

用於教育現場時，取而代之的是點出現況更大的社會結構壓迫使同志「不自由的選擇」變成異性戀。

第四節 小結：「正確的」性別觀念的兩難

與欣潔及小莫到台北市松山區某高工演講，這場次的形式是朝會場，全校同學集合在操場，先升旗再由校長與各處室報告學生事務。邀請我們的輔導老師考慮到上級的壓力，希望我們能夠講關於性別多元的議題，減少一些同志議題。欣潔演講的過程的確從彭婉如事件講到葉永鋕事件，不過之後她慢慢把主題轉移到性別氣質以及校園同志議題上。小莫之後也現身分享自己在求學過程中遇到的校園霸凌經驗，後來欣潔有悄悄地跟我咬耳朵說反正講都講了。一直到朝會時間結束，輔導室主任默默的走到欣潔的旁邊，手拿著另一隻麥克風，暗示著欣潔快一點結束尊重校園同志的結語。等到欣潔交棒給輔導室主任後，主任開始小結，只是沒想到欣潔明明講的是多元性別甚至是同志議題，而小莫更是直接現身分享同志故事，他卻可以完全漠視剛剛發生的一切演講內容，開始說男生女生一樣好的「兩性平等與尊重」結論。(20091208 田野筆記)

上一段田野筆記是我第一次在演講結束後，遇到老師進行論述消毒的經驗。對於熱線而言，這樣消毒的動作並不少見，尤其當關鍵教師上面還有上級師長時更容易發生。小魚分享有一次到學校演講的經驗，演講完後校長上台說：「我們關心同志一定要的，但是要 22 歲以後才能確定自己是不是同志喔！」Winter 也在教師場遇到校長表面上支持多元性別，但是觀念上卻仍站在兩性的性別觀點質疑同志教育，校長在演講最後提問：「國中就可以確定了嗎？」並用自己的生命經驗支持己見。

在教師場的演講，義工們知道並不是所有老師都能夠接受與聆聽同志議題，可能隨著不同宗教、信仰與習俗反對同性戀或同志。但這些老師並不會直接在演講的過程中公開自己的想法，因為這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場合，反而自身恐同或是排斥同志的價值觀可能會成為眾矢之的。像上面提到的主任與校長他們選擇進行最後的消毒動作，讓安全的男女兩性議題蓋過爭議性的同志議題。

有趣的是，我和阿球在屏東的博學國小的教師研習演講時，卻不小心「逼出」

反對同志的聲音。這場阿球在演講 100 分鐘後，提到男同志常與肛交連結的刻板印象，突然有個女老師舉手，帶著憤怒的口吻說：「我覺得老師（指阿球）提到的字眼（肛交）讓我很不舒服，希望可以不要再繼續說下去。」之後女老師兩手交叉的坐下，面無表情的看著我們，很明顯得，她已經對我們剛剛講的內容忍很久了。大概是「肛交」這個詞是壓死她的最後一根稻草，當阿球想澄清為什麼要講肛交這個部份時，她又打斷阿球接著說：「我可以贊同尊重和包容，但為什麼要給國小的小朋友知道這些東西（指同性戀議題）？小朋友知道了難道不會成為同志？」她也直接質疑我和阿球的生命經驗，認為我們兩個從小意識到在性取向和別人的不同，所以不斷的在心理「強化」自己是同性戀；她覺得是我們自己放大了同性情誼的部份，只因為感覺到自己喜歡男生，所以就覺得自己是同性戀，這是自我強化內在心理所造成的。現在又要老師提供同志訊息給小朋友，這樣更會加重同學對同志的認同。最後她認為異性戀才是佔社會大多數，為什麼不給予這些從小就有同性戀認同困擾的小朋友幫助，把他們導入異性戀正軌，而卻是要去給他們同志的資源或資訊？事後的輔導主任不好意思地跟我們說剛剛那位女老師是虔誠的基督徒。

Gamson (1998: 119) 研究同志在脫口秀節目的各種互動，觀察到當反同性戀的觀點清楚表達出來時，很容易成為其他觀眾撻伐的對象。在 1993 年，Geraldo 節目邀請因參加高中舞會而引發爭議的兩位同性伴侶，以及家庭研究機構的主席，在主席發表鼓勵「此錯誤」的行為會產生令人難過的後果，以及此不負責任的學校系統會如何殺死進入「此生活型態」的學生等等言論。最後當他以來賓的小孩為例談論 AIDS，最後說著：「這個可憐的女人。」，這時其中一位女同志站起來大叫的說：「我不可憐，我可以驕傲的抬起我的頭！」反而贏得現場觀眾熱情的掌聲，並凝聚起一股反主席言論的爆炸性力量。

我觀察到其他老師對女老師這席話開始搖頭，甚至在女老師講完以後有的老師急著舉手發言。阿球稍微澄清剛剛講肛交的脈絡是在很多異性戀遇到同性戀就會直接問你是 1 號還是 0 號，這樣的問法就是把別人私密的事情搬到檯面上，所以從這個例子說明異性戀對同性戀的盲點。後來一位穿紫色衣服的女老師舉手發言回應剛剛情緒有些憤怒的女老師，他說這場演講並不是鼓勵同學要變成同性戀，而是面對到同性戀的學生我們老師應該有什麼樣的態度，或是給予什麼樣的幫助。最後邀請我們去演講的輔導老師也舉手分享在一個講同志議題的研習會中，曾被問過是否願意自己的小孩是同性戀嗎？他回答：「沒有一個父母可以決

定自己的小孩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這個不是父母允許小朋友可以成為異性戀，他就會成為異性戀，或是你不准小朋友成為同性戀，他就不會變成同性戀。」

這位有基督徒信仰的女老師所發言的內容正是熱線教育小組在每場演講現場所要對抗的一種論述，剛好這個在教室裡看不見的論述敵人附身在這個老師身上，透過她說出心裡最深層的反同性戀的情緒和想法，才有可能打破一直以來充斥在教師演講現場的偽善，可以說提出反對意見的老師可能才是激起爭論火花的火苗。

同志議題雖然靠著性別二字開始有許多機會讓校園的老師與同學認識，在進步開放的同時，許多偽善的一面也開始增加，因為偽善所以不可言說，更加難以對話。簡單的來說，同志熱線的教育小組所要挑戰的並不是公然表達反對同志意見的人，更是要去想辦法刺到「一語不發」的偽善者，而這也是同志運動目前最為困難的地方。阿球認為在教育現場，義工更要意識到異性戀對於同性戀與同志不友善的刻板印象，他語重心長的說：「不管你是到西斯版³⁵或者是一些匿名版，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對於性別或是性傾向或是性別氣質，對同志不友善的人那種污名有多麼的深刻。雖然最近這個環境聽起來愈來愈歌舞昇平，但是愈是歌舞昇平大家愈是要清楚會達到多偽善。」在這個政治正確的世風下，偽善的教育者藉由不參與的態度，消極地抵抗性別政治正確的為難窘境，他們只要在研習出席表上簽名、演講中途尿遁或是整場演講不發一語，就算他再不認同同志，只要不說也沒人知道。對於熱線而言這是最不願意看見的情形，因為沒有爭議就沒有打開認識彼此的可能，更遑論達到認知解放，當回到教育身上，這些偽善的教育者在他們的教育中，仍可能釋放出對同志不友善的訊息，仍帶著對同志的偏見，仍可能抱著「男生要有男生樣，女生要有女生樣」的信念。教師是一個營造班級氣氛最重要的人，當同學從這些教師身上嗅到不友善的味道時，可能造成同志學生的處境更加艱難，以及主流的性別規範也藉由這些老師在教室中不斷的再複製給學生。

第三章從說故事的策略、性議題的回應與對性別流動的焦慮，無非都是義工清楚意識到能講與不能講的界線，而這些界線的根源正來自於什麼是「正確的」性別觀念的兩難。Foucault (1978: 12) 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性不是不被說，而是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說出來。」諷刺地，似乎在教育小組的同志教育演講上，

³⁵ 電子佈告欄系統 (BBS) 的批踢踢實業坊 (Ptt) 平台的 Sex 版，又稱西斯版。

同志不是不能說，而是用不同的方式說出來，不同的只是我們不活在維多利亞時代。在脫口秀節目中，同志議題常常也和許多框架結合，例如家庭、個人議題與人際互動，不直接的談論「同志」本身，而把焦點放在同志引發出的「家庭危機」與「情感關係的困境」議題上，更為敏感的道德問題也轉化成「個人選擇」議題（Gamson, 1998: 115-6）。如同脫口秀節目一樣，教育小組也結合不同的框架來訴說同志議題。在第一節（說故事策略）中，同志的故事說的是求學遭受的困境、和家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異性戀也有的情感議題；而第二節（回應性議題的四種類型），同志的「性」說的是人際關係基本禮儀的禮貌、性愉悅的生理原理「大腦說」、衛教宣導的安全性行爲，以及摸不著邊際的情感關係或親密感；第三節（性別流動說的焦慮），部份教師對性別流動的概念，竟然荒謬地以異性戀觀點詮釋，認爲既然性別可以流動，爲何不流動到異性戀。雖然「正確的」性別觀念給予同志義工發聲的舞台，卻同時也給予發聲的限制。

Gamson (1998, p.132) 注意到在脫口秀中，同性戀會被接受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符合性別一致性(gender conformity)，第二、「一夫一妻式」(monogamy³⁶)的情感關係，這兩者也是觀眾判斷同性戀是正常與不正常的邊界。所以對於電視製作人而言，最可怕的同性戀來賓就是有著非傳統性別二元的展演（男不男，女不女）與非單一伴侶的性愛關係。回到教育小組的演講狀況，似乎和 Gamson 分析的脫口秀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教育」場域不需要提到各種同志樣貌，以及不同的情慾關係；而至於性別展演的反轉，在前面說故事策略也提過，男同志義工扮裝現身有時候反而會造成反效果，加深異性戀對男同性戀的刻板印象：娘娘腔與想當女人的男人。教育場域並不像在街頭抗爭一樣有話就說，性別教育隨時處在正確與不正確的邊界，性別教育與性別運動的差距也就在於此。所以當教育小組帶有教育與運動兩種色彩的行動時，正確的性別意識就讓義工的演講內容顯得兩難，一方面，教育場域限縮義工／運動者的性別論述尺度必須符合年齡、教育學與道德倫理的範圍，另一方面，義工／運動者卻期望各種性別議題在教育場域中獲得解放。

最後，性別教育並沒有一個統一版本告訴我們性別到底要怎麼教，以至於對

³⁶ Gamson (1998, pp.134-35) 發現比起同性戀關係而言，雙性戀更容易挑戰到異性戀一夫一妻制或是單一伴侶關係，往往觀眾對雙性戀的觀感是非單一伴侶的形式，也就是認定同時會和男生與女生交往的人才不是雙性戀。這樣的假定不僅挑起異性戀觀眾捍衛單一伴侶親密關係，視之爲道德的底線（什麼戀都好，只有單一伴侶關係不能違背），同時也讓「非單一伴侶關係」和「同志」身份有刻板印象的連結。

性別的詮釋也各不相同；有些老師認為兩性平等就是性別平等，另外有些老師認為從小的性別教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本教育。我認為上述兩種想法都可能是孕育性別偽善的溫床，我在花蓮某個國小的田野筆記就紀錄下人本教育老師的偽善及其烏托邦想法的神話：

甲老師就不一樣了，他一直要把問題提到很高的層次，阿球一直要把話題移到具體的同志教育上，他偏偏要講到哲學以及有說等於沒說的愛情本質上，但是心中的恐同明明就在隱隱作祟，尤其他在同志教育上故意打高空不去正面說同性戀這件事令人不舒服。不斷的說只要教育小孩**尊重及認識愛情的本質**就可以，好像同志的問題就不會存在了！（20091203 田野筆記，粗體為我所加）

上述的甲老師論述其實在校園演講中非常的常見，在概念上打高空的老師被「尊重」兩個字緊緊的拴住，卻往往不知道尊重何物、為甚麼要尊重、如何尊重、甚至是尊重背後的意義。以同志教育為例，當更深一層的講到同志的情感、情慾與各種污名的負面情緒等，可能就會踩到類似甲老師這樣的老師的底線，老師對同志議題恐懼的轉化機制頓時會出現：同志的問題根本不是問題，問題是在教育學生如何學會尊重與認識愛情。為甚麼這樣的論述會對同志教育產生危險？因為他的邏輯是這樣的：

這個社會是由異性戀所組成



學生的心智還不需要知道同志是怎麼一回事，尤其是關於細節



教師所要教育學生的只要「尊重」與「愛」的真諦



這樣未來才能去同理「那些成為同志的人」，因為「他們」跟我們其實一樣



所以目前國中小甚至高中階段都沒有上同志教育的必要

這種邏輯的危險就在於同志議題似乎在求學的階段是一個不重要的議題，反正成年人總會認為學生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的認同、情慾、想要什麼東西，根本來

說就是認為學生還沒定型，還沒有區辨是非的能力，還在過渡期和叛逆期。在這樣的想法下，同志學生又如何在校園憑著「尊重」與「愛」充權自己呢？當身邊的異性戀同學開始「正當性」的探索情慾與認同的同時，同志學生擁有相同探索情慾與認同的資訊、資源又在哪裡呢？當我們不去認識目前同志被壓迫的各種面向以及同志的情慾時，卻把最基本的認識同志問題直接昇華成口號式的尊重教育，不正是本末倒置的作法嗎？我認為只有在校園中聽到同志、看見同志與談論同志才有可能更靠近「尊重」二字。

下一章我將承接第三章的內容，探討在演講的過程，義工主體的省思與矛盾情緒。義工並不是演講完就沒事，還必須面對合作關係與演講所帶來的各種情緒，不管是負面或是正面。最後接續此節所提到的「尊重」，分析性／別和尊重是佳偶還是怨偶。



第四章 運動者的情緒與主體性

教育小組作為一種運動組織，不只對外的啓蒙運動是運動目標，對內的運動者認同運動也是，因此，分析小組義工在演講過程中的情緒是運動過程重要的一環。

情緒一開始並不在社會運動研究的分析上佔有一席之地，尤其資源動員論更是預設社會運動是理性的行動，因此不涉及情緒的探討。後來 Snow and Benford 發現在認知理性與情緒之間有潛在的衝突，當問題描述得太嚴重，則會導致宿命論式的認命；反之，如果問題又問得太專業性與技術性，則公眾是無從參與的。以至於後來社會運動的研究不得不去關注情緒的動員，如果激發情緒是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原因之一，那麼動員者的任務在於改變或者延伸原有的感覺規則，社運組織的維繫也有賴於成員的情感依附（何明修，2005：176-97）。

上述關於社會運動對於「情緒」和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情緒」有些差異。在社會運動的研究中，情緒指涉的對象是以潛在的運動者與參與的運動者居多，分析目的也是回答功能導向的問題——如何動員？教育小組的演講主要目的並不是引發潛在的運動者或是動員集體行動，只在單純地在教室中對學生或老師做認知解放的運動。但情緒為甚麼仍需要拿來討論？不討論情緒可能會有何盲點？我在田野中發現義工們本身就有情緒，而這個情緒可能對組織的維繫是有影響的。情緒不只是一開始集體動員的一種力量或手段，更是維繫團員與團員關係、團員與組織關係的要素。社會運動者並不是動員之後就可以有力量地去「做運動」，在做運動時，還會有許多情緒或是脾氣，而這都會去影響到運動者是否想繼續留在組織，會質疑自己的行動是否有所意義。當知道義工們的情緒是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所誘發時，更引起我對於運動中各種情緒的好奇，而這也是在社會運動中比較少描寫的，例如運動者在運動中受挫、矛盾與競爭的情緒。

本章將討論義工彼此合作時所產生的各種緊張關係。首先義工可能會遭遇到為難的處境以及資深義工媳婦熬成婆的心態，再者，除了上一章描述到說故事必須考慮到外部條件外，這裡我指出義工本身條件上的差異與義工彼此之間的關係，將會使得義工擔心說不好故事而產生複雜情緒。最後，我將討論義工在無止盡的演講場次中不斷地訴說自身的生命故事下，所產生的疲憊、抽離與無力感，而沒有動力繼續販賣自己的廉價故事；同時對「運動」產生的微小效果，義工的

灰心感也會由然而生，這些因素都會成為同志教育運動所將面臨的一大挑戰。尊重多元性別的教育在不斷去性化與符應主流的期待下蓬勃發展，但同志義工的主體性卻漸漸地消失不見。

第一節 同志何苦為難同志？

義工間常常在演講合作關係中產生各種權力互動與複雜的情緒。我觀察到跨性別義工在進行現身演講時，凸顯了自身性別的兩難窘境，例如男跨女的跨性別義工必須低調地帶過嚮往異性戀女性刻板形象的話語，甚至本身這些再製異性戀性別的言論就該消音。另外，伴隨義工講師制度的介入，使得演講變成一種競爭的遊戲，最後使資深義工形成媳婦熬成婆的心態，進而對於新進義工有所指責與糾正。

(一) 跨性別義工的處境

教育小組除了說自己的故事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學會如何跟其他 LGBT 的成員相處，並把其他屬性成員的經驗說出去。2010 年 5 月 4 日教育小組開會的主題是跨性別，特別邀請旭寬（女跨男）分享自己一天生活會遭遇的困境，像是上學、上廁所、去郵局等等情況所受到的性別質疑。小莫也分享拍新身份證的困擾，他並拿出身份證給大家看當時攝影師幫他弄的油頭髮型，也因為身份證照把長髮藏起來，導致日後到公家機關辦事用到身份證時，總是會被懷疑照片和本人是不是同一個人。Winter 也分享看醫生的窘境，之前留著長髮的他在候診室等著進去看醫師，結果護士叫 X 先生的時候，他走過去說我是 X 先生，護士不斷的詢問：「你真的是 X 先生嗎？」連醫師也不斷地確認 Winter 的性別為何。阿球在開會的時候也反省到去學校演講的心態，他認為自己用乖寶寶的形像進到校園演講時是一種必要的手段，因為可以避免直接引發對立、衝突的情緒，畢竟跨性別義工直接帶給現場老師與學生的衝擊仍是非常大的。而這也是跨性別者和男女同性戀者義工現身的差異，男／女同性戀義工很少在外表上作完全的、刻板印象的異性打扮。

跨性別者的這場討論使我明瞭「現身」的強大震撼力量。當時主講者旭寬是一位女跨男的跨性別者，從演講一開始我就不斷地猜想旭寬原本的生理性別到底是男是女，當從他的生命經驗得知原本是生理女性的時候，我掩藏不住驚訝的表

情，事後我感到無地自容：「我怎麼會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及看到珍奇異獸的想法！？這不應該是一個演講同志議題的義工應該表現的態度！」和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的義工一起工作的過程，我漸漸增加對不同性身份族群的敏感度，卻也看到雙性戀與跨性別義工在教育小組的發聲與反擊。

有時候在教育現場，當跨性別義工說出真實的生命故事與感受時，可能受到其他同志義工的質疑，但同時，其他的同志義工也正在接受跨性別義工真實生命故事與教育現場策略的兩難。在寧靜技術學院對大一生的演講場次，爭執就發生在演講後邊吃午餐邊檢討的義大利麵店裡，女同性戀義工小米認為 Zoe 的真實感受會強化女性與「被照顧」的連結，所以希望 Zoe 在未來可以盡量不要強調自己因為想要被照顧而想要變女生，造成單一因果解釋的危險：

小米：最後你有一個地方讓我心驚肉跳的，就是你說你想要被照顧，所以你就想變性，然後我當下想說毀了，我想說這不就是一種刻板印象的連結嗎？你理解我的意思嗎？你那種想法就變成說好像女性都要被照顧，被照顧的都是女性，這種想法就是加深刻版印象的連結，這其實是危險的事情。雖然可能你當初是這樣想，可是今天我們在教育現場的時候，你可能要試圖用某種修飾去講。

Zoe：我覺得就算是的話，可能場合也不太能講。

小米：應該不是這樣，應該是說就算想要被照顧的男生有很多，可是不一定每個人都會選擇像你這樣的方法，這就是我後來提的問題引導的方式，你一定有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促使你跨性，然後你是要強調那個東西，而不是強調你想要被照顧。

研究者：可是 Zoe 這樣的說法在三峽也是有發生，那時候他也說他想要被照顧，他說他想要當個溫柔的小女生，因為在男生旁邊就是一個小女人這樣，然後阿球就是跟小米一樣，就是覺得說以目的性的話，他可能還要再修飾一下，我那時候覺得說，如果你剛剛這些話都講在檯面上的話，我覺得可能不會造成去掩蓋他內心真正的想法，而且又能夠讓同學說，女性不理性不好嗎？不理性這件事有不好嗎？而不去否定 Zoe 的慾望。

小米：你現在是說我否定他的慾望？

研究者：以目的性來說，你叫他不要講出…。

小米：我不是叫他說自己想要被照顧，這可以說，只是要怎麼強調說並不是想要被照顧，所以才想變成女生，而是說我想被照顧，但是我有其它的東西促使我想要變性，是一種女性的形像在呼喚我，不只是想要被照顧而已。

研究者：這就是問題所在，因為 Zoe 在三峽那一場是想要被照顧而想要當女生，所以才會變得很慌，如果這樣子的話，那我們怎麼顧及他的情感跟演講的目的？

Zoe：我不可否認那是動機之一，我覺得那會很直接連接到，事實上就是大部分男生照顧女生，那很正常，在那個時候我會這樣想其實也很正常。

不可否認的，教育小組演講的目的是要讓台下的異性戀學生、教師與父母認識同志、理解同志並尊重同志，但教育小組在現場所受到的限制也正是台下的異性戀學生、教師與父母。義工們必須在一個框框下呈現同志的樣貌，否則將會造成反效果，不然就是成爲拒絕往來戶，再也進不了同一個學校演講。當嗅到 Zoe 那聽起來可能造成女性是被動者的說詞時，義工們（包括我）都很自然而然的響起警報，卻也忽略了 Zoe 的真實感受，而產生了同志爲難同志的局面。

Winter 和 Zoe 是我在教育小組比較熟悉的跨性別義工，不管在演講後的討論或是小組開會後的閒聊，不時會感受到他們對於自己性/性別的位置在小組有著抵抗及無奈的感受。在慎思高職的演講事後檢討，我聽見 Winter 無意地說出在教育小組裡的一些感受：「你也知道對我這種不太像人類的生物，大家只會把我當成一個…就是這樣，沒有什麼性別的感覺，所以沒差。」Winter 是一個皮膚白皙、輪廓清秀的跨性別義工，我第一次見到 Winter 的時候，還以爲他是生理女性。Winter 本身性別界線相當模糊，也沒有設限自己是男或女，所以一直給小組的人一種中性、無性別的感覺，他甚至覺得義工並不會對他的外在形象有任何的性慾。

因爲論文研究的關係，Zoe 接受我訪談的要求，在訪談之前，我和他從熱線辦公室走到對面的麥當勞，這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和 Zoe 走在一起，一進麥當勞我馬上被恐懼及害怕的感覺掩沒，因爲我知道當場的每一個陌生人不是一副不可置信的眼神，不然就是皺著眉頭地看著我們，而店員也難以克制驚嚇情緒不斷用手肘碰旁邊另一個店員，暗示他所看到的「怪胎」二人組。在訪談的過程中，我才知道原來 Zoe 對於能成爲一個「合格」的跨性別者有著無限的感慨與憧憬，尤其

當他無奈地比較自己和另一位義工小莫的外表：

Zoe：之前去桃園縣莊敬高中，那次是小莫主講，講到跨性別的時候有找我上台，那天小莫盛裝打扮，那其實小莫自己也以一個跨性別外表出現，拿我來跟他對比，他有提到說他比我幸運，我外表比較 man 就對了！他扮成女生不講話，看起來就還是個女生的樣子，不會像我都曾被指指點點，我會覺得他講的是事實沒錯，但是我聽到還是會蠻難過的。

對於像Winter和小莫在外型上幾乎是100分跨性樣的同志樣貌，雖然Zoe不是「可男可女」而是「不男不女」，但他卻更勇敢的面對自己位置的侷限，並轉換成演講的動力，以打破社會的刻板印象。Winter和Zoe雖然都有跨性別的認同，但兩人在演講上所產生的效果卻是大不相同，在一次演講完的私下檢討，阿球講到Winter是大家比較能想像且願意接受的跨性別樣貌，但男性面孔與體幹的Zoe搭上極度衝突的女性服裝，可能產生的效果就和Winter不一樣：

Zoe：還有一次，寧靜技術學院講完的時候，那時候討論，阿球有提到說，以跨性別現身的話，像 Winter 去的話大家比較能接受，喔！這是跨性別，Winter 是可男可女，那可以接受他，那我就是不男不女。

研究者：你有說什麼嗎？

Zoe：…（低頭沉默），奕璇在旁邊知道我聽到這個會不太舒服，她有給我安慰，擁抱一下。也是因為這樣，我才會思考說我是要更努力讓自己更像女生，還是說反正我就是這樣，就依我自己的身體為武器來打破社會的刻板印象，這兩股力量也會在我心裡拉扯，不知道該選哪一個。如果可以的話，我當然會努力讓自己變成一個正妹，但是這很難，而且這需要錢及各種資源。

Zoe 或許沒想到自己衝突的跨性別形象也可以當作打破社會對跨性別刻板印象的武器，但無奈的是，他仍在乎自己的外貌並不像 Winter 那樣漂亮。所以作為一個演講效果，Zoe 要去面對眾人對他的外貌的批評，承認自己不好看、外表不能討好主流審美標準的跨性別之後，他才能去矯正主流社會印在他身上的各種污名與歧視。對於 Zoe 而言，這是一個極不願意面對的真相。Zoe 的例子帶出的是跨性別運動者在運動中的矛盾情感：所欲打破的主流審美標準（或是性別刻板印象）正是自身所期望的。在日常生活中複製女性形象的憧憬，與運動中對抗女性刻板形象的訴求下，Zoe 仍掙扎於此兩個選項當中，當每一次用自己的外表

與身體去衝撞性別刻板印象時，心中不免小小期待著「當有一天我也能成為美麗的女人時…」的美夢成真。

（二）媳婦熬成婆：從義工變講師

上一章提到妖妖和金金在公誠國中發生的爭執事件，讓妖妖反省自己在態度上是否過於強勢與無理。他回想到一開始資深義工也對他演講的內容與方式，有給予批評與建議，所以當他現在面對新的義工，看見彷彿過去曾經犯過的過錯，忍不住地也要求新義工不該犯以前他所犯的錯：

我覺得對金金來講，我有一種媳婦熬成婆，然後再去虐待媳婦的感覺，為什麼呢？我要解釋，他根本就是以前的我，就是那種絕對的政治正確，或是教條式的東西，可是我被要求不能做那些事，所以對新義工，我又把那些曾經對我的要求也這樣子要求。我不知道這是一種組織文化，還是我真的知道金金這樣說不會比較好？

這件爭執讓金金開始不信任妖妖，也使得金金在之後開始減少和妖妖的合作，避免在教室裡面上演互搶麥克風的情況。這種媳婦熬成婆的心理在教育小組的互動中並不大明顯，畢竟所有義工之間並沒有確切的權力或階層關係，所以也不會有明顯的支配／從屬的結構產生。

不過我觀察到，教育小組的講師制度卻隱約地形成一股看不見的競爭關係。講師制度是在教育小組成立之後，隨著演講量每一年以倍數成長的速率而產生的，當演講場次增加，不同性質的演講場次也跟著增多，只是單純的演講 LGBT 或是說故事已不足以應付有愛滋議題、同志文化或是親密關係議題的演講場次。當資深義工所學到的知識與演講技巧足以「一個人」單獨出去講完一個場次，經過熱線的工作人員認可後，此為資深的義工就有講師的資格。雖然講師仍是屬於義工，但講師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從個人演講的場次拿走一半的鐘點費用。

為甚麼義工能不能一個人去演講很重要呢？工作人員智偉就提到當初自己是教育小組的領導人時，會觀察前一年有哪些學校有邀請熱線，為甚麼今年卻不找，如果學校一樣是談同志，為甚麼學校今年不找熱線談同志。對教育小組來說這是很現實的狀況：能不能再回去同一間學校演講是很重要的「業績」指標。智偉描述邀請熱線的老師會釋放出對演講的義工不滿意的訊息，有些老師會在電話

跟他說：「這個講師好像比較不會帶氣氛耶！演講過程裡面老師們的注意力就覺得不是很高。」面對老師這樣的反應，智偉也直接地跟我說：「本來演講就是很現實的，你講的好，隔年大家就會找你，因為對於主辦的老師來講，他當然不想找一個會讓大家睡覺，無聊的演講。」所以能撐起一場演講的義工自然必須給予講師的資格，因為他比其他義工有更多的能力，更能順利完成教育小組的工作。

和以生命故事分享為主軸的入班演講不一樣的是，講師更要具備更多的演講能力，包括論述的能力，自我揭露的能力，分析事情的能力跟帶動現場團體動力的能力都是要考量的。對於義工來說，教育小組所從事的活動不再只是公共服務或是單純的社會運動，講師制度讓義工間有了區隔，也讓演講成爲一個自我修煉的修行或是遊戲競賽，每個義工都在累積自己的經驗值，以期望達到講師的能力。

並不是每個講師或是舊義工在演講的過程會爲難新義工，我想指出的是，部份經驗豐富的義工（甚至包括我）的確在熟悉教育小組的論述模式後，面對新義工可能「爆雷」的不恰當言論或是未經訓練的演講內容時，在事後的檢討會以疑問的姿態詢問義工當時演講「不好」的狀態，並提出以往在演講學到的經驗與教訓，讓新義工下次可以不要「重蹈覆轍」，避免損害到熱線與學校的合作關係。但這種「接種疫苗」「打預防針」的現象卻可能造成不斷地複製出單一的同志教育內容。每個新進義工幾乎要在教育小組重新社會化之後，從資深義工的糾正中，學到如何拿捏演講現場應該與不應該講的內容尺度，判斷出什麼是危險的內容，之後盡量不要碰危險的內容，最後義工從中必須默會致知（tacit knowledge）現場演講的尺度，培養出一種說不出卻瞭解規則的感覺，來演講個人的生命故事與回應台下老師學生的問題。

第二節 「專業」同志形象的兩難

什麼是「專業」同志？專業同志是我在熱線教育小組時常聽到的一個玩笑話，熱線的義工在日常生活中還有另外的身份，大多數都是大學生或研究生，因爲白天才有時間到學校演講，而專業同志所指涉的就是有心理、輔導、社工與社會背景的義工。擁有這些學歷背景的義工時常被認爲在學校演講比較吃香，老師比較願意買這些義工的單，簡單來說，這些義工因爲專業知識背景的認證，說話較具有說服力。另一種相同邏輯的專業同志是：比起男同性戀義工，女同性戀義工演講女同性戀議題來得最爲恰當，這又稱作「專業的男/女同性戀」義工。

同時，我也觀察到第三種隱晦的專業同志形象：悲慘的同志故事。有些義工在聽過許多義工悲慘的故事，時常會有出現一個矛盾的心理是「我是同志，但是我沒有故事」，這些義工認為悲慘的、生活不順遂的同志生命故事才是較符合演講現場的同志故事。

（一）學歷的象徵資本

學歷對於在教師場的演講往往是同志義工的助力。學歷在這裡我分為兩種，第一種以校作為區分，例如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等大學志願排名前面的名校。第二種以專業領域區分，例如社工系、心理系、心理輔導學系、教育學系、性別所等和教育與性別較為親近的系所。

在花蓮的嚴正高工有一場父母場的同志講座，因為制度上的誘因，來聽講座的父母，小孩可以記嘉獎。安排演講的主辦老師，把同志教育偷渡到原本設定的青少年情感教育，所以宣傳海報標題寫的是「青少年的情感世界」，然而實際上，家長並不知道今天主題是同志議題。演講開始前幾分鐘，主辦老師希望我們能夠先講出自己的學歷，讓父母可以先知道在場的同志義工都是就讀名校的高材生，用高學歷的象徵符碼沖淡父母們突然面對一群同志的不確定性，在場的義工剛好就是就讀台大的 Ling、政大的妖妖、台大的我以及政大的阿球。在教師演講場次，金金也把學歷當成演講必備的工具，尤其碰到頑固不化的教師時，能引起老師注意力的就是高學歷的身份背景：「像我上次去教師研習的時候，教師最重升學了！所以一定要講（學歷）阿！這不講，放過這機會怎麼可以，一定要講。」升學主義雖然在結構上限制了性別與同志議題課程的進入，卻也非預期地帶給演講現場正面的效果，對於只重視升學不看重性別的老師，也同樣因為高學歷同志義工的現身，而不得不重新重視性別。

在學生場，義工的學歷是讓學生能專心聆聽的好用工具，通常老師要求義工說出學歷，一方面無非是想讓學生知道有優秀的、會唸書的同志，另一方面也可以帶入好好唸書的價值觀。台大畢業的香菇就遇到一場剛考完國中基測的班級：

香菇：我有一場，他那一場是給國三考完基測的班級聽的，可是也是就是自由參加，不過也有班級報名，所以人數其實還蠻多的。那個輔導老師跟我們講說，來聽演講的有些是前段班的，然後就還蠻自以為是，有點像是要求我們在演講開始自我介紹的時候，就是講大家的學歷嚇嚇他們。

研究者：那時候有誰？

香菇：那時候有阿仁、Zoe、阿桃，阿仁跟阿桃在桃園唸的高中都是很前志願，然後 Zoe 是建中的，而且他們都還是在學生，然後其實像我已經畢業了，我演講的時候通常沒提學歷，那一場我就有講，那些學生就會：哇！阿仁後面也有作結論說同志也可以唸好書、上好學校之類，雖然他有帶有一點點唸書的價值觀啦！

另外一位畢業於政大資訊管理系的男同性戀義工小小海，也同樣因自身學歷在一場高職資訊科的場次有正面效果。在自我介紹的時候提到自己就讀政治大學資管系，台下的同學會覺得和同志義工是同一個專業領域的人，而且是政大的，對於國高中生可能追求明星學校的心態來講，其實是有一點模範效果的。

但台大生命科學系畢業的小魚則不認為高學歷的頭銜有在演講上帶給他實際的幫助，相反地，老師往往一聽到他是生命科學系畢業，會先質疑小魚在性別、輔導領域的論述正當性。小魚提到當時因為不是相關科系畢業被老師否定，而在演講上受到心理挫折的經驗：

小魚：其實我進入教育小組我覺得一直有個很卡的地方是我的學歷背景。我的學歷背景畢竟是理學院、生科院，那畢竟我本來就不是走輔導、社工或心理相關這方面，也是在那一場發生老師我們私下聊天就在問說我是哪個學校畢業、什麼科系的，他一聽到我講生科就轉頭走了，本來前面還聊了很久，在談一些跟學生互動、怎麼跟同事的孩子互動，他一聽到我是生科系臉都變了，就找其他義工去講話。

研究者：你覺得他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反應？

小魚：我覺得說我只不過是個同志，但並不是個專業的同志，所以我沒有辦法去解釋清楚，或是去解析跟輔導的東西。

研究者：專業的同志是什麼？

小魚：可能對於很多老師來講，他還是有某種專業背景，所以比如說他就是希望你是相關科系畢業的，或是相關證照之類的，若說你是單純談同志生命故事，可能對你的興趣沒有這麼大，或是牽扯到實務工作上的東西。

在演講現場，義工對於學歷背景的使用可以說是相當敏感。當學歷遇上同志，一方面可能造成同志都很優秀的假象，另一方面更讓不優秀的同志無地自容。金金說到在莊敬高中某一場演講，主講人讓義工自我介紹時，當下感覺到現場儼然像是一場大學博覽會。Ling 也同樣不喜歡在演講現場講出自己的學歷，除非應老師需求，不然學歷這個變因可能會加深老師或父母對同志議題的負面觀點——「當同志已經很慘，不會唸書或不優秀的同志更慘」：

我不喜歡講（學歷）耶！因為我覺得台大…就像是…因為你如果拿一個太顯眼的東西的話，他們就只會注意這一點，或是他們會有一些裡所當然的想法，像是同志都很優秀這樣的聯想。或者是他們會覺得說你那麼聰明，你當同志當然沒有關係，我家小孩笨的跟豬一樣，他是同志這樣怎麼辦。我就有聽到類似「你們都長那麼大啦！很聰明阿！都想得很清楚阿！可是有沒有想過別的小孩，看到你們這樣就會學壞」之類的，他覺得那根本就是另外一個世界，比如說他會覺得又不是到處都是台大生。

學歷也會造成義工和義工之間矛盾的情緒。我有一場和 Winter 到桃園某國中對全校老師的演講，在演講還沒開始前，和輔導老師一起在教室吃午飯，在聊天的過程中，Winter 敏銳地觀察到其中一位老師的眼神一直注視著我，讓他感到不自在。演講後回程的途中，Winter 和我分享剛剛與老師們的互動狀況，他很直接地說，因為老師知道我是台大社會所的學生，所以比較想和我聊天或聽取我的意見，而他就被晾在一旁。不過，Winter 在演講現場過程中有意識地把同志和學歷背景的議題拿出來討論，他以我為例提醒老師，並不是所有同志都有好的學歷，但也並不表示他就是一個糟糕或是不能得到他人尊重的同志。不管是在演講現場、組內討論或是訪談的過程中，Winter 對於學歷的議題相當敏感，他常會自嘲自己沒有說出來會嚇到老師和學生的學歷背景，但自己所要對抗的也正是那跨越不過的界線，不管是年齡與學歷，他想讓聽眾知道像他這樣的「平凡」的同志也是同志，他也有他的生命故事：

面對老師跟家長就有一個階級在，老師會把我們當小孩子，家長會把我們當成小孩子，就是我想要跨過的東西對我來講其實眾生應該是平等的，可是他們就會把我們設一個階級在，因為我沒有一個很好的頭銜，我只是一個義工，我不是什麼諮商背景或社工背景，我什麼都沒有，只是學設計，八竿子打不著。

現實地，如同 Polletta (2005: 84) 認為說故事的可信度高不單純是因為口才好，而是會受到說故事者社會地位的影響。在審議民主當中，弱勢團體 (disadvantaged group) 說故事的形式有兩面刃：個人的故事可以帶來不同的觀點，但其社會地位所帶來的特殊經驗卻可能不符合普遍規範性的原則。所以 Polletta 認為在分析上，說故事者修辭的能力並不比其社會地位與論述形式來得重要。對於教育小組而言，學歷背景的高低有形地在演講場合中當作一種策略使用，卻無形地在義工彼此間造成不可言喻的劃界工作。有的義工會說出自己的學歷，有的義工不願意說出自己的學歷，義工如何使用自己的學歷身份不只是單純的滿足演講工具性的效果，同時義工也在抗拒著學歷的使用，以捍衛自己也是一個獨特的同志生命經驗。

(二) 專業的女/男同志

和學歷同樣邏輯的專業同志形象還有「專業的女同志」及「專業的男同志」。在教育小組，男同志義工的人數多於女同志義工，很容易一場演講都是男同志義工，沒有女同志義工在場，所以當有一位女同志義工在的演講，男同志義工會有意識地把女同志的基本內容與故事交給女同志義工演講。以男同志義工為例，除了擔心女同志義工沒有講到話之外，更擔心自己並非女同志、遑論有女同志經驗，害怕演講到女同志內容時，會講不好或是說錯。我觀察到不管是在組內討論或是演講上，男/女同志義工害怕幫彼此代言的焦慮隨處可見，女同志義工害怕男同志義工簡化 T 就是陽剛，婆就是像一般異性戀女生的解釋；男同志義工害怕女同志義工無法一針見血的解釋「性」的議題，尤其是回應有關肛交的議題。

妖妖對於專業的女同志議題特別有感觸，不管在演講或是開會，妖妖碰到有關女同志的演講內容會自動的交給女同志義工來講。這個行動受到另外一位義工小莫的批評，小莫認為妖妖所謂專業的女同志只是自己躲避女同志內容的藉口，對於這樣的指控，妖妖既生氣又無法認同：

像上次吧！小莫在開進階會議的時候就說，欣潔就講到女同志，我說讓專業的女同志來講，因為我就覺得說，有女同志在為甚麼不讓女同志講？對我來講只是覺得說我不好，到時候（女同志）又生氣又補充，那倒不如就讓他們講。可是那時候小莫說我都在躲避（講女同志的內容），我不是很高興。我就覺得說我是個 gay，旁邊有個拉子，其他聽眾也會覺得為甚麼不是一個拉

子來講，而是你一個 gay 來講，這是我的判斷，有時候好複雜，在很多時間內，我會做很多判斷考量，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讓專業拉子來講，可是我不知道後來這樣會被指責，會被檢討。

當我回問妖妖是否因為覺得自己沒有把握演講好女同志的內容，妖妖卻認為自己不是沒有把握演講得好，反而平常沒有拉子在的時候，自己是可以講女同志的一些內容。他舉了一個例子跟我說明他背後的理由：「比如說我跟美國人一起去一個餐廳吃飯，其他朋友說妖妖你介紹美國怎樣，可是就很怪阿！這裡有一個美國人，為甚麼不是美國人介紹，為甚麼是日本人介紹美國長得什麼樣？我以為我可以介紹美國介紹的很好，可是旁邊就明明坐一個美國人，這個美國人覺得才不是我講的這樣呢！」另外一個義工 Seven，也描述自己是菜鳥義工時類似的情緒：「有一段時間我們教育小組拉子義工比較少，所以我都怕講 LGBT 的 L (lesbian)，我都很害怕，那一段期間我是覺得說很害怕講了會不會得罪（女同志）她們。」

我這裡想要進一步提出專業男女同志背後主要的邏輯——害怕複製與強化同志刻板印象，這個擔心害怕最容易產生在介紹 LGBT 族群的時候。例如，在介紹女同性戀 (lesbian)，對於 T (tomboy) 與婆的角色解釋最為麻煩，教育小組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解釋版本，造成義工們在解釋時充滿了不確定性，害怕過於簡化時反而造成 T 就是扮演男生，婆就是扮演女生的角色詮釋。很有意思地，我在訪談小崔與香菇這對女同性戀伴侶時，提到對女同性戀角色的解釋時，他們也會小心翼翼地處理 T 婆與陽剛陰柔的關係，避免和異性戀男女的性別關係有所掛勾：

小崔：有一場也是不小心，我都沒有注意到，一般我們在講 LGBT 的時候講到女同志 T 的外表是…應該是要用陽剛或陰柔，但我那場好像說打扮比較男生，這樣不行。

研究者：為什麼？

香菇：他們這樣就會落入：那 T 是不是想要變成男生？

小崔：對！我們怕會引導他們去用兩性的思維去想，所以我們盡量的去注重詞彙的客觀性，所以我那一場也是不小心。

對於女同性戀角色的名詞解釋，跨性別義工 Zoe 也有意見，尤其是女同性戀當中的 T 角色，她認為應該要有清楚的定義，像是 T 就是外表陽剛的女生：「像欣潔喜歡講說 T 可以看起來很陽剛，T 可以看起來陰柔，反正欣潔會認為他說自己是 T 就是 T，那我覺得這樣變得不太有說服力，乾脆我也來說我是 T，你也說你是 T (Zoe 指著我)，我覺得要有明確一點的定義，如果這個詞定義不明確的話，沒有意義阿！」要有一個基本對 T 的定義是 Zoe 所堅持的，Zoe 不認為 T 可以陽剛與陰柔是好的解釋，反而讓 T 完全沒有意義。

但另外一位雙性戀義工樂高似乎對 Zoe 這樣的觀點感到懷疑，陽剛與陰柔並不是那麼固定的鑲嵌在 T 和婆的身上：

女同志的部份，T 跟婆的說明，我自己也還沒想到一套比較好講的方式，因為每次在講 T 是什麼、婆是什麼就會覺得自己聽了很奇怪，連我自己講也會覺得很奇怪。例如說婆就像一般的女孩子一樣，這種講法雖然我可能也會這樣講，可是我會覺得這樣講很奇怪，因為什麼叫做一般的女孩子？而且婆本來就是女孩子阿！然後說婆就像一般的女孩子一樣，可能就像長髮有氣質什麼的，我不知道哪裡怪，但是就是覺得怪，或是說 T 是陽剛的女同志，可是也有 T 很娘的阿！

這裡弔詭的地方在於，在演講上，義工對於女同性戀的角色想要有清楚的定義，但在女同性戀社群內部，女同性戀角色並不是陽剛陰柔兩者截然劃分，而是可以曖昧不清或是多元變化。以「女人」為例，異性戀女人和同性戀女人並非同質的共享「女人」這個範疇，西蒙波娃說：「一個女人不是天生是女人，而是成為女人。」但這仍是異性戀女人的觀點，當女人放在女同性戀的範疇就變成 Monique Wittig 所認為的「一個有女性生殖器官的人不一定要成為女人，而是一種非男非女的範疇」，butch 與跨性別就是很好的例子(Wittig, 1992, pp. 12-13)。

Calhoun (1995) 也指出性別的危險在於性別仍以女人定義女同性戀/女同志，以男人定義男同性戀/男同志，產生的結果就變成女同性戀只是有另外一種性慾的女人，男同性戀亦是，但這種性別完全無法看見同性戀/同志。總結來說，義工所害怕的正是 Calhoun 所支持的，Calhoun 並不害怕陽剛和女同性戀的連結，反而認為陽剛的女同性戀更可以鬆動「陽剛」和男性的連結，爭取陽剛氣質的使用權：我是女人，我可以陽剛的去愛另外一個女人，就像異性戀男人一樣，這不只是異性戀男人的特權。但是在演講上，Calhoun 的論述聽在異性戀聽眾的

耳裡可能變成只是一個想成為男人的女人性別錯亂的自白。

除了揮之不去的兩性教育框架之外，收編在性別教育下的同志教育成為只看到異性戀/同性戀性慾差異的性別，卻沒看見「女人」、「男人」範疇被翻轉使用的曖昧關係。Calhoun (1995) 很精闢的指出，女同性戀可以和「男人」範疇裡的成員一樣，使用「男人」這個範疇投射對女人有性慾與愛意，而這是異性戀女人所做不到的。對性別當中「女人」與「男人」範疇的懸擱 (suspend) 是理解同性情慾與跨性別同志重要的起手式。但不幸的是，「異性戀性別」(heterogenders) 對義工的演講卻往往成為絆腳石，無止盡的性別刻板仍糾纏每個同志義工本身，在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同時卻非預期的加深性別刻板印象。或許最後以小崔曾在教師演講遇到的一個困惑為例來說明這個「異性戀」性別刻板對同性情慾所產生的荒謬邏輯。小崔是一個打扮中性的女同性戀，而且目前自我認同是女人，有位老師卻提出質疑，認為既然小崔認同是女人，為何不能用「女人」的外表打扮去愛另外一位女人，而用「男人」的外表去愛另外一位女人，這樣還是同性戀嗎？小崔好不容易跳脫異性戀情感關係時，卻又必須面對性別展演的二元框架，當下小崔並沒有馬上看穿問題背後的異性戀性別邏輯，而無法回應老師的問題。

在本節藉由討論小組內專業的女/男同志現象，我進一步指出背後害怕複製與強化同志刻板印象的心態，在同性戀與異性戀對男人與女人範疇的差異理解下，義工一面想要打破性別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卻又不小心加深性別刻板印象，就像是小崔的例子。

(三) 沒有故事的焦慮

新進的同志義工在演講現場最常有的想法是：我的故事太平順，沒什麼好講的。雖然現身是熱線教育小組在性別教育的賣點，但現身之後的生命故事分享才是主軸，當聽完其他義工的生命故事時，有些義工會對自己的生命故事感到過於平順而不值得一提，也無法吸引台下聽眾的注意力，更不用說可以「感動」到台下的聽眾。對於能否感動台下聽眾甚至博取他們的眼淚，成了義工說故事的無形壓力。跨性別義工 Winter 表示，自己的跨性別認同過程並不像另一位跨性別義工 Zoe 一樣遭受許多的歧視眼光，反而認為自己的生活太平順。當我問到平順的生活故事是演講的阻礙時，他說：「過的太平順的時候，我少掉一些生活上被別

人歧視的不舒服，我少了很多。」一直無法定義自己性別認同與性傾向認同的 Gaia，就對自己「相對」平順的生命感到害怕：

還蠻怕的，就不像大家有那麼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覺得那種東西會吸引下面的人讓他們去思考，因為像我的話，本身故事比較平順，就是因為從小到大有成績當保護傘的關係，不太有人欺負你什麼的，這種故事丟下去，台下只是：「喔！」然後呢？不會讓大家想到熱線想要傳達的霸凌的議題，或是性傾向的議題，在我身上都沒有阿！

尤其對同志霸凌的故事，女同志特別感到無力。許多女同志義工紛紛不約而同的在組內開會時表示，羨慕男同志義工擁有校園霸凌的生命故事，自己卻沒有這樣的經驗遭遇，而無法在演講現場上使用。男同志義工小莫悲慘的校園霸凌故事常常令其他義工聽完後相當震驚，Ling 認為像這樣悲慘的故事就很適合在演講現場發揮：「其實我覺得我的生命故事不太好使用，因為太順利了，像我覺得 Gay 小時候被霸凌就蠻悲慘的，而且我覺得那個悲慘是他不想說出來，像是小莫。」同樣的，小崔和香菇很自然地認為女同志比較難講霸凌的故事，因為根本就很少發生女同志的霸凌事件，所以當遇到需要講霸凌故事的時候，推給男同志講就沒問題：

小崔：我通常會覺得男同志比較適合講霸凌。

香菇：我就沒有說過霸凌的經驗，因為我很難講。

小崔：女同志比較少，女同志比較少身體的霸凌。

香菇：我也是去和平國中跟男同志合作才知道有這麼多霸凌的事件。

小崔：所以我很喜歡找男同志講霸凌，就找你跟小莫講霸凌。

香菇：霸凌我真的沒有辦法講，我也沒有辦法講被歧視的事情。

小崔：我們可能言語上比較有，但是身體上沒有阿！

同志青少年在學校是被霸凌、性騷擾及取笑的對象，所以悲慘的男同志校園霸凌故事一直是討好的演講內容。Eric Rofes (2004) 從美國校園同志教育分析到同志常常被建構成「受難者-箭靶-犧牲者」(Martyr-Target-Victim) 的意象，很

難看到有戀愛、羅曼史 (Romance)、快樂的人、性、健康的同志少年、好的事情、音樂、藝術、有家人和朋友支持的敘事在描述同志。不同於 Rofes 認為同志應該多從正面的方向來教育，在和平國中，Gaia 反而很羨慕同場男志工 Seven 親口說出被霸凌的心聲，在教室所產生的力量：

譬如說我之前去和平國中的時候，Seven 在講他以前被霸凌、被欺負、被嘲笑的事情，我覺得他用一個第一人稱的角度講說：「我恨死那些同學了！我不想去上課！」之類，我覺得你一講出那句話的時候，你對台下的同學震撼力是很強的，或許他們就去想說：「我是不是也做了一樣的事情？我是不是曾經這樣對待過我旁邊的同學？可是我不知道這樣做很傷害他們。」我會覺得從你的口中說出來，力量是不一樣的。

Seven 的故事是這樣的：

我以前國中被叫「死人妖，滾回泰國去」之類的情況，我是怎麼想，十年後，遇到那個叫我的人，然後我跟他在捷運上講過話，然後我的想法是什麼。或者是高中的時候，最後畢業好像辦了一個 issue 說：你覺得全班誰是 gay 這樣子的投票。最後謝師宴那天，我被叫上台的那種感覺是什麼，他們不覺得那是在傷害我，只是個玩笑，可是對我來講，受害的人而言，那不是玩笑，以至於以後我再也不會想看到那些人，以至於說他們講過哪些話，台下同學可能說「你這個死胖子」、「你這個死人妖」、「你這個男人婆」之類的，你們可能覺得只是開玩笑，同學只是默默接受，你們也不會在意，每個人都這樣笑，可是那個被講的同學他會怎麼想，十年後，起碼我都記得這張臉，當時的嘴臉怎麼樣叫我，怎麼樣羞辱我。

Seven 的故事是一個言語霸凌的典範故事。暴力的故事不只是對聽眾產生同情與不捨的情緒，也會影響到同場合作義工的情緒，更嚴重的話，可能使演講氣氛太過於沈重。小小海說在演講現場聽到其他義工悲慘的遭遇時，會感到喘不過氣，因為他很難想像自己過得很快樂的時候，其他同志朋友卻在某個地方繼續受苦。另一個義工樂高覺得和志謙演講的經驗最為深刻，因為志謙當天除了講述學校的肢體暴力之外，也說到在家裏被血淋淋體罰的故事，整個演講氛圍也因為志謙的故事而凝重。樂高在跟我說這一場演講的過程時，對志謙肢體暴力的故事仍然印象深刻：

那次主講是志謙和 Seven，因為志謙的故事很衝突，他講在學校的故事，而且是有肢體暴力的，他會把肢體暴力的部份講出來，言語暴力的部份也講出來，然後他在那一天也講他在家裏出櫃的故事，他講他在出櫃後在家裏被體罰的故事，就那種很血淋淋的故事都講出來，那一天的氣氛就有一度非常的沉重……那是我參加過的場最沈重的，因為我之前參加過的可能會被講到說被歧視的故事，可是沒那麼慘烈，可是他是有到肢體暴力了。而且他的表達方式…因為志謙他非常排斥異性戀，他已經可以到就是同跟異的互相仇視，在他的故事不是只有看到他被人討厭而已，他也很討厭異性戀，完全可以感覺到這個人就是不喜歡異性戀。

當義工的故事太過於暴力、悲劇與可憐時，最後反而形成一種「控訴現場」的氣氛，這種控訴現場的效果就是讓台下聽眾的心理產生極大的罪惡感。並非所有義工都喜歡這樣的效果，雖然對某些情況相當有用³⁷，但當故事的效果太大時，反而造成義工們在之後剩餘的時間內都很難再營造歡樂的氣憤，留下的只是同志義工指責所有教室中異性戀同學的疙瘩。身上承攬著許多霸凌故事的小莫，就回憶道，之前訴說被欺負的悲慘故事時，無法收拾接下來的演講情緒：

我甚至被智偉講過就是控訴現場，會有點像竇兒冤最後一幕她要被斬頭之前，就是在控訴現場，說如果她是清白的話，六月下大雪，大旱三年，血濺七十里，就是類似那種很驚悚的場景，然後可能就會像是新聞的記者會泣訴現場、控訴現場，那個場負面能量的強度可能是強到我無法承受，然後可能現場的人是沒辦法承接那個情緒的。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到故事對於義工所帶來的各種複雜情緒，故事不只是對演講有效果，也讓義工對自己甚至彼此間產生說故事的壓力。新進義工在一開始的演講過程，會感受到自己的故事太平順而不像是同志故事，女同志義工也認為男同志義工的拿手好戲就是霸凌的故事，因為霸凌是大部分女同志比較少擁有的經驗。在演講效果的需求下，負面與悲慘的故事情節的確有很大的力量震撼全場，卻也不自覺得讓義工們對於生命故事的想像開始趨向「受難者」的方向，所以沒有這些經驗的義工則會產生一種「我是同志，但是我沒有故事！」的感受，

³⁷ 通常演講現場當義工一開始問同學聽到同志會連想到什麼時，班上同學會指著特定同學並說出同學的名字，這時候為了保護被指的同學，義工們會使用不同的方式，例如忽略、轉移話題、諷刺指人的同學可能就是同志或是訴說自己以前在學校受到的言語霸凌就跟現場指人的狀況一樣，讓同學藉由自身被取笑及被欺負的經驗，能夠理解被取笑的同學心裡難受的情緒。

而下意識地認為自己的故事在和其他義工比較之下不值得一提；擁有霸凌經驗的義工反而怕故事的效果太強烈，形成控訴現場的氛圍，讓作為聽眾的現場同學背負著無形的罪惡感。

第三節 演講的不安全感與無力感

在我訪談的過程中，時常聽到資深的義工（大約演講一年以上或是密集參與演講）向我傾訴對於演講的各種情緒，尤其是對演講效果的質疑與無力感。探討說故事當事者的情緒是重要的。在說故事前，對聽眾性別組成的不安與性別刻板的預設，讓義工在演講時會出現防衛機制以保護自己；在說故事後，隨著不斷重複講述同樣的生命故事所帶來疲乏感，義工開始和自己的生命故事脫勾，變得愈來愈不認識自己的生命經驗。

首先，義工對於每個學校的現場「磁場」相當的敏感，一些義工會不由自主地恐懼一群全部是男性的環境，像是男校或是男生班。像是女同性戀義工 Ling，就對於一群男生的環境相當有意見，總會覺得這群男生產生的氛圍讓她不舒服，而趨向選擇女性較多的演講場次：

我比較討厭到比較男生多的地方，我討厭男生，會不由自主地，如果是一個男生還好，但是我覺得一群男性的感覺很不舒服，一群男性的力量很厲害，即使那群男性裡面有比較好的，或是態度比較友善的，我還是覺得他們看女生的眼光都讓我覺得很不舒服，特別是一群的時候。如果是一群男生的話，他們提問題的動機就很不純正。

回想到自己因為陰柔的外表與行為在小學被男同學霸凌的慘痛經驗，男同志義工小莫到現在仍無法克服面對一群男生的恐懼，他描述到成功高中演講的經驗就曾出現過防衛機制：

小莫：我很怕那種很陽剛的環境，因為從小因為性別氣質被霸凌的關係，我很討厭過於陽剛的環境。因為我真的覺得全男生的環境真的好恐怖喔！

研究者：你有真的遇過整班男生真的很不友善嗎？

小莫：倒是沒有。因為學生還是不敢太放肆，可是你自己心裡還是會怕，甚

至我在成功高中，我記得那一次有欣潔、inmind 還有我，然後那是高一高二的資優班，我也是直接在台上講過就是我想把你們這些異性戀的頭一個個扭斷，那一陣子我很愛講這句話。

研究者：這是什麼情況講出來的？

小莫：就是講到說自己性別氣質的打扮，有時候可能走過去的時候，不講話可能不會被發現是男生，但有時候被發現時，他們可能就會竊竊私語講說我很娘、死 gay 炮什麼的，我那個當下會知道說我只有一個人，可是心裡想的是：「幹！要不是我只有一個人，我就把你們的頭全部扭斷。」欣潔那時候就跳出來說：「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不會讓他去扭斷你們的脖子。」

在教育小組演講的學校名單中，最有名的就是篤行工商與慎思高職，這兩間學校的純男生、理工科及高職環境的意象，讓義工們自我設限了演講的困難度。但有時同志義工們卻過度「污名化」這些學校的男學生，Seven 說自己第一次在篤行工商的演講，也曾預設過可怕的演講氛圍，但並不是所有的班級都是如此，也讓他開始反省演講事前的偏見預設：

早期的時候我有給我自己一些框架，我覺得會給我自己框架說其他學校學生會不會怎麼樣，都會先預設立場，比方說高職生都很亂、很煩、吵得我沒辦法講這樣，諸如此類，我都是給自己預設一個框架，那後來實際去講完才知道發現不是這樣子。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去講篤行工商，汽修科三年級，因為他們是畢業班了，那種高職生畢業最浮躁嘛！全班全男生、汽修科，一聽就知道是一個純異男，純死異男的班級，然後還早上八點的課，那時候就非常非常擔心，而且就我一個人撐完演講，我就很擔心會不會怎麼樣，可是後來講完之後才知道，事實不是我想像中的那樣子，其實他們比我想像中的狀況還要聚精會神……那次我覺得他們幫我上了一課，我過度污名化那些異性戀男生。

有趣地，Seven 反而認為自己污名化異性戀男生，把他們野獸化，好像不可理喻一般，雖然如此，義工們對於陽剛氣質的預設仍無法完全鬆懈。不過有時候，男同志義工們也會自嘲著「陽剛氣質」重的學校才有吸引力，這樣反轉厭惡陽剛氣質變成欣賞陽剛氣質的說法，也讓男同志義工們稍微地化減掉面對全部是男生的恐懼感。演講中，失控是義工最極端的情緒反應，當現場聽眾對同志的理解程

度太低時，義工的理智線就會斷裂，所有不耐煩的情緒都會宣洩出來。下面是演講經驗豐富的小莫生動地跟我描述在莊敬高中失去理智的情形：

小莫：我失控的樣子會立刻讓人感覺到張牙舞爪的那一面，你沒有辦法挽回，甚至有一次在莊敬高中的時候，一整天的課吧！到了最後一個班的時候，那個已經是到了最後我們已經有點在迷茫的狀態，有講了兩節課快講完了，結果台下一個男生居然還講出說他覺得同志很噁心。

研究者：然後你…

小莫：(忍不住的笑)然後我那一天穿著短裙，穿著儀隊的衣服，畫著濃妝，我就從台前衝到他面前吼：「老娘講了兩個小時，你居然還給我講同志很噁心！」(拔高音)那天阿球也在，而且那一天是要拍同志募款晚會的影片，我們從早上六點多，阿球在熊阿豪家起床，拍熊阿豪起床上火車，我們在那裡晃，就是睡覺的睡覺，看報紙的看報紙，化妝的化妝，後來我們就從素顏，從女明星不想要被拍到進去莊敬高中，我們整套都已經弄好，然後已經可以進去莊敬高中光鮮亮麗的演講，一路到下午，已經快結束，結果最後我竟然就衝過去大叫「老娘講了兩個小時的課，你還跟我說很噁心」，現場當天還有中央酷兒的人，阿球就傻在那裡，全班同學處於崩潰的狀態，那個男同學我就這樣瞪著他(兩眼發狠的瞪著我)，完全講不出任何一句話，然後不知道是秀英老師還是誰叫我回台上，我想到不行！我在演講，我就回到講台上，然後邊走邊回頭講：「你最好給我一個合理的藉口！」(笑)後來有接近十分鐘的時間那個現場尷尬點就是漫畫裡面那種，現場燈都暗了，只看到兩個 spotlight 照在這兩個人身上。

不過失控的場合不太常發生，反而是無力感才是資深義工最大的情緒。對一場場無限迴圈的演講，有些資深義工開始懷疑自己的故事好像不是自己的，在極度壓縮、高頻率的跟陌生人說自己的生命故事，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和自己的故事異化，義工不再能自由地說故事，說故事是一個工作，一個抽離的工作。Ling 一直不斷地向我傾訴她對於自己故事的抽離感：「有時候我會覺得故事愈說是不是就變成一個我們『想像』中的故事」「你變得太瞭解故事，然後故事變得很廉價的感覺」「有些故事變得不太想說」。這個和自己故事異化的情緒，也讓 Ling 對未來的演講工作感到力不從心：

Ling：我最近不太想演講。就覺得有點煩、有點倦怠，就會覺得我何必呢？就是覺得為了乞求你們這些異性戀改善你們一點點的態度，我就要這樣辛辛苦苦還要販賣我的故事，我就覺得很煩。就我現在每講一次就會加深一次這種心情。其實我有點開始理解阿球之前不是有說會開始覺得自己的故事是真的還假的，然後好像在廉價販賣它的感覺，然後它就變得很遙遠，就像斷裂一樣。

研究者：那你有想要改善嗎？

Ling：轉換跑道吧！就讓別人說故事。你來做解釋，或是不要大量地袒露自己。我覺得一直重複的講真的會疲憊，會煩，比如說像入班演講的時候超煩的，一直講一樣的故事，然後他們的反應都差不多啊！他們還是跟前一年反應差不多，就無法再繼續接受這種沒有希望的感覺。不過我最近有一種感覺就是，就我覺得算了啦！你們對同性戀有什麼想法就隨便你們吧！我受不了了，就不想要做任何的事情…明明我又沒有做錯什麼事情，為甚麼我要付出這種代價的感覺，為甚麼我要忙於讓別人不要再歧視我？就覺得很煩，開始有這種憤世嫉俗的想法。

有這樣想法的義工不只有 Ling。對照於每年教育小組演講場次的統計數據，小莫無奈地說著逐年增高的演講量並沒有對暴力的性別二元框架有太多的改變，尤其當自己看到同志社群複製異性戀的性別二元框架時，更加對演講感到筋疲力竭：

我覺得最無力的好像是講了那麼久，性別二元的框架都還是那麼的明顯，就會覺得…可以回到剛剛講的莊敬高中的例子，就是跟那個學生衝突的場面，就是老娘已經講了兩個小時，你還在跟我講同性戀很噁心。你整個再放大看就會覺得，在教育小組兩年，兩年的工作報告從兩百多場、三百多場、四百多場，數字不斷攀升的情況下，你還是看到這個社會的性別框架二元還是那麼樣的暴力的時候，你就會有很無奈的感覺。甚至有時候在面對網路 ptt 或是論壇什麼的，看到一些議題的討論，看到連同志都還是那麼的複製異性戀的父系霸權的模式、性別二元的暴力的時候，就是你自己是同志，你還要去分說我是主流的（同志），你是非主流的（同志），然後我看不起你這個非主流的（同志），我覺得無力感是來自這種地方，你講再多場、講再多的東西，你還是處在（性別二元）暴力之下。

上面講到 Ling 認為自己陷入在理性的說故事策略中，反而讓自己的生命故事失真；小莫認為不管是面對老師同學還是同志社群內部，還是無法軟化僵固的性別二元框架，兩者最後必須再一次面對教室中同樣重複的各種歧視同志訕笑與言語時，無力感油然而生。

演講的人力可補充，但演講動力的維持卻是一個大問題。所謂演講人力的補充指的是新血義工的加入，阿球說教育小組的人力每兩年到三年就會有一次大換血，原因是義工個人的生命歷程有所轉換而無法繼續參與教育小組的演講工作，同時每一年都會有新的義工加入教育小組，教育小組就在這樣人力進出的循環中得以應付逐年增加的演講場次量。

但義工演講的動力卻有自我停損點，女義工 Ling 是典型的例子。當義工最後發現教育小組的同志教育運動效果仍有限時，便不再有動力大量參與演講，也不用再繼續和異性戀性別二元論述繼續纏鬥³⁸。

最後，我所欲闡述的是，以說故事為策略的校園同志運動與同志教育行動，雖然因為說故事而讓異性戀聽眾有機會理解同志，但實作的過程中，義工在一波波演講的挫折與複雜情緒下，開始意識到自身的故事被極度壓縮與利用，最後說故事說的不是真正的同志生命故事，而是配合演講現場需要的同志生命故事。更諷刺的是，從義工的各種論述策略，反而看到異性戀的性別邏輯實實在在地運作在教師與學生的意識形態中，整個同志教育演講過程改變最大的不是異性戀聽眾，而是同志義工本身³⁹。

第四節 小結：「尊重」與同志主體性的取捨

此章我試著去描述教育小組的義工，也可以說是運動者在行動中產生的各種情緒，包括矛盾的跨性別義工處境，菜鳥與老鳥間隱形的權力關係，學歷的工具性使用或抵抗，害怕自身不是「專業男／女同志」，沒有故事的焦慮，到演講的

³⁸ 此宣稱是根據主觀態度所呈現，並非客觀上可觀察到，Ling 的經驗也僅是個人主觀的感受，並不能代表所有義工，但在分析上，我認為 Linn 的觀感仍有意義，尤其在訪談過程中，Ling 是少數非常清楚且深層的解釋此情緒起伏的義工。

³⁹ 我不是要否定教育小組的校園同志教育行動完全沒有認知解放的成效，有些義工反而清楚的知道一場演講可以改變台下異性戀聽眾的力道是微小的，但就算是微小的改變也仍要去實踐與完成。多數義工曾表示演講完收到學生寫的小紙條，裡面充滿鼓勵加油的話語，就覺得自己還有力量繼續演講下去。

不安全感與無力感。在整個教育或運動過程，看到運動者的情感交織在行動的辯證當中是重要的，透過運動者在行動中引發的情緒，才能更讓人驚訝的知道外部結構也同時影響著運動者的行動，運動者的行動並非真空、去脈絡的在體制中衝撞，他們同時也必然感知到這個讓其進入的外部結構有何限制，衡量優劣情勢再選擇一個折衷的行動。教育小組的義工處在教育與運動交融的場域，義工們不能把運動的性格完全的帶進教育當中，卻又不願在教育中喪失全部的運動性，以至於在內部組織當中開始出現監督彼此演講內容的現象，甚至自身必須監督自己的演講內容，擔心自己沒有故事。

訪談時，我總會問義工：你為甚麼想要參加熱線的教育小組？每個義工都認為教育小組在校園的現身活動可以讓同學「真的」理解與尊重同志朋友。整個田野我所觀察到最奇怪的一個現象就是，雖然義工們時時提醒自己不要只有口號上要求學生學會尊重，但大家仍把尊重當作同志教育的目標，同時也非預期地排擠到性/別⁴⁰的議題，導致最後傳達尊重的重要性大於性/別議題，兩者不是互相結合而是彼此互斥。

必須要問的是：尊重是什麼？我認為 Andrew Sayer (2008) 對「尊重」的分析可以清楚解釋此節之後所提到「尊重」的內涵。Sayer 把尊重 (respect) 和可敬 (respectability) 分開看，兩者的意義與出現會隨著社會場域內個人或團體的位置而改變，受支配群體對尊重的要求帶有平等主義 (egalitarian) 的色彩，通常會要求他人根據「他們是怎麼樣的人」來肯認他們，所以通常在這個情況下，意謂的是要求他人尊重文化差異，而非符合主流規範的尊重。相反地，可敬則是去迎合主流價值，以階級為例，可敬涉及 (上層) 中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態度與價

⁴⁰性/別和性別 (gender) 的差異，我非常同意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解釋，尤其是斜線所延伸的四層意義。下面是其官方網頁的內容：

- 「性/別」的命名反映了我們多年來在女性主義理論上的反思，其中的斜線至少包含四層意義：
1. 性別並非簡單的兩性，而是還有其他可能。斜線畫出了其間曖昧複雜與分裂不穩定的可能，「性/別」因此也指涉了「性別」本身內部的多元流動，特別是「跨性別」。
 2. 「性別」與「性」在這個名稱中合成一體，以表達「性別」與「性」的複雜關連，但是斜線也指出了兩者不可化約為一。
 3. 斜線同時表達了「性」中有「別」(差異) 的概念，指出「性」的多元異質和內部差異，並且還有壓迫宰制關係。
 4. 「別」就是差異，因此「性/別」也表達性與其他「社會差異」(階級、種族、年齡等) 的複雜關連。

值觀，像是「不要冒犯別人」「盡量低調一點」「不要惹麻煩」「在性方面節制」，所以追求可敬付出的代價等於是極度地自我壓抑。教育小組所追求的「尊重」比較像是 Sayer 所說的「可敬」。小小海就跟我說不會在教室講出自己的性探索過程，原因在於「性」在「認識多元」與「尊重差異」的框架下不適合出現：

研究者：那你的生命故事不敢說出來的部份是？

小小海：可能有很多性方面的探索沒有在教育現場講過這件事情。

研究者：那一塊對你重要嗎？

小小海：蠻重要的。

研究者：那為什麼不講？

小小海：可是我會覺得那個跟同志的關聯沒有大到那個程度，那個比較像是一般青少年都會有些性的衝動，可能會做一些事情這樣，跟是不是同志好像沒有關係，大家生命中一些共同的經驗，性的部份我就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重要，也不是說性不重要，講性別認同的部份他們會比較能夠理解。就還蠻有意思，是覺得說因為他們是要認識尊重，所以要讓他們看見比較多元的部份，所以我就會偏向講自己的認同是什麼情況，而捨棄我在性方面是有蠻多興趣探索的。（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我們還可以從公誠國中妖妖和金金的爭執中看到性/別議題跟尊重的尷尬關係。妖妖害怕金金突如其來的性啓蒙故事情節在於老師不願意談性，在這件事上他很清楚地說：「我已經知道志明老師就是不喜歡我們去談太多性，而是希望放在尊重，放在多元，放在瞭解。」但另一方面妖妖卻又對不能講性這件事感到焦慮又無奈，他認為如果異性戀都能坦然接受同性戀的性才是真正的尊重：

（我討厭有種人接受）你可以當 gay，可是不要讓我知道你有性行為，我不想想像你們兩個（同性戀）抱在一起的樣子，我會生氣，（雖然）就是我尊重你們（同性戀），可是不要在我面前牽手！我覺得那（種人）也是一種挑戰，不管是誰我都把我最髒、最淫亂的那一面給你們看，是不是都還願意接受我。可是…又很尷尬的，會考慮到一個組織的長期運作或是以後人家會不會邀請我們（的問題），沒辦法那麼就是…現在做就有點綁手綁腳。

同志教育簡化為尊重教育幾乎是教育小組的模式，同志教育能不能直接談性呢？大多數義工認為性議題殺傷力最大的地方就在於使「尊重」失焦，由此可知，對照於前面 Sayer 所論述的尊重與可敬的差別，教育小組似乎偏向「可敬」而非「尊重」。小莫就很直接的舉例說明性尺度過大的危險：「我在組內可以講出說跟婚姻中男同志約炮的經驗，可是我不會在演講現場講這個東西啊！」他認為教育小組去做那麼多的教育工作，要老師同學去反思，從性別二元到性別多元，其實最終都在談最簡單的兩個字「尊重」：「我發現很多東西你再怎麼談，談到後來都還是「尊重」這兩個字而已。」小莫的例子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核心議題的轉化，從性別到尊重，但卻是不談太多性的「尊重」。或許我們可以想想小莫的經驗為甚麼不可告人？是「婚姻中男同志」、「約炮」還是背後的「同性性行為」讓小莫判斷這個經驗故事不能講？那麼對於小莫而言，什麼才是和尊重相關聯的同志議題呢？是前面說故事的策略中提到的典範故事，也就是校園霸凌的故事才有尊重的意義。下面是小莫描述東勢高工的老師，在聽完小莫校園霸凌故事的不捨情緒：

之前，在東勢高工，在課堂上講校園霸凌的事件，事後劉慈倫老師哭了…那時候老師就有很抱歉的跟我講說，她其實真的只是想要做性別教育，讓同學知道性別多元跟尊重的價值還有意義，他無心挖我們這些義工過去的傷口重新在上面撒鹽，可是他卻覺得每次在做的時候，對於義工一直講生命故事，會覺得有一種抱歉的感覺。

有趣的是，性別氣質議題並不完全是同志議題，小莫的故事脈絡是因為性別氣質陰柔而被同學欺負，而不是因為「同志」本身的議題而受到欺負。性別氣質議題和同志議題一直是曖昧不明的關係，小莫的校園霸凌故事說得是一個尊重同志的故事，抑或是其實是一個尊重性別氣質差異的故事，對異性戀而言兩者是全然不一樣的，因為無法預設一個異性戀會因為尊重多元性別氣質而尊重同志。這也是教育小組在說故事時所產生的盲點，對於異性戀來說，性別氣質和性傾向是有差距的，是有不同程度的道德倫理壓力。

更推進一步，我認為性傾向的議題被其他性別議題給「解套」了。再以小莫的校園霸凌故事為例，小莫因性別氣質陰柔被霸凌的故事，帶給聽眾另外一個深層的意義正是「尊重同志」，藉由性別氣質議題和同志議題的親近性，在故事中講述尊重不同性別氣質的同時，也透露尊重同志的訊息。

其實這樣把同志議題移花接木的方式還有家庭議題、情感議題與人際關係議

題，例如：被同志告白該怎麼辦？可以發現到從性別氣質、家庭議題、情感議題與人際關係議題的共通性為「這不只是同志的議題，也是異性戀的議題」，同志與異性戀之間性/別差異的議題就在前面的共通性議題當中給消除掉了，換句話說，教育小組所採取的方式是「你我相同」的策略，你有家庭議題，我也有家庭議題，以此類推。

而「尊重」就在不談異同性/別差異的方式下，利用異同相似的議題浮現在檯面上。最後，教育小組在把「可敬」的論述誤認⁴¹為「尊重」時，誰還會想去理解同志和異性戀的真實經驗差異呢？反正同志和異性戀沒什麼兩樣！所傳達給學生的「尊重」說穿了仍是服膺於異性戀主流規範，而非肯認「性」、情慾與文化的差異。表 10 為本研究在 Sayer 分析框架下的比較。

表 10 Andrew Sayer 的「尊重」與「可敬」分析框架

議題 \ 內涵	尊重 (respect)	可敬 (respectability)
Sayer 分析的階級反應	肯認文化差異	符合主流規範
教育小組的同志教育	性、情慾、文化的差異	異同相似 (可敬→尊重)

(此表為本研究整理)

Connell 認為「男人比女人強壯」的刻板印象來自範疇上的差異 (categorical differences) 而非社會平均的差異 (average differences)；反過來說，為了達到尊重的目的，教育小組則是把異性戀與同性戀範疇的差異變成社會平均的差異。我認為當同志教育過於強調與異性戀社會關係的相似性時，反而更加無法理解彼此在性和性別經驗上的差異，例如歡愉、疼痛、身體意象、青春及老化或身體接觸的經驗。在教室中，這些身體經驗不容易被說出來，卻又是理解同志重要的內容，如小莫擔心的「約炮」經驗，不也可以透過述說身體經驗讓異性戀理解到異/同之間感官的差異與相似性嗎？

最後，我並不是要反對教育小組的行動，而是想指出在進行同志教育實作的層層關卡下，教育小組和教師共謀⁴²追求「尊重」(其實是追求可敬)的同時可

⁴¹ 誤認 (misrecognition) 在 Bourdieu 的理論中用來表示文化的再製必須建立在人類的誤認之上，和 Marx 的虛假意識 (false conscious) 概念類似。而主要形成誤認的工具又是教育。

⁴² 在第二章第四節智偉提到熱線也必須考慮到教師的立場，因為教師背後也有另一個結構限制著他，教師也會提醒熱線論述的尺度到哪，以及必須講到最重要的觀念「尊重」，所以我認為熱

能將失去更多「理解」與「承認」同志生命的機會。Andrew Sayer (2008) 對於階級中的「尊重」反應有細膩地分析：「尊重在一個高度不平等卻又多元文化的社會中，往往會與人們自己所具有的特質脫鉤，因為在這些社會中，權力本身便不斷要求他人的尊重，導致對異文化成員的判斷也可能是無知的、我族中心的 (ethnocentric)。對尊重的要求與給予，已逐漸與其表現在行為上的、道德的那一面脫離了關係，因此，人們在要求尊重時，已無須表明這樣的尊重其實與那些值得受到這種肯認的特質與行為有關，結果，尊重最後淪為一種表面工夫。」當「可敬」被誤認為「尊重」時，「尊重」並不同於理解與承認，並不需要看到同志的身體實作經驗也能說出「尊重」的口號，但理解與承認就不是這麼一回事，理解與承認必須在互為主體性的基礎下才有可能，當同志主體性消失在同志教育中時，又怎麼能達到互為主體性的理解與承認呢？



線和教師的確會在學校場域的結構中共謀一個可以實作的論述，尤其當進入學校更為不易時。

第五章 結論

從第二章到第四章，我透過熱線教育小組在校園所從事的同志教育演講行動，刻劃出同志在教室中實作同志教育的流程與處境，並回到同志義工受到自身實作反饋的主體感受，最後道出同志教育實作的困境。第一節小結我的研究發現，第二節深入的跟理論對話，第三節提出我對於校園同志教育的一些建議，第四節則是我在研究上遇到的限制，並提供未來對同志或同志教育研究有興趣的人一些想法。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性別平等教育法》讓同志教育得以在學校裡實行，也讓同志諮詢熱線的義工有機會進入到教室當中現身，面對著同學演講同志生命經驗，所以本研究對於《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立法精神仍是抱持肯定的態度。但立法的精神如何能落實到務實的教育現場，則是本研究所欲繼續探究的。回到我一開始提問的第一個問題：教育小組是否能憑藉《性別平等教育法》這道窗口，就得以毫無顧忌的進入校園演講？性別平等教育的目標是在用教育的方式消弭性別歧視，以促進性別地位之平等。然而，校園的性別教育並沒有因為法條而全面獲得保障，仔細深入觀察發現事情並不那麼單純簡單，法律的制定與實作會受到各個行動者的行動而脫勾。最後導致性別教育一方面仍無法從「兩性」的觀點中逃脫出來，使得同志議題仍處於邊緣的位置，另一方面異性戀性別二元暴力的框架也使得同志教育在實作上受到各種質疑與焦慮。

同志熱線教育小組必須謹慎地試探學校教師對於同志議題的態度，才得以取得管道進入學校。雖然性平教育法規性別平等教育包含同志教育，但當在學校實施時，一定會受到教師與家長的壓力，因為同志教育相對於其他性別議題仍是被認為有所爭議。而這個「爭議」的壓力也讓熱線在一開始面對學校的邀約時，就處於戰戰兢兢的狀態，避免因為演講內容或議題尺度引發教師不舒服，而無法再進入學校。熟悉學校教師的需求變成首要考量的要素，也是教育小組義工首要衡量演講內容尺度的標準。在層層壓力的考量下，性別教育往往會淪為「規範式」(normative) 性別教育，也就是擁有較大權力者所能接受的性別教育，同志教育也是如此。

當順利進到教室後，演講過程中義工的生命故事一方面不僅不能得寸進尺，必須隱藏「性」與「情慾互動」的情節之外，另一方面還必須兼顧教育意義，所有會干擾故事的危險情節都必須隱瞞與修正，避免再一次造成同志生成論的刻板印象，例如同志都是因為家庭關係不正常所造成的。再來，面對學生高度對同性戀「性」的好奇與不友善的問題時，義工又夾在台下同學嬉鬧或專注的態度與老師保守與開放的尺度中，只好退而求其次地把性議題轉化成禮貌說、大腦說、衛生教育與抽象的情感議題，不正面直接講述性的話題。可惜的是，性本身就是同志污名最大的來源，但從學生仍不敢談性的反應來看，校園性教育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所以義工仍選擇風險較低且能避免談性的「性論述」。更麻煩的是，台下聽眾對於異性戀性別二元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尤其當面對老師用自己曾在國高中喜歡同性的經驗來挑戰義工目前的同性經驗時，會完全的陷入鬼打牆的狀態：同性戀只是因為還沒遇到 100%的異性。而這樣堅固的異性戀邏輯竟然讓性別流動的論述荒謬地演變成「既然性別可以流動，為甚麼不流動到異性戀呢？」很直接的暗示出同性戀從屬於異性戀的霸權地位。

在演講現場，義工除了要想辦法處理上述異性戀性別二元論述之外，同時同志義工本身也在彼此橫向的合作關係上產生微妙的情緒。為了防止說出任何一絲絲讓異性戀批判的生命故事與論述，義工之間必須要彼此監視與約束演講的內容，當有義工說出了符應性別刻板印象（例如因為女生可以被照顧，所以我想當女生）或是異性戀容易攻擊與反感的論述時（例如上述的性議題與性別流動），其他義工必須馬上進行澄清與消毒的動作，並在事後仔細地檢查（scrutinize）這位義工為演講的論述與風險。除此之外，面對教師無形的文憑崇拜心態，義工之間在演講中表露學歷的行動雖然可以增加演講的公信力，但反之也帶給內部沒有高學歷證明的義工無可言喻的情緒。說故事也在隱晦的競爭壓力下，義工開始焦慮自身的生命故事是否符合演講需求的期待，而開始進行自我生命故事的改造。最後在一場又一場的演講情況下，義工在不斷說故事卻又好像不是說自己故事的矛盾情緒下，和自己演講的武器：生命故事開始異化，不自由地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開始帶給義工沈重的無力感。

總結來說，同志教育既必須避免敏感的性議題又要澄清性所帶來的污名，熱線教育小組義工解套的方式就是把生命故事的情節隱惡揚善，在回答性議題時必須想辦法隱「性」埋「淫」。同志教育最後就在滿足青少年去性化的框架下變成了一場場異性戀期待下「正確的性別教育」：不是性／別的問題，更多是人本教

育的「尊重」問題。尊重！尊重！多少偽善假汝之名而行！

第二節 和理論的對話

「性別」的中文意思已經超出英文字 gender 的意義，「性別」幾乎無所不包，從生物性 (sex)、社會性 (sexuality) 到性傾向 (sexual orientation) 都是「性別」的議題，差別只在於核心還是邊緣的位置。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學者 Linda Nicholson (1995) 就重新詮釋性別 (gender) 作為一種分析的範疇所受到的限制及流變。以往的女性主義研究採用衣架理論 (biological foundationalism) 的性別分析方式，把身體視為衣架，可以套上不同文化的衣服，性別介於生物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之間，但還是沒意識到連生物性的「身體」也都需要文化性的理解，例如同樣是生物性女人，黑女人與白女人的性別壓迫經驗卻有差異，或是異性戀女人和同性戀女人的性別壓迫經驗也不同。Adrienne Rich (1980) 更很清楚的指出性別 (gender) 作為分析工具，無法看到異性戀/同性戀二元性傾向為不平等關係的基礎，異性戀男人與異性戀女人為性別權力關係的軸心，擁有利益的團體 (異性戀) 支配著性別的秩序。

雖然，台灣的學術研究開始意識到使用「性別」分析的侷限，而有酷兒理論與性/別理論的討論，但在大學以下的學校教育，酷兒理論與性/別理論仍不免無法從「對性別的刻板印象」⁴³中解放出來。主要是一方面講「酷兒」或「性/別」又怕太過艱澀，另一方面講「同志」又怕太過敏感，最後還是使用既方便又好用的「性別」。當使用「性別教育」這個字眼時，雖然可以偷渡許多的議題，但無可厚非地必然會框在異性戀的性別二元架構當中，這個框架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霸權，因為性別教育一直把異性戀的二元性別視為先驗的正當性。在這個情況下，同志教育必然無法暢所欲言，尤其是同志當中的同性戀和異性戀最大的差異就是性 (sex) 與情慾 (desire) 對象的性別，但這兩者卻會挑戰到教育場域的保守尺度。我的研究也就如 Rich 所建議的，把性別教育當作異性戀建制化的範疇來研究，當同志進入異性戀建制的性別教育之後，必然產生各種協商的手法適應性別教育，例如去性化的同志教育。

結果性別教育反而讓同志內部產生類似 Joshua Gamson 提出的認同問題，如

⁴³ 意指一般人提到「性別」的刻板認知，例如性別就是兩性、性別平等就是男女平等、與性別歧視就是以生物性別二元為認知基礎的歧視，例如嘲笑男生是娘娘腔或謾罵女生是男人婆。

下表所示。Gamsom (1995) 在社會運動中提出認同運動遇到的重要課題，在酷兒運動中，酷兒性(queerness)放在同性戀運動上會出現兩難的處境：固定的身份分類既是壓迫的基礎，又是政治力量的基礎。Gamsom 以 1993 年舊金山男女同性戀驕傲日遊行的的辯論資料分析這個兩難的問題。使用「酷兒」的陣營，認為現存的男女同性戀活動無法概括雙性戀、變性者與跨性別族群，質疑同性戀運動的集體認同內容，認為同性戀運動的性身份充滿一致性、穩定性、有效性與政治用途，應該要朝向解構的酷兒政治才不會造成對其他性身份族群的壓迫。

表 11 Gamson 認同邊界分析框架與本研究的比較

議題 \ 認同邊界	固定的集體認同	解構的酷兒認同
Gamson 分析的酷兒運動	女／男同性戀	酷兒性：LGBT
本研究討論的同志教育	異同相似的同志經驗喊出尊重多元性別的口號	看見各種情慾樣貌與反轉主流性別的可能

(此表由本研究整理)

反對使用「酷兒」名詞的陣營，堅持使用「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字眼保留固定的性身份認同邊界，他們害怕「酷兒性」模糊集體認同的固定邊界，妨礙原本同性戀運動對異性戀體制的討價還價，或是像女同性戀族群擔心「酷兒」一詞最後只是「白人中產階級男同性戀」的表徵。兩個陣營的立場都正確，不過一方面使用酷兒作為認同運動，解構同性戀認同運動，會產生政治上的損害；另一方面，強化同性戀認同邊界則會增強男／女，異性戀／同性戀二元框架，損害到其他無法套進此框架的性身份主體。目前的認同運動理論只抓到後者的優點，也就是追求堅固的集體分類產生的政治效果，因為如果沒有明顯邊界的團體，則無法完成任何集體行動，更遑論能達到集體目標。

酷兒認同運動無可逃避的兩難問題顯現出壓迫的兩個重要來源，一個是文化根源，另一個則是制度根源。酷兒的解構策略把文化根源的壓迫當作運動目標，忽略規範性制度的壓迫；固定邊界的族群策略則相反，把制度根源的壓迫視為運動目標，不去鬆動既定的社會範疇/分類。第三章與第四章我想藉由討論同運中同志運動者的演講策略與複雜情感來回應 Gamson 所關注的兩難課題，教育小組的義工對外與對內也一直來回於固定邊界的認同策略以及酷兒的解構策略之

間，並相互的協商，只不過固定的認同策略變成符合異性戀、主流與去性化的同志教育，說不出口的則是各式各樣的情慾展演。

但 Gamson 認為「酷兒性」作為行動的邏輯，能迫使我們重新型塑和發展集體認同，並對政治進程做出重要的修正。首先在社會運動中明確的邊界或固定的認同並不是普遍的不可或缺，早期的社會學研究假設集體認同為行動的前提或是非理性行動，忽略集體認同的不穩定性與流動性；再來，酷兒運動的複雜性帶進認同運動中後，不僅不會阻礙運動的發展，反而彰顯運動組織形式的挑戰，流動的集體認同本身就是目標與集體行動。當考慮此一動力後，新的問題就會產生：集體認同如何協商、建構與穩定？更具體的問：穩定的集體認同必然性是針對什麼人說的？它又會是在什麼時間？它又如何運作？是否有一些認同運動可避免把自身分離出社會？此論文研究的分析也就是針對 Gamson 提出的問題所作的回應，我認為教育小組並沒有放棄酷兒性的行動，但在現實的實作考量下，教育小組的確仍必須小心翼翼地試探教師與學生的底線，避免成為拒絕往來戶，喪失同志現身於教室發聲的機會。

我綜合 Gamson、Sayer 和我的研究分析（表 12 所示），試著指出同行異構的關係性，藉此看見目前台灣同志教育所處的困境。同志教育以異同相似的同志經驗喊出尊重多元性別的口號，如同 Gamson 認為固定的集體運動仍處在男／女、異／同性戀的框架中，只挑戰到規範性的制度壓迫，所以追求的「尊重」也只是符合主流規範下的「可敬性」。我認為同志教育必須正視回應文化壓迫的重要性，直接在教室中挑戰異性戀二元性別，並訴說出各式各樣的慾望主體，已達到尊重的真諦，否則仍無法跳脫出二元框架帶來的限制與污名。

表 12 Gamson、Sayer 與本研究的綜合分析

議題 \ 壓迫起源	(規範性) 制度	文化
Gamson 分析的酷兒運動	固定的集體認同：各種二元框架，如男/女，異/同	解構的酷兒認同：各種性身份主體
本研究討論的同志教育	異同相似的同志經驗喊出尊重多元性別的口號	看見各種情慾樣貌與反轉主流性別文化的可能
Sayer 的尊重與可敬	可敬→「尊重」 ⁴⁴	尊重

(此表為本研究整理)

一個尊重口號蔓延的校園，讓我們不得不停下來仔細地探究「尊重」的精神在性別教育中是否真的落實？尤其當性別與尊重的意義所指涉的是二元性別和與主流規範靠攏的可敬性時，這樣存在於性別教育當中的同志教育，可想而知仍會被強制的異性戀論述所主導。不僅老師對於同志教育的內容仍戒慎恐懼與保留之外，教育小組的義工們也受限於考量到老師的壓力，與維持進入校園的管道，而強調異同相似、去性化的論述內容。最後，教育小組以同志現身的策略進入校園，可以說是校園的同志運動，但校園這個不同於街頭的場域，卻讓同志現身的力量真的只侷限在「被看見」的程度，但如何在教室中義工們一開口：「大家好，我是同志。」再繼續讓同志的主體有能力挑戰到學生們或老師們根深蒂固的性別二元意識，則是我在田野中所關懷的，研究中所欲批判的。而這個目標應該不只是訴說同志的遭遇有多麼淒慘與不平等就可達到，同志教育也不應該停留在輔導諮商、尊重多元這樣補充式的外加教育。就如同性別研究不只是把性別這個變項加進其他變項（階級、種族）分析，我認為同志教育也不只是把「同志」加進去「性別」攪一攪就可交待了事，如此還是無法批判「性別」原本就存在的異性戀邏輯。

第三節 研究建議

承認 (recognition) 是正義的問題，否認 (misrecognition) 則建構了一個建制化從屬的形式，此從屬形式的機制是這樣的——文化價值建構出誰的地位

⁴⁴ 上下引號表示對「尊重」的懸擱，意旨並非有尊重的意義與內涵。

(status) 可以參與社會互動以及誰的地位不能參與 (Fraser, 2001)。對照於台灣同志目前的現況，我認為 Nancy Fraser 的承認政治立場可以作為校園同志教育的骨幹，尤其目前教育資源並無法確保青少年同志發展獨立性的可能性，反而否認青少年同志的主體性。青少年同志在此條件下絕對無法在教室中成為同等的參與者，同時教育者也藉由加深對所欲拒絕對象的差異性（異性／同性，自然／不自然，正常／不正常），預先排除否認的對象，避免和其互動。在無法把追求美好生活當成同志運動目標下，同志青少年能否「參與」校園活動應作為衡量同志青少年在校園行動正當性的標準。

（一）100 學年國中小同志教育必須實行

要達到上述所說的目標，首先，教育者必須認清自己目前對「性別」概念的侷限與不足。「性別就是兩性」的觀念在演講現場仍是教師多數所認同的，目前性別教育的宣導也多集中在性騷擾、性侵害與家庭暴力的議題，很難讓更多性別議題被看見。如今教育部已經將同志議題列入 100 學年實施的國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性別平等教育」重大議題，並已經開始在教師研習和教師手冊的編寫中納入同志教育與多元情慾的部份作為 100 學年同志教育的暖身。我認為這對同志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轉變與前進，再教育 (re-educate) 教師是同志教育必要的條件，異性戀教師仍占教師的多數，當傳道解惑的異性戀教師能有更多性別敏感度的話，他所直接面對的學生也能感受到老師的性別友善態度，讓不同於異性戀情慾萌芽的小同志可以有更多的資源。

目前《性別平等教育法》明文規定要包含同志教育、性教育與情感教育，等於法律授予實行的正當性。但開始有家長團體出現反對的聲浪，並想透過重新立法讓同志教育無法進入國中小階段。原本同志教育在進入校園的過程就充滿許多阻礙，如果連法律都無法支持同志教育，則未來的青少年同志學生們的資源將更加稀少，想實行同志教育的老師也更加為難。所以，我強烈支持教育部原先通過 100 學年同志教育在國中小實施，並反對走回頭路。如此，立法推行同志教育的決心與目標更能如實地貫徹，不至於變成法律歸法律、實行歸實行的落差，而這落差也正是先前《性別平等教育法》所無法克服解決的。

(二) 校園性教育強度與廣度的加強

性教育和同志有什麼相關？從第三章回應性議題的討論知道，目前「性」在國高中的接受度仍不普遍，教師對性的看法也多是保守立場，更不用談到慾望論述的缺席，畢竟「讀書談什麼戀愛」的觀念仍深植在家長父母與教師腦中。在演講現場，光是說到「陰道交」就有同學會倒吸一口氣，反映出校園性教育還未成熟。如果光是異性戀的性知識都難以啓齒的話，遑論提到同性戀的性。所以校園性教育在強度與廣度上仍是有努力的空間。

另外，有研究開始反省校園性教育，像是學校的性教育強調生育目的，忽略社會情境與情感關係；或是性的學習在家庭多為沉默的狀況；以及性知識的性別化，女孩和男孩透過不同方式與媒介學習性知識（Holland, Ramazanoglu and Sharpe, 2004）。我建議，同志的性應該放入性教育當中，隨著不同教育階段提供不同程度同志的性。但在「生育」作為一種正當性論述，可以公開學習異性戀性知識時，反而同志的性進入性教育的門檻相對較高，卻不是不可為。這需要性別教育學者的集思廣益，才有可能改變目前性教育的內容。

(三) 校園同志社團的成立

同志在校園仍是備受爭議的議題。同志現身並不是滿 18 歲才要面對的事，讓青少年同志甚至兒童同志有同樣的機會表達出自己的情慾與性別認同是必要的。目前台灣青少年同志不僅會在心理層面感受到被貶低，在社會關係中同樣也是，我們必須去看到異性戀性別二元如何暴力地建制化在教育場域中，才有機會改善目前台灣同志學生的校園處境。另外，看待「差異」的態度也會大大的影響教育者對同志教育的看法，如果把異同之間的差異看成是一種相對立的位階關係，則很難達到把差異看成是流動的、異質的、特殊的（specific）。當差異的概念仍停留在他者的、對立的關係上，遑論教育者多麼有心的實行同志教育，最後，也只不過變成同化教育。

法律的介入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我的研究結果很清楚地描述出同志教育實作上的困境，連同志現身為策略的同志教育都有許多的挑戰與兩難，遑論單從書面或教師研習的「專家」的知識就能一本萬利。所以接下來我提供的想法是，只有當異性戀知道更多同志現身的故事，並且是有同志慾望為主體的故事，「尊

重多元性別」對同志教育才不會只是一個口號，熱線教育小組的說故事策略絕對有讓聽眾與台上說故事者達到互為主體性的效果，透過說故事與聽故事的對話基調才較有可能促進尊重和互相信任。教育小組的義工不僅是說自己的故事，同時也幫其他同志族群說出他們的故事；同樣的，也可以透過講師的嘴巴說出活生生的同志故事，而非只是小說、電影與新聞媒體上的情節而已。



圖 6 校園同志社團成立的兩大支持面向

我建議學校能夠成立同志社團，不只是在大學，還有在國高中已經意識到自己有同志認同的青少年同志們，可以在同志友善教師的幫助下建立同志社團，形成自助的性別團體。我認為這個模式，如圖 6 所示，在莊敬高中的同志校友社團相當成功，在今年 2010 年的同志大遊行莊敬高中同志社團就一起舉牌上街遊行，可以說是一種大手牽小手的組織模式。熱線同志義工往往每年去同一間學校可能只有一至兩小時的演講時間，熱線講完就離開了，演講後續的效應完全是學校老師所承擔。但像莊敬高中這種每年去演講的學校，最後終於由友善的秀英老師作為指導老師，默默的在網路社群上成立了「莊敬高中同志校友會」社團，在通過老師的審核後，莊敬高中的同志學生或校友可以加入此社團定期的參加社團每個月所舉辦的活動，也讓同志學生能彼此聯繫與認識而不再感到孤單，這才是對同志學生最重要的資源。同志學生不能只是被當成一堆嗷嗷待哺的弱勢者，我相信一群同志學生藉由充裕的資源可以獲得「勇氣」，有勇氣的在校園中袒露自己的情慾與認同。

(四) 熱線教育小組的運動動員必須持續

教育小組的義工總會開玩笑地說，教育小組的目標就是希望「未來沒有教育小組」，也就是期待未來校園的同志教育能成熟發展，學校與教師都能自主與有能力的實行。但現今距離此目標仍有好長一段距離，教育小組的行動與任務還沒結束，必須繼續到校園演講同志議題，人力就成爲一大問題。

每年總有新進義工加入教育小組，多爲大學與研究所的同志學生，義工在小組有一定的生命週期，配合自身的生涯規劃，有些義工待了一年或兩年之後就離開。阿球表示他帶教育小組多年，觀察到義工汰換的週期大概是兩年，也就是教育小組的義工每兩年就會大換血一次。面對每年大幅增加的演講場次，教育小組的人力最爲吃緊，尤其在每年五、六月各國中與高中入班時期，會發生同一時段有三個入班，或是同一天會有在北、中、南、東部的演講。其實目前教育小組開始都會有定期招募活動，目前人數也慢慢的從一個班 10 至 20 人發展到兩個班的規模。未來演講的場次勢必會持續增加，我建議教育小組的招募管道可從各大學著手，以台北地區的大學招攬同志學生加入，例如到各大學演講時，可宣傳教育小組人力招募的相關訊息。

我認爲當法律給予明確的實行規定，以及積極地進行性教育，則教育小組處於「能否再進入校園」與「演講內容的尺度」的兩難可獲得解決。但是在前兩項目標還未成熟時，義工們在演講中必須謹言慎行。現今同志教育仍處於艱難時期，演講內容的限制對於教育小組的行動來說是必要之惡，尤其在「性」的議題上仍需有所保留。另外，關於重複講述自己生命故事帶來的無力感，我觀察到教育小組開始會提醒義工們多聽其他義工的故事，畢竟自己的故事並不適合千篇一律地使用在每個演講中，每個演講的訴求不一樣，每個聽眾的問題也都千奇百怪，要應對這個不確定的演講，只靠自己的生命故事是不夠的，還需聆聽並記得其他義工的生命故事，以備不時之需。我也認爲此方式是避免義工重複講同樣的故事產生無力感的一條出路。同理，異性戀教師也可訴說同志的生命故事作爲性別教育的方式，說故事的主體不一定要是故事的主角。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可能研究議題

關於同志教育，目前也有其他社會團體在校園中演講，這些團體可能帶著宗

教背景、生命教育、人本教育的精神演講同志教育，受限於研究時間與能力，我並沒有試著比較這些團體在同志教育上的演講策略與內容，這是此研究最大的不足，我建議未來有興趣研究同志教育者，可以比較不同宗教、教育理念背景的團體在同志教育的實作差異，對於同志教育會有相當大的貢獻。另外，同志教育在民國一百年已經確定從教師與教科書上著手，未來勢必還有更多爭議，所以對於未來在校園的同志教育的研究也許後進者能分析其成效與否。

最後，我在寫這篇論文的時候，對於詞彙的使用常常相當困惑，同志（Tong-zi）、gay、同性戀都必須小心的使用來指稱。目前台灣仍沒有太多關於台灣「同志」（Tong-zi）的歷史社會學研究，我認為這一部份的研究有助於對台灣同志的主體性的理解，藉由台灣同志的歷史爬梳，才能區別出西方語彙的脈絡差異與套用的不適。



參考文獻

Bernstein, Mary (1997). Celebration and Suppression: The Strategic Uses of Identity by the Lesbian and Gay Mo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3), 531-565.

Bernstein, Mary (2002). The Contradictions of Gay Ethnicity: Forging Identity in Vermont. In David S. Meyer, Nancy Whittier, & Belinda Robnett (Eds.), *Social Movements: Identity, culture, and the state*. (pp. 85-104).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ooke, James (1996). To be young gay, and going to high school in Utah. *The New York Times*, pp. A1, B8.

Calhoun, Cheshire. (1994). Separating Lesbian Theory from Feminist Theory. *Ethics*, 104(3), 558-581.

Calhoun, Cheshire. (1995). The Gender Closet: Lesbian Disappearance under the Sign "Women". *Feminist Studies*, 21(1), 7-34.

Calhoun, Cheshire (1997)。同女出走 (*Leaving Home*) (張娟芬譯)。臺北市: 吳氏總經銷

Connell, Robert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Polity Press.

Connell, Robert W and Messerschmidt, W (2005).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 Society*, 19(6): 829-859.

Fanon, Frantz (2007)。黑皮膚，白面具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陳瑞華譯)。台北市: 心靈工坊文化出版。

Fraser, Nancy (2001). Recognition without Ethic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8(2-3), 21-42

Filax, Gloria (2003). Queer Invisibility: The Case of Ellen, Michel, and Oscar. In S.

Books (Ed.), *Invisible children in the society and its schools* (pp. 147-169). Mahwah,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Filax, Gloria (2006). *Queer youth in the province of the "severely normal"*. Vancouver: UBC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86).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Freire, Paulo (1993).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Continuum.

Gamson, Joshua (1995). Must Identity Movements Self-Destruct? A Queer Dilemma. *Social Problems*, 42(3), 390-407.

Gamson, Joshua (1998). *Freaks Talk Bac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lland, Janet, Ramazanoglu, Caroline and Sharpe, Sue (2004). Learning about sex: The gendering of sexual knowledge. In Holland, Janet, Ramazanoglu, Caroline and Sharpe, Sue (Eds.) *The male in the head: Young people, heterosexuality and power*. (pp. 51-75). London: The Tufnell Press.

Ingraham, Chrys (1994). The Heterosexual Imaginary: Feminist Sociology and Theories of Gender. *Sociological Theory*, 12(2), 203-219.

Ingraham, Chrys (2005). *Thinking straight : the power, the promise, and the paradox of hetero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Nicholson, Linda J. (1995). Interpreting Gender. In L. J. Nicholson & S. Seidman (Eds.), *Social postmodernism :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letta, Francesca (2006). "It Was like a Fever ..." Narrative and Identity in Social Protest *Social Problems*, Vol. 45, No. 2, pp. 137-159

Polletta, Francesca (2006). *It Was Like A Fever: Storytelling in Protest an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ich, Adrienne (1980).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Signs*, 5(4), 631-660.
- Rofes, Eofes. E (1989). Opening Up the Classroom Closet: Responding to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Gay and Lesbian Youth.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9(4), 444-453.
- Rofes, Eofes. E (2004). Martyr-Target-Victim: Interrogating Narratives of Persecution and Suffering among Queer Youth. In M. L. Rasmussen, E. E. Rofes & S. Talburt (Eds.), *Youth and sexualities : pleasure, subversion, and insubordination in and out of schools* (pp. 41-62).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Sayer, Andrew (2008)。階級的道德意義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Class*) (陳妙芬、萬毓澤譯)。台北市：巨流。
- Seidman, Steve (1993).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a "Postmodern" Gay Culture: Some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Notes. In M. Warner (Ed.), *Fear of a queer planet :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pp. 105-14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mith, George W. (1998). The Ideology of "Fag": The School Experience of Gay Student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9(2), 309-335.
- Wittig, Monique (1992). *The straight mind and other essays*. Boston: Beacon Press.
- Young, Iris M. (2001).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B. Boxill (Ed.), *Race and Racism* (pp. 383-41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王怡元 (2004)。在學校體制中女同志族群與非同志族群間族群關係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北市市立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 王儷靜 (2010)。Fag 意識形態：男同志學生的校園經驗。In 楊幸真 (Ed.), *青少年的性* (pp. 151-173)。台北市：巨流。
- 朱偉誠 (1998)。台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論"現身"問題。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0, 35-62。

- 何明修 (2005). *社會運動概論*. 臺北市: 三民.
- 陳培驊 (2006). *見與不見－同志現身經驗的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 李雪菱 (2007). *從性別課程設計反思基層教師「性別意識」與「多元家庭」觀：以東台灣七所基層學校為例*. Paper presented at the 「教與學」學術研討會.
- 周佑儒 (2007). *大學男同志學生出櫃經驗之敘事分析*.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 范雲 (2010). 說故事與民主討論：一個公民社會內部族群對話論壇的分析. *台灣民主季刊*, 7(1), 65-106
- 張喬婷 (1999). *異質空間 vs. 全視空間：台灣校園女同志的記憶、認同與主體性浮現*.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楊佳羚 (2002). *國中性教育的人類學初探－以性教育論述與課堂實踐為例*.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附錄

教師訪談問題

基本資料

- ◎ 你是教什麼科目的老師？
- ◎ 老師教多久？

教師研習

- ◎ 你在這學期(今年 2-6 月)舉辦了幾場教師研習？議題或名稱各是什麼？
- ◎ 你如何符合各種議題教育規定的最低時數？（性傾害防治、性別平等教育、家庭教育及其他議題）
- ◎ 為什麼會想邀請同志熱線？
- ◎ 邀請熱線的過程中，學校的其他人員有什麼反應？
- ◎ 在你的學校舉辦同志議題的研習，可能遇到的難處是什麼？

班級入班

- ◎ 你希望熱線演講的內容是什麼？
- ◎ 你不希望義工演講什麼內容？當義工演講到這些內容時，你如何處理？

義工訪談問題

參加小組及演講過程

- ◎ 你為什麼想參加教育小組？過程是？
- ◎ 你會擔心現身/出櫃嗎？

- ◎ 你第一次在台上現身的心情可以描述一下嗎？可以簡單說一下現身的過程。
- ◎ 你第一次上台演講的情緒是什麼？跟目前演講的情緒相比有何差異？
- ◎ 你一開始怎麼講你的故事？
- ◎ 在教室，你最常演講什麼內容？如何說？
- ◎ 你如何講 LGBT 的內容？
- ◎ 你會擔心自己演講不好嗎？如果是，那你有試著想什麼辦法改善嗎？
- ◎ 會覺得講故事困難嗎？
- ◎ 你怎麼知道那個故事值得被講？
- ◎ 在服裝外表上，你會特別打扮去演講嗎？
- ◎ 你覺得好的演講應該是什麼樣？不好的演講應該是什麼樣？

演講中害怕的議題

- ◎ 自己在演講時，有遇到連自己都沒辦法說服自己的內容嗎？
- ◎ 在演講過程中，你會害怕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 ◎ 在演講過程中，什麼議題比較不太碰觸？為什麼？你如何應對？

演講的策略

- ◎ 你會平衡 L G B T 的內容嗎？你如何平衡各族群的內容份量？
- ◎ 你會改編自己的生命故事嗎？為什麼？
- ◎ 遇到台下性別刻板的言語或問題，你如何回應？是否不小心又強化刻板印象？
- ◎ 在父母場或老師場，你會避免哪一種內容或說法？
- ◎ 當老師用自己的生命故事挑戰你的經驗時，你如何處理或回應？

性

- ◎ 在教室中，你會如何演講性議題或回應性的問題？

情緒

- ◎ 在演講的過程，有沒有不舒服的經驗？你如何處理不舒服的感覺？
- ◎ 自己的故事會講到不想講嗎？你如何處理或調整這種狀況？
- ◎ 是否有說到自己某一段的生命故事而在現場哭泣？你如何調適這樣的狀況？
- ◎ 是否有不願意說出來的生命故事？什麼時候你會想說？你如何使用這些生命故事？
- ◎ 在演講的經驗中，是否有過無力感？你該怎麼解決或不去解決？

合作

- ◎ 是否有和其他義工有衝突的經驗？你如何處理衝突關係？
- ◎ 你會迴避特定的義工，選擇不合作嗎？
- ◎ 成為講師你覺得需要什麼條件或特質？
- ◎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義工的演講方式？
- ◎ 你覺得自己的演講方式是否有受誰影響？

